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Distr.  
GENERAL

E/CN.4/1994/31  
6 January 1994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人权委员会  
第五十届会议  
临时议程项目10(a)

所有遭受任何形式拘留或监禁的人的人权问题，  
特别是：酷刑或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

特别报告员奈杰尔·罗德利先生  
根据人权委员会第1992/32号决议提交的报告

## 目 录

	<u>段 次</u>	<u>页 次</u>
导言.....	1 - 4	5
一、职权范围和工作方法.....	5 23	7
二、特别报告员审查的有关各国的材料.....	24 - 665	12
阿尔及利亚.....	24 - 36	12
安哥拉.....	37 - 39	14
孟加拉.....	40 - 51	15
玻利维亚.....	52 - 55	17
巴西.....	56 - 59	18
保加利亚.....	60 - 62	18
布隆迪.....	63 - 68	19
喀麦隆.....	69 - 83	20
乍得.....	84 - 91	22
智利.....	92 - 145	23
中国.....	146 - 172	30
哥伦比亚.....	173 - 188	39
古巴.....	189 - 199	41
多米尼加共和国.....	200 - 201	43
厄瓜多尔.....	202 - 208	43
埃及.....	209 - 226	44
赤道几内亚.....	227 - 235	47
埃塞俄比亚.....	236	49
危地马拉.....	237 - 240	50
海地.....	241 - 260	51
印度.....	261 - 316	54
印度尼西亚.....	317 - 343	64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344 - 347	69
伊拉克.....	348 - 351	70
以色列.....	352 - 358	71

## 目 录(续)

	<u>段 次</u>	<u>页 次</u>
意大利.....	359 - 362	74
约旦.....	363 - 365	75
肯尼亚.....	366 - 369	76
马拉维.....	370 - 371	77
马来西亚.....	372 - 376	78
毛里塔尼亚.....	377 - 380	79
墨西哥.....	381 - 394	79
摩洛哥.....	395 - 398	82
缅甸.....	399 - 403	83
尼泊尔.....	404 - 418	84
尼日利亚.....	419	86
巴基斯坦.....	420 - 425	87
秘鲁.....	426 - 452	88
葡萄牙.....	453	93
大韩民国.....	454 - 468	94
罗马尼亚.....	469 - 471	96
卢旺达.....	472 - 474	97
沙特阿拉伯.....	475	98
塞内加尔.....	476	98
塞拉里昂.....	477	99
南非.....	478 - 481	99
西班牙.....	482 - 499	100
斯里兰卡.....	500 - 503	103
苏丹.....	504 - 527	105
叙利亚.....	528	108
塔吉克斯坦.....	529 - 530	109
泰国.....	531 - 532	109
多哥.....	533 - 539	110

目 录(续)

	<u>段 次</u>	<u>页 次</u>
突尼斯.....	540 - 549	112
土耳其.....	550 - 631	113
南斯拉夫.....	632 - 649	125
联合王国.....	650 - 655	128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656	130
扎伊尔.....	657 - 664	130
赞比亚.....	665	132
三、结论和建议.....	666 - 671	133



## 导言

1. 人权委员会第四十一届会议通过了第1985/33号决议，决定任命一名特别报告员，研究有关酷刑的问题。之后，委员会第1986/50、1987/29、1988/32、1990/34和1992/32号决议都一再延长了他的任期。委员会在1992/32号决议中再将任期延长3年。特别报告员根据上述决议向委员会提出了年度报告，载于文件 E/CN.4/1986/15、E/CN.4/1987/13、E/CN.4/1988/17和 Add.1、E/CN.4/1989/15、E/CN.4/1990/17 和 Add.1、E/CN.4/1991/17、E/CN.4/1992/17 和 Add.1 和 E/CN.4/1993/26。

2. 委员会在第1993/40号决议中，注意到P. 科艾斯曼先生辞去特别报告员一事，请主席在主席团内部进行磋商之后任命一位有国际声望的人士接替他的职务。于是奈杰尔·罗德利先生(联合王国)被任命为特别报告员。

3. 根据第1992/32和1993/40号决议，新任命的特别报告员在此向委员会提出他的第一份报告。第一章为有关职权范围和工作方法方面的一些问题。第二章主要回顾了1992年12月15日至1993年12月15日期间特别报告员转交给各国政府的资料以及收到的答复。第三章为结论和建议。

4. 除上述决议外，人权委员会在第四十九届会议上通过了其他几项决议也与特别报告员的职权范围有关，在审查和分析提交给他的涉及若干国家的资料时，也考虑到了那些决议。那些具体决议为：

- (a) 1993/41号决议，题为“司法执行工作中的人权”，委员会在该决议中要求它的特别报告员和工作组特别注意在司法执行工作中有效保护人权的问题，尤其是针对秘而不宣把人拘留的问题，要求在适当时提出这方面的具体建议，包括在咨询服务方案下可能采取的具体措施的建议；
- (b) 第1993/45号决议，题为“见解和言论自由的权利”，委员会在决议中请特别报告员在其职权范围内注意因行使该项权利而遭到拘留、暴力、虐待和歧视的人的情况。
- (c) 第1993/46号决议，题为“将妇女权利纳入联合国的人权机制”，委员会在决议中要求它的所有特别报告员和工作组将掌握的有关侵犯妇女人权的情况定期和有计划地列入他们的报告；
- (d) 第1993/47号决议，题为“人权和专题程序”，委员会在决议中建议已邀请任何专题特别报告员访问它们国家的政府考虑接受后续访问，鼓

励各国政府对提供资料的要求迅速做出反应，以便有关的专题特别报告员可有效地履行其职责。它还鼓励在人权领域里遇到问题的各国政府通过相应的专题程序与委员会更密切地合作，特别是邀请专题特别报告员或工作组访问它们的国家。委员会还鼓励专题特别报告员和工作组在各自职权范围内密切注视各国政府所进行的调查取得的进展，请他们在报告中收入按性别分列的资料，以及他们对答复问题的意见和分析的结果；

- (e) 第1993/48号决议，题为“在居民中制造恐怖的武装集团和贩运毒品份子的暴力行为对人权的享受所造成的后果”，委员会在决议中要求特别报告员继续特别注意这种暴力行为对享有人权的有害影响；
- (f) 第1993/64号决议，题为“同联合国人权机构代表合作”，委员会在决议中促请各国政府不要采取任何行动恐吓或打击报复那些与联合国人权机构代表合作的人、那些利用在联合国主持下制订的保护人权程序的人或为该项目的提供法律帮助的人，以及根据人权文书所确定的程序提交来文的人和侵犯人权行为受害者的亲属。决议还要求人权机构的代表继续采取紧急措施，帮助制止这种恐吓和报复事件的发生。

## 一、职权范围和工作方法

5. 特别报告员在履行人权委员会第1992/32号决议和委员会其他决议交给他的任务时，遵循了保持连续性的原则。因此，他的工作主要有以下几类活动：

- (a) 向各国政府、专门机构和政府间和非政府组织索要和从它们那里接受可信和可靠的资料；
- (b) 向政府发出紧急呼吁，要求澄清有关个人的情况那些人的情况，使人有理由担心属于特别报告员职权范围的待遇问题可能发生或正在发生；
- (c) 向政府转交上面 (a) 中提到的那类资料，表明属于特别报告员职权范围的行为可能已经发生，需要采取法律或行政措施，防止这类行为的发生；和
- (d) 探讨对有关国家进行访问的可能性，以便更直接地了解属于特别报告员职权范围内的案件和情况，找出防止这种事件再次发生或改进状况的措施。

6. 在紧急呼吁方面，一国政府(土耳其，1993年9月10日信函)正式要求、另一国政府非正式要求特别报告员澄清他决定发出紧急呼吁的标准。对这两起要求他分别向两国政府表示，既然他们提出了一个普遍关注的问题，他将在本报告中论及这个问题。这将使人权委员会注意到这个问题，并提出它可能认为适当的指示。在这方面，特别报告员请委员会注意他的前任在给委员会第四十八届会议提出的报告(E/CN.4/1992/17)中的有关段落。他在第14段中说：

“紧急呼吁程序从根本上说不同于转送关于指控酷刑案件的信件。每当特别报告员收到资料，表明某人被捕，并表示担心此人可能会受到酷刑，特别报告员就发出紧急呼吁。除其他外，此种担心的基础可能是亲属和其他访问者对被拘留者身体状况的叙述，或是被拘留者单独监禁的事实，因为这是容易发生酷刑的条件。特别报告员的紧急呼吁完全是人道主义性质。只是要求有关政府向特别报告员保证，被拘留者的身心健康将得到保障。此外，这样的呼吁使政府有机会调查这一问题，指示实施拘留的当局尊重工人身心健全的权利，从而坚持该国在国际法下的义务。”

7. 从这段解释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该项程序的核心本身并不是指责性的。它的基本性质和目的都是预防性的。特别报告员可从有关政府得到的最令人满意的答复，是提出证据表明所表示的担心没有发生。因此，特别报告员不能也不应该等待他收到证据，证明酷刑已经或正在发生才发出紧急呼吁。那将破坏这项预防性措施

的效力。问题只能是是否有充分理由相信，某人遭到拘留的情况表明有明显遭受酷刑的危险。特别报告员必须迅速做出判断，在做出判断时他需考虑到若干因素，其中任何一个都可以是充分的，尽管一般说来可不止一个因素存在。这些因素包括：

- (a) 消息来源的可靠性历史；
- (b) 消息本身的一致性
- (c) 消息与特别报告员掌握的该国其他案件的材料之间的一致性；
- (d) 是否有来自该国的权威性酷刑行为的报告，如官方调查委员会；
- (e) 其他国际机构的调查结果，如联合国的国别报告员和代表、人权委员会、反对酷刑委员会和区域人权机构，特别是欧洲防止酷刑和非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委员会；
- (f) 国家立法的存在，如允许长时间单独监禁的立法，这种立法可起有利于制造酷刑的作用；和
- (g) 直接或间接向某个国家或领土引渡或驱逐的危险，在那里可能存在有上述一种或多种情况。

8. 以上并不是完全没有遗漏的清单。紧急呼吁通常也不会指明特别报告员所考虑的是哪些因素。这是因为特别报告员认为，他必须对手中的案件做出自己的判断，保护人的尊严和人身健全的原则，要求他宁可为保护其职权范围内可能的受害人而犯错误，也不能贪图避免为各国政府带来行政上的不便。此外，发出的呼吁中载有的正式证据越多，它们也就越象是提出指控。这种效果是与紧急呼吁程序的预防性质和目的不相称的。

9. 关于指发生有违反特别报告员职权范围内禁止的各种待遇的情况，在转交这类资料方面，特别报告员继续向各国政府转发引起关注的资料摘要。由于 P. 科伊曼斯先生的辞职和其继任人的任命之间的空缺，仅到1993年8月才有可能开始处理和转发载有这类资料的信件。另外一批信件在1993年10月/11月发出。一般对一个政府只可能发出一封信，而不管特别报告员收到的材料数量和质量如何。这种情况很不幸，首先因为各国政府应当尽快掌握有关的材料，其次，由于材料在下半年发出，留给收到答复的时间便很少，难以在特别报告员该年度的报告中反映出来。这造成了甚至最初的信函交往也被收入不止一份报告之中。它又进而使读者很难对最初的指控取得较为平衡的看法，和估价政府此后任何答复的重要性。另外，在向政府发出信件之后收到的很多资料都不得不等到第二年才能再转给该国政府。再有，如果政府的答复在特别报告员看来需要做出解释，他只能在下一次转发资料的

信函中要求加以解释。

10. 这种僵化的作法是由于中心为特别报告员履行职权提供服务的资源有限。然而尽管有这些困难，特别报告员仍设法实行了与提出指控的人就官方对指控做出的答复进行磋商的办法，特别是在事实似乎有冲突的情况下。

11. 特别报告员认为，本着受害人和政府双方面的利益，他应当能够(a) 向政府转交向他提出的所有指称酷刑案件和行为的可信和可靠资料；(b) 分析从政府收到的答复；(c) 酌情与提出指控的人就这些答复进行磋商；(d) 必要时与政府进行对话；和(e) 根据这些有系统的交流，得出结论和向政府提出建议。就本报告未能反映这一想法而言，那是由于前面所指出的资源有限的缘故。尽管如此，特别报告员认为，除非人权委员会提出其他意见，他应尽量争取根据上述方针开展工作。

12. 最后，对特别报告员职权的这个方面，他希望提请委员会注意一个国家政府提出的问题(印度，1993年12月9日信函)，该国政府说：“特别报告员的职权范围也应考虑进恐怖主义制造的侵犯人权行为”。特别报告员认为，恐怖主义的问题属委员会第1993/48号决议的范围(见导言第4段(e))，其中讲到“在人民中间制造恐怖的武装集团在很多国家不断采取暴力行动，对享有人权造成有害影响”。

13. 特别报告员注意到 1993/48号决议同它前面的决议一样，没有说这种暴力行为是对人权的侵犯。特别报告员认为，这一忽略是有意的。他认为，委员会不想抬高刑事暴力犯罪份子的身价，把他们说成是侵犯人权者，或更进而把他们当作好象是具有某种权威属国际法律保护人权的范畴来对待。特别报告员当然十分清楚适用于武装冲突的国际法，不论是具有国际性质的冲突还是不具有国际性质的冲突，都禁止冲突的任何一方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使用酷刑。特别报告员可以设想，他的职权可扩大到这种冲突的任何一方。他欢迎委员会给以指示，他是否应寻求将他的职权范围适用于武装冲突各方的行为。如果是的话，他还希望进一步指明他应如何确定这种冲突的存在，那些实体被视为冲突各方较为合适：举例来说，他是否应以有关成员国政府的意见为准？在此同时，在他收到有关武装集团不断制造暴力行为的报告时，在那些行为属于他职权范围内的情况下，特别报告员将继续酌情予以接受。

14. 根据以上所述的情况，特别报告员在本报告所涵盖的期间向31个国家的政府发出了84份紧急呼吁，涉及大约400名个人(至少已知12人为妇女)，以及若干群体，有人表示担心他们遭到酷刑。他还发出了42封信函，涉及大约500起指称的酷刑案件(已知大约30个为妇女)或事件。如果收到的材料中带有对酷刑现象所作的具有一般性质的批评分析，则还要将该材料转交有关政府注意。此外，这一年里有20个国家就大约250个提出的案件向特别报告员作了答复，另有17个国家对前几年提出的大约130个案件作了答复。

15. 对指称发生严重酷刑事件的国家和领土进行访问的问题,自特别报告员接受任命以来还没有进行过这种访问。人权委员会在1993/97号决议中特别敦促印度尼西亚政府邀请特别报告员访问东帝汶。1993年9月13日,特别报告员致函印度尼西亚政府,提请它注意上述决议。迄今为止他还没有收到答复。

16. 尽管委员会一再敦促各国政府,最近一次是在第1993/40号决议中,“认真考虑邀请特别报告员访问它们的国家,以便使他能够更有效地完成他的任务”,但还没有任何一个政府采取主动,邀请特别报告员。虽然如此,他已同一些政府进行了接触,他相信这些接触可导致他受到邀请进行访问。这些接触的结果(希望是积极的),将在特别报告员给委员会的下一份报告中作出交代。

17. 在这里,特别报告员了解,在人权委员会和在世界人权会议上对联合国各人权程序之间的合作和避免不必要的重复所表达的要求(见下一段)。因此,他通常将不寻求对联合国已在那里建立国家专门机构的国家进行访问,如有关该国问题的特别报告员,除非似乎已向两方面提出了联合访问。在可能还涉及到其他专题机制职权范围的国家,他将力求与它们进行磋商,以便联合和平行地与有关政府探讨联合访问的可能性。无论如何,他将在一般情况下力求避免同时进行访问。同样,在反对酷刑委员会根据《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第20条正在审议或刚刚审议过某国情况的条件下,特别是如果该次审议包括对有关国家的访问或可能进行访问时,特别报告员也将避免重复访问。

18. 在总体上,特别报告员欢迎委员会强调负责解决酷刑问题和类似的严重侵犯人权情况的各机构之间的合作。他特别指出,委员会在1993/40号决议第16段中认为,特别报告员宜继续进一步与负责反对酷刑的各方面机制和机构交换意见,特别是为了进一步加强其有效性和相互合作;又在第1993/47号决议第9段中鼓励专题特别报告员和工作组继续与有关条约机构和国别报告员密切合作。

19. 另外,世界人权会议的《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也在第二部分说:

“1. 世界人权会议建议增强联合国系统内支持人权和基本自由工作的协调。为此,世界人权会议促请所有联合国负责人权活动的机关、机构和专门机构进行合作,在考虑到避免不必要重复的同时,加强、精简其活动,并使之合理化。世界人权会议还建议秘书长请联合国有关机构和专门机构的高级官员在其年度会议上,除协调其活动外,也估评其战略和政策对享有所有人权的影响。”

“88. 世界人权会议建议国际人权文书的缔约国、大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审议研究现有的人权条约机构以及一些专题机制和程序,以期考虑

到必须避免职权和任务的不必要的重复重叠，更好地协调不同的机构、机制和程序，提高效率和效力。”

20. 在这方面，特别报告员发现筹备委员会第4次会议和世界会议本身所提供的与其他程序进行正式和非正式接触的机会极为宝贵。这些接触和其他非正式和正式会议，如1993年12月与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举行的会议，使他能够随时了解其他程序的工作方法，特别是其他专题程序，这样不仅可以避免上述段落中所谈到的那类重复，还可协调它们的工作方法和报告程序。特别报告员认为，委员会在第1993/47号决议中向秘书长提出的要求可能会很有作用，委员会请秘书长考虑是否有可能召集一次由人权委员会所有专题特别报告员和各工作组主席参加的会议，从而使他们能够交流意见，进行更密切的合作。在世界人权会议承认应“通过定期会议对这些程序和机构进行协调和使之合理化”之后，特别报告员期待着这种会议的举行。

21. 另外，根据委员会第1993/40号决议第16段(见上文第18段)，特别报告员与援助酷刑受害者自愿基金的监理委员会举行了1次正式会议。他向委员会保证，他将继续他的前任对委员会工作的支持，鼓励对基金的捐款，并酌情向可能从基金提供的援助中受益的人传播有关基金工作的情况。

22. 特别报告员还考虑到了委员会第1993/41号决议，题为“司法执行工作中的人权”，委员会在决议中请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探索在司法工作领域与人权方案合作的方法和途径，特别强调准则和标准的有效执行。

23. 他为此接受了参加该委员会第二届会议的邀请，他在会上强调了在刑事司法领域通过的准则和标准对他本人工作的重要性。特别重要的有：《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1955年)、《保护人人不受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处罚宣言》(1975年)和《执法人员行为守则》(1979年)。特别报告员深感欣慰，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作出决定，将《最低限度标准规则》作为应立即审查其执行情况的文书之一。特别报告员认为，应允许他参加该委员会今后的各届会议。

## 二、特别报告员审查的有关各国的材料

### 阿尔及利亚

#### 转交政府的资料和收到的答复

24. 特别报告员在1993年8月26日的一封信中通知该国政府,根据他收到的报告,1992年10月生效的新反恐怖分子法将警察拘留的时间从48小时延长到12天(期间囚犯被秘密监禁,不得与他的家属或律师接触)。这种情况据说造成了容易出现酷刑和虐待的条件,据说一些拘留中心有组织地实行酷刑和虐待。向政府转发了以下各段所记述的具体案件。

25. Nadir Hammoudi,据说于1992年10月9日被安全部队的人员在阿尔及尔市中心他的家中逮捕。据说他在警方羁押的29天里受到酷刑。

26. 对这一案件,政府在1993年11月15日指出,Nadir Hammoudi 在1992年10月27日被捕后,于1992年11月7日被带到阿尔及尔政府检察官办公室,根据反颠覆和恐怖主义法受到起诉。“全国人权观察中心”(ONDH)曾与有关当局接触并多次与Hammoudi先生本人见面,以便掌握有关他被捕和受拘留情况的准确材料。ONDH 还没有收到答复。另外,被告的父母和他的律师都没有提出任何投诉,要求进行司法调查或法医鉴定。

27. Mohamed Yassine Simozrag,据称1993年7月23日在阿尔及尔他的家中被捕,被单独监禁20多天。他的家属和律师设法于8月18日到 Al-Harrach 监狱探访,发现他受伤。据报告说,他称自己曾受到一种酷刑的折磨,使用的方法是将受害人绑在椅子上,用一块用脏水和化学药品浸湿的布令他窒息。

28. 1993年11月15日,政府通知特别报告员,Mohamed Yacine Simozrag 于1993年7月28日与另一个因参与若干起袭击事件受到通缉的恐怖分子同时被捕。在法律拘留期满后,他被带到阿尔及尔政府检察官办公室,在根据镇压恐怖主义和颠覆活动法对他提出起诉后对他发出了拘捕令。指定了两名律师代表 Simozrag 先生和为他辩护,两名律师定期对他进行访问。

29. 在提出被告在拘留期间受到虐待的指控后,ONDH 向有关司法当局提出一系列交涉。其中一位律师在与 ONDH 接触时说,没有提出法医鉴定或对拘留期间受到虐待进行司法调查的要求;对他的当事人进行探视后使他确定,后者没有受到身体



上的伤害。

30. 政府在1993年11月15日的同一封信中表示,该国政府在酷刑问题上的立场一向并将继续是坚决和断然地谴责这种丑恶行径。阿尔及利亚加入《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而未作任何保留,特别表明了这一立场。

31. 尽管遇到宗教极端主义造成的恐怖主义活动,阿尔及利亚继续努力在国际上公认的人权原则范围内捍卫民主和保护人权。因此,对行使某些自由暂时的限制并未超出《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盟约》所明确规定的限度,阿尔及利亚是该《盟约》的缔约国。此外,任何形式的侵权行为都有机制加以控制,该机制为有关的人和为他们辩护的人提供一切机会,揭发那种行为,如侵权行为得到证实,将受到依法处理,肇事者受到惩罚。显然特别报告员收到的对阿尔及利亚立法“有关酷刑”的某些方面提出的指控纯属无稽之谈,阿尔及利亚根本不会对之予以理睬。

#### 紧急呼吁

32. 1993年9月16日,特别报告员向该国政府发出紧急呼吁,对 Ameer Legraidi 和 Fathi Ouerghi 两人的情况表示关注,这两个人是突尼斯人,据称是非法的伊斯兰运动“那赫达”的成员。据报告说,他们担心作为该运动的成员可能受到迫害,于1992年离开突尼斯。据称 Ameer Legraidi 在突尼斯被缺席宣判11个月监禁。报告说这两个人在阿尔及利亚申请政治避难,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将他们作为难民登记。阿尔及利亚外交部无国籍者和难民局据说给了他们临时居住许可。1993年6月13日,他们在阿尔及尔被捕。鉴于有报告说,七名突尼斯人在1993年1月被从阿尔及利亚强行遣返后,遭到突尼斯当局的逮捕和酷刑,因此有人担心这两个人如遭到驱逐可能也会受到同样待遇。

33. 1993年10月29日,政府答复说,这两起案件不能被认为属于人权委员会为特别报告员指定的职权范围内的情况。然而鉴于阿尔及利亚重视与人权委员会专家的对话,该国政府告知特别报告员,这些案件已与有关机构即难民署进行过详细探讨。该国政府回顾说,对申请难民地位的外国人,各国给予那种地位的特权,它否认了外交部无国籍者和难民局曾给予 Ameer Legraidi 和 Fathi Ouerghi 居住许可的说法。

34. 政府还报告说,阿尔及利亚从没有放弃作为一个收容国的责任,而且这一点已被列为一个宪法原则,它始终关注的,是根据它一向坚持的人道主义价值和团结

精神对真正的人道主义请求作出反应。在宗教极端主义的恐怖主义表现面前,阿尔及利亚从建立紧急状态以来已一再重申,它致力于人权事业,并表明它决心把安全方面采取的行动建立在充分尊重它作为缔约国的国际文书的规定基础上,特别是那些有关行使减损权的规定。因此,所有为加强法治和巩固民主体制而采取的安全措施,都符合阿尔及利亚在人权领域所作的国际承诺。在阿尔及利亚必须解决的一些人道主义案件中也表现出了类似的关注,而且这些案件的处理都符合阿尔及利亚一向坚持的对寻求保护的人给予庇护的神圣原则。

35. 1993年10月18日,消息来源报告说,Ameur Legraidi 和 Fathi Ouerghi 曾在阿尔及尔得到难民署承认,作为需要保护的难民,他们于1993年7月8日被交给突尼斯当局。

## 意见

36. 特别报告员赞赏阿尔及利亚政府与人权委员会专家对话的承诺。他注意到,该国政府没有解释,它为什么认为外国国民有被驱逐的危险并最终被驱逐到一个他们有遭受酷刑危险的国家这种案件不属于他的职权范围。在这一点上,他仅仅是继续了他的前任和其他专题程序的做法。而且,阿尔及利亚作为《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或处罚公约》的一个缔约国,根据公约第3条不得进行这种驱逐。至于政府驳回有关允许长时间单独监禁的立法可造成酷刑的关注,特别报告员指出,这方面的关注一直是他的前任采取行动的动机,人权委员会也有此关注:最近一次,1993年3月5日就在任命特别报告员的第1993/40号决议中,委员会回顾说:“单独监禁特别容易导致酷刑”。特别报告员欢迎阿尔及利亚政府的公开承诺,尽管有“宗教极端主义的恐怖主义表现”存在,仍坚持尊重人权,特别是绝对禁止酷刑。他认为,如果避免采用长时间单独监禁,还可使这项承诺更为有效。

## 安哥拉

### 转交政府的资料

37. 1993年8月26日,特别报告员向该国政府转交了据称发生在安哥拉的以下两起酷刑案件。

38. Charles Mpoti,1990年10月5日在罗安达被捕,罪名是安盟组织成员,被关

进 Estrada Catete 监狱,据说受到酷刑。之后不久从国外提出的法医报告说, Mpoti 先生左肩扭伤,弯曲神经受到损伤,使他不能抬起手臂。还发现他有臀部烧伤引起的严重后遗症。他于1992年10月14日再次被捕,又在 Estrada Catete 监狱被关押了3个星期,据说又再次受到酷刑。

39. Godfrey Absalom Nangoya,安哥拉公民联盟的成员和该组织人权方案的领导人之一,他在1992年11月1日在罗安达他的家中同他的妻子和孩子一同被捕。他们被带到一个警察所,据报告 Nangoya 先生和他的妻子在那里遭到毒打,并且当着他们孩子的面。结果,他的一颗牙齿被打掉,一只胳膊被打伤。他的妻子和孩子4天后获释,而他被转到 Estrada Catete 监狱。据报告,一天晚上,当他正在牢房里睡觉时,一名看守朝他开了一枪,险些将他打死。

### 孟加拉

#### 转交政府的资料

40. 特别报告员在1993年8月26日的信中通知该国政府,他收到了有关军队和准军事部队人员对Chittagong Hill Tracts部落居民以及警察在该国其他地区制造酷刑事件的报告。根据上述情报,在警察羁押期间发生酷刑乃是家常便饭,但很少有人报告,因为受害人担心会受到警察的进一步虐待。常见的酷刑有用棍棒和枪托毒打,以及用皮靴踢身体的敏感部位。

41. 报告说,羁押期间强奸的比例很高,但由于受害人会受到社会歧视,因此常常不敢报告。法律上要求强奸必须在12小时内报告,这也使得受害人很难提出起诉。

42. 还有关于在羁押期间由于酷刑而死亡事件的报告。据这些报告说,只要有被拘留者在警察羁押期间死亡,警方就必须提出一份“非自然死亡案件”,它要求警方必须对死亡进行调查。这避免这样做,警察有时将因酷刑死亡者的尸体转移到医院,对医务人员施加压力把他们假装作为活人收进医院。

43. 以下各段所记述的是转交政府具体案件。

44. Mominuddin Ahmed, 1992年8月18日在他的家中被穿制服的警察逮捕,押往Rangpur Kotwali 警察所。当他的妻子两个小时后到警察所看望他时,他只能勉强说话,告诉她他的胸部和腹部被严重踢伤。他于9月1日死于Rangpur医学院的医院。

45. Momina Khatum, 据报告在一批警察对她毒打之后,于1992年8月31日在 Noakhali 区 Bazra Hat 村因伤势严重死亡。报告说已对该事件进行了调查。

46. 最后,特别报告员请该国政府注意 Nazrul Islam 的案件,据报告他在1980年被捕时12岁,被判处抢劫罪。1992年12月,据称高级法院发现他一直非法拘留,在那12年中,他有11年戴脚镣。

#### 政府对以往报告中的案件提供的资料

47. 1993年4月6日,政府向特别报告员提供了以下案件的材料,这些案件是在1992年11月12日转给政府的。

48. 1991年3月25日在库什蒂亚县北 Bheramara 发生的事件,据称牧场防护警察的人员逮捕了5个人并对他们进行毒打。政府告知特别报告员,1992年3月26日,在 Bheramara 的部分群众与在那里值勤的部分执法官员之间发生口角之后,发生了一起不愉快的事件。1人在事件中因武装值勤人员开枪死亡。政府成立了一个由县地方法官主持的调查委员会。调查结果,22人被判有罪,开除出政府机构。

49. Milan Kanti Chakma、Upali Chakma、Syamal Kanti Chakma、Dipankar Chakma 和 Bimalendu Chakma, 据称1992年3月20日在 Koakhali 军营受到酷刑。政府告知特别报告员,这些人因调查强行为恐怖主义组织捐款、替恐怖主义组织张贴标语、为恐怖分子采购供应品和非法持有武器而被召到军营。在对他们进行审问后当天便予以释放。他们没有受到任何身体或精神上的折磨。所谓毒打、电击、往鼻子里灌热水和吊在树上的指控纯属子虚乌有。

50. Silcham Chakma、Master Kamal Chakma、Barpeda Chakma、Priyalal Chakma、Kula Mohan Chakma 和 Pindu Mohan Chakma, 据称1992年5月20日在 Ghagra 区 Champatali 营地受到酷刑。政府答复特别报告员,这些人中没有一个曾被逮捕和带到 Ghagra 区的 Champatali 营地,指控完全是虚假和编造的。

51. Bina Chakma、Mita Khisa、Rakhi sona Khisa、Kakuna Chakma、Royna Chakma、Urbasi Chakma 和 Tipu Rani Chakma, 据称1992年3月14日遭到 Chowdhuri Ghara 军营人员的强奸。政府答复特别报告员,在 Krishmachara 村只能找到其中3名妇女, Rakhi Aoma Khisa、Royna Chakma 和 Tipu Rani Chakma could。当地村民根本不知道还有另外4名妇女的存在。那3名妇女报告说,一个流动巡逻队于1992年3月14日到过该地区,并指称巡逻队的人员打过她们。但她们无法证明或提供任何挨打的证据。没有强奸的指控。

## 玻利维亚

### 政府对以往报告中的案件提供的资料

52. 1992年12月9日,政府发来了它对 Alvaro Garcia Linera、Raquel Gutierrez de Garcia、Victor Ortiz 和Macario Tola 据称在1992年4月受到酷刑的答复。据政府答复说,被指控为恐怖分子的人被监禁后,他们的家属和一个由人权代表组成的委员会便立即进行了探监。他们之后宣布,被监禁的人身上带有被电击和受过残酷折磨的痕迹,他们的指甲上甚至有钉子的穿孔。考虑到这些陈述,内政部召集了报界、人权代表、家属和医务界的人员,请他们参观监狱和亲眼作出公正的检查。然而家属和人权组织的人员没有参加那次访问。

53. 访问期间,发现的证据只是Raquel Gutierrez de Gaccia手上的烧伤,而没有上面声明中所说的她身体其他部分的烧伤;烧伤是由于她在拘留期间两次自杀未遂造成的;第一次,她把手指伸进了电灯插作,第二次,在清理电动洒水系统时她扯出了其中的电线;这两次自杀都被负责监管她的警察抢救过来;她在向报界和审理案件的法官所作的陈述中都证实了这两次未遂自杀。

54. 对Alvaro Garcia Linera、Victor Ortiz和Macario Tola,探监委员会没有发现他们受过酷刑的证据,司法部门任命的法医出具的法医证明可以为证。提出受到酷刑的起诉仅仅是为了新闻宣传,因为不可能对他们从科学上或专业角度加以证明。

55. 特别报告员将政府提供的材料转给了发件人,并请他提出意见。后者又重申,上述4人称他们曾受到严重酷刑。1992年4月21日,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在Chonchocoro监狱探视了Alvaro García Linera、Macario tola 和Victor Ortiz,看到了他们身上的伤痕,与他们受到酷刑的指控相符。发件人还提供了一份报告,载有Raquel Gutiérrez de Gaccía对她所受到的酷刑的记述,并说由于酷刑她试图自杀。

## 巴 西

### 转交政府的材料和收到的答复

56. 1993年11月18日,特别报告员向政府转交了以下各段记述的案件。

57. Osorio Barbosa de Barros,农村工人,1993年9月8日被捕,被押往帕拉州的Xinguara警察所,在那里被关押到9月12日。那一天他被政治和社会治安警察转移到Curionópolis警察所,在那里又被关押一天后释放。在整个关押期间,据称他遭到毒打,被用电击头部,受到假绞刑处死和在一条小河中淹死。

58. Ademir Silveira dos Santos 和Moises Silva do Nascimento,两个流浪街头的12岁儿童,据报告1993年4月13日他们在圣保罗的Praça da Sé遭到军事警察人员的毒打。一位从事街头教育的神父Pedro Horacio Caballero目睹了事件,试图进行干预,也遭到毒打。在事件被揭露后,该州的民事和军事警察对事件进行了调查。

59. 1993年11月29日,政府告知特别报告员,军事警察的纪律检察机关于1993年4月14日开始了调查,投诉人正式认出了6个肇事者,受害人已在军事警察的医院接受检查。调查尚未结束。

## 保加利亚

### 转交政府的资料

60. 特别报告员在1993年8月26日的信中告知该国政府,根据他收到的材料,罗马族的人在被指控犯有轻微罪行收监后,常常受到警察的酷刑和虐待。已有若干起警察过度使用武力事件的报告,包括在罗马族住区不分轻红皂白地殴打男人、妇女和儿童,如1992年6月28日Pazardjik和1993年4月5日在Novi Pazar发生的事件。以下为向政府转发的几起案件。

61. Anton Stefanov Assenov,14岁,和他的父亲Stefan Assenov Ivanov,据称在Shumen汽车站被警察用拳头和棍棒拳打脚踢,他们称这个男孩子在赌博时被抓获。之后他们被带往警察所,在那里Anton Stefanov又遭到毒打,并被用手拷拷在暖气上达两小时,然后未经起诉获释。两天后一位医生对他进行了检查,据报告该医生

说,他的伤势--头部、背部、胸部和右腋下受伤--与指称的殴打一致。已向内务部地区司和Varna的军事检察官提出起诉,但迄今仍无结果。

62. Khristo Nedialkov Khristov,1993年3月24日在Stara Zagora被一批警察逮捕,指控他企图偷盗铜线缆。据报告,他被捕后当即遭到警棍的殴打,全身上下被用重皮靴乱踢。第二天获释后,不得不立即将他送往区医院。3月28日,他的情况恶化,必须开刀治疗,手术后切除了部分肺和一側肾脏。

### 布隆迪

#### 转交政府的资料

63. 特别报告员在1993年8月26日的信函中通知该国政府,根据他收到的材料,由于政治原因被捕的人,特别是涉嫌胡图人民解放党(PALIPEHUTU)成员的人,在宪兵和公共治安警察管理的拘留中心遭到有组织地殴打。酷刑使用的方法包括:将被拘留者的两臂紧紧捆绑于背后,直至两肘相遇,绳索嵌入胳膊,结果,一些囚犯身上出现溃烂,还有的人胳膊瘫痪;殴打脚板、背或手掌;强迫长时间跪立,有时跪在瓶子或石头上;使用刺刀、管子、木棍或砍刀造成伤害。

64. 报告还指出,据了解当局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防止酷刑,或对指控的酷刑下令作任何独立和公正的调查。法庭的法官不对羁押期间作为起诉证据所作的陈述是否能够接受提出任何问题,尽管被告提出上述陈述是被迫作出的,并出示了与酷刑指控相符的伤痕。1992年的宪法禁止酷刑,但计划中的刑事诉讼法改革据报告并没有将保护被拘留人免受酷刑放在优先地位。以下各段为提出的具体案例。

65. Emmanuel Nkuzimana,据说1991年9月在Gitega被治安部队人员逮捕后遭到毒打,他们指控他是胡图人民解放党的成员。有报告说,他的生殖器被人用锋利物件刺伤。

66. Paul Hakizimana 和 Evariste Sinyirimana,1990年8月在武装袭击南部Makamba省Mabanda军营后被捕。据报,Paul Hakizimana 双腿和两臂被紧紧反剪于背后,然后用刺刀扎他;据称他还遭到毒打,受到假处决,头发被用火点着。Evariste Sinyirimana 据称被人用锋利的图针扎生殖器,由于两臂肘关节以上部分被长时间捆绑而一度造成瘫痪。他们之后被从Mabanda营地转移,先押往西南部Bururi省的Rumonge监狱,尔后又押往Mpimba监狱,据称抵达那里时又遭到毒打。

67. 特别报告员在同一封信中还提醒该国政府他在1992年8月21日发给他的另一封载有指控的信,指出他迄今还没有收到答复。

### 紧急呼吁

68. 特别报告员于1993年4月21日向该国政府发出一份紧急呼吁,有关布隆迪争取民主阵线Bujumbura农村去代表Joseph Bangurambona,他在1993年3月29日遭到Roulage特别警察的逮捕。有人表示担心,他可能受到酷刑。

### 喀麦隆

### 转交政府的资料

69. 1993年6月10日,特别报告员通知该国政府,根据他收到的材料,尽管《刑法》禁止酷刑,规定法庭不接受通过酷刑取得的证据和禁止公职人员对任何人使用武力,但治安部队继续对被拘留者进行殴打和加以其他虐待。酷刑的办法包括:用铁棒打脚掌或用加钢丝的橡胶棍抽打。监狱制度内犯人的待遇很差,特别是在主要城市地区以外。犯人们常常被用镣铐锁在牢房内,得不到适当的医疗和食物。在Tchollire2号监狱,据报告这样的条件在1990到1992年期间至少造成了40名囚犯的死亡。

70. 据报告,对于制造酷刑的人没有采取过什么制裁,尽管政府官员坚持说,他们受到了行政处罚,但并未予以公布。进行调查的情况十分罕见,因为受害人常常担心如果他们提出起诉会引起对他们自己或他们的家属进行报复。

71. 根据各种报告说,1992年10月27日实行两个月的紧急状态后,西北省的虐待情况更加恶化。据报在Bamenda 有几百人被捕,在混合机动旅或宪兵团的司令部受到殴打。以下为转交政府的若干案件。

72. Ghandi Che Ngawa,据报11月9日在Bamenda他的办公室被捕,被押往混合机动旅,据称在那里将他的胳膊和腿捆起来吊在一根铁棍上,对他进行毒打。4天后他被转往军队医院,可以明显地看到他的身体肿胀和受伤,几个脚指甲已经不见。一个星期后他因伤势死亡。另外还有5个被拘留的人与 Ghandi Che Ngawa 同时被送往军队医院。据报告他们在混合机动旅每天都要挨打,受电击。

73. Rose Ngo Sona,一位仍在哺乳的母亲,10月28日一群士兵闯入她在



Bamenda 的家中，去逮捕他的兄弟 Barrister Sendze，但将她的衣服剥光进行毒打。

74. 1992年10月，西南省也发生骚乱。据报告说，在Meme区的Kumbha市受到当局纵容的团伙抓住了一批人，对他们实施酷刑。其中几起事件如下。

75. Ikaabo Christopher Ambaisah, 10月13日被抓，被押往区办公室，据称他在那里被人用铁棍和粗木棍毒打，然后于当天获释。

76. Ruben Tarh, 10月22日被抓，被人用电缆线和带有钉子的木板殴打。据说抓他的人把橡胶放在火里熔化后将炽热的液体倒在他的背上。他们还将他头朝下捆绑起来，用电缆线对他抽打，然后又把他吊在那里长达1个小时。

77. Thomas Mbah, 10月22日被两个便衣和3个穿制服的士兵招到头人Mukete的大院中问话。据说他一到那里就被人用藤条抽打了25鞭，又用灼热的铁棍烧伤他身上多个部位，再用刀砍伤他的左肩。

78. 在西部省的Bandja村，1992年11月5日准军事部队的人员逮捕了以下一些人：Emmanuel Kameni Mouaffa、Joseph Fankam、Raphel Lieji、Michel Tankeu、Blaise Tseussie、Bernard Ngaoum、Engolbert Wamboyi、Pierre Kameni 和 Michel Tankeu。据报告，他们在被捕时都遭到棍棒、皮鞭、枪托的殴打。

79. 还有报告说，1992年6月在西北省的 Ndu 也发生了一系列骚乱，期间一些公民，包括妇女和儿童，遭到殴打和性虐待，如社会民主阵线Donga/Mantung (Ndu) 南选区的宣传秘书Biena Mary Kimbir 的例子。她于1992年6月6日被6名警察(宪兵)逮捕，带往Ndu的宪兵队司令部，据报告，她在那里被剥光衣服，挨打和受到性侵犯，之后又被关押了4天不给食物和水。大约在6月12日，她被转移到邻近Nkambe城的宪兵队司令部，她在那里被单独监禁，不许与家属或律师有任何联系。6月19日，她被带到Nkambe的宪兵队司令部，报告说在那里她与另一位被拘留的妇女受到皮鞭抽打，挨打后她无法走路。她被关押了31天。

80. 以下是另外3起转交政府的案件。

81. Severin Tchounkeu, 法语周刊“La nouvelle expression”的发行人，和Tsapi, “Challenge Hebdo”周刊的漫画画家，1992年11月2日在 Douala 被警察逮捕。据报告这2人在被捕时遭到殴打，Tchounkeu先生因多处骨折不得不住院治疗。

82. Ange Tokam Guiadem, 学生领袖，据报告1992年5月5日在雅温得大学被大约12名宪兵逮捕。据称他们将她衣服剥光在校园示众，并对她拳打脚踢。其他试图干预的学生被宪兵们驱散。Guiadem女士被带往一间停车房，据称在那里宪兵们继续

对她殴打和调戏达两天之久,并用碎玻璃片刮掉了她的头发。之后她又被带到宪兵队的拘留所,在那里一直被关押到5月11日获释,没有对她提出起诉。

#### 政府对以往报告中的案件提供的资料

83. 1993年3月2日和8月12日,政府寄来了有关1992年11月5日被捕的Hameni Bieuleu案件的材料,特别报告员曾于1992年12月2日为他发出过紧急呼吁。根据政府的材料,Hameni Bieuleu 先在雅温德后在巴门达被关押在国家宪兵队的驻地,直到1992年12月28日他获释,喀麦隆刑法关于审判前程序的规定得到了严格遵守。与所报告的指控相反,他从未受到任何虐待,也没有剥夺他进行医疗。事实上,在他被捕后的第二天,便对家属提出的探视要求,批准了他的家属和雅温德总医院Nouedoui 医生前往探视并带去了他们提出的食物(附Nouedoui 医生写给国防部长的信,提出应将Hameni Bieuleu送往医院)。在雅温德和巴门达的两位专家检查后,证明较早的医疗检查证明Bieuleu先生患有糖尿病是假的。根据全国人权和自由委员会在Bieuleu 先生被拘留期间对他进行采访后发表的调查报告,他从没有提出过受到虐待。

#### 乍 得

#### 紧急呼吁

84. 特别报告员为以下几段中提到的人发出了4份紧急呼吁,有人表示担心,他们可能在羁押期间受到酷刑。发出紧急呼吁的日期放在相应的简要情况后的括弧内。

85. Serayohim Doyo中尉、非现役军官Hassane Kabo、Ndouba Njadimadje 上士和Joachim Nodjihorkem Mbailaou 少尉,均为乍得国民军(ANT)人员。根据所收到的材料,前3个人于1993年2月6日在多巴被捕,罪名是与争取和平和民主国家新生委员会有接触。据称他们遭到殴打,之后于2月15日被转移到蒙杜的军事基地。Joachim Nodjihorkem 据报在被他的长官紧急召到蒙杜后于2月23日被捕。据称4个人都被单独监禁(1993年4月8日)。

86. 1993年8月8日在一次示威游行期间据说与治安部队发生了冲突,据报有大约220人在恩贾梅纳被捕。大多数示威者是Ouaddai族的人,他们抗议据说在乍得东部他们的原籍地区进行的处决活动。被逮捕的人包括大约30名14到17周岁的年轻

人。据报告,其中有些人被带到宪兵总部军事法院的大楼,由司法警察的人员进行审讯,其他人则被秘密监禁在不公开的拘留地点。据称一些被拘留的人在示威中间受伤,共和国卫队的人员向人群开了火。

87. 另有报告说,8月10日,宪兵队的人员逮捕了3名Ouaddai族的人: Outhman Issa, Chari-Baguirmi的行政长官、Imam Ahmat Abaker 和 Mahamat Zalba,国家电力公司的前行政主任。据称他们被单独监禁。另一位Ouaddai族的人 Mahamat Saleh Issakha,于1993年7月12日被捕,被监禁48小时,其间他受到所谓“arbatachar”方法的酷刑,即将受刑者的胳膊和腿捆绑在背后,姿势十分痛苦(1993年8月17日)。

88. 政府在1993年9月13日答复说,8月17日呼吁中提到的人确曾因1993年8月8日发生的未经批准的示威游行受到拘留和审讯。拘留期间地方法官协会的主席和医生对他们进行了探视。之后他们均获释放。

89. Bichara Digui,国家复兴委员会(CNR)的成员;Ahmat Digui;Adoum Badour,商人;和Mahamat Koussou,军人,他们涉嫌是前部长和国家复兴委员会领导人Abbas Koty的支持者,在Abbas Koty被杀害后于1993年10月22日在恩贾梅纳被逮捕。据称10月22至25日期间还有一些军队人员被逮捕,其中很多被怀疑支持Abbas Koty。据认为他们被秘密监禁在宪兵队总部或国家安全局(1993年11月5日)。

90. 对这个案件政府在1993年11月11日答复说,在初步调查得出结论他们在筹划一场政变后,司法警察将上述人员逮捕。在对他们的审问期间,他们没有受到任何形式的虐待。Adoum Badour之后被释放。

91. 据报告下面3个人也因Abbas Koty 被杀而被捕: Adoum Asil,乍得军队北部Borkounou Enedi Tibesti 地区的地区指挥官,1993年10月25日在Faya 被捕; Braim Kossi和 Hisseim Kokap,商人,1993年10月26日在恩贾梅纳被捕(1993年11月12日)。

## 智 利

### 转交政府的资料和收到的答复

92. 特别报告员在1993年9月1日的信中告知该国政府,他收到了关于47起酷刑案件的资料。据报告,这些案件发生于1991年至1993年期间。以下各段对这批案件作了说明,并附有政府1993年12月2日就其中部分案件提出的答复。

93. José Miguel Sánchez Jiménez 1991年3月26日在圣地亚哥被Dipolcar carabineros逮捕,受到窒息,同时煽打双耳和假处死,并威胁说要逮捕他的亲属。

94. Alfredo Didino Andrade Miranda 1991年4月29日在圣地亚哥被Dipolcar carabineros 逮捕,被带至 Pudahuel的Carabineros第26站,据报告说他在该处多次挨打,试图逼他在自白书上签字。政府的答复说,Andrade Miranda因恐怖主义受审,carabineros医院医生签署的医疗报告说,他身上没有近期的伤痕。他1991年7月24日向圣地亚哥第五刑事法庭提出了酷刑指控。

95. Magdalena de los Angeles Gallardo Bórquez 1991年6月10日在Concepción市被智利警察局逮捕,据称她在被单独关押的35天里多次遭到殴打、性侵犯,并被施用毒品。

96. Juan Sebastián Linaves Ulloa和他的兄弟一起于1991年10月4日在圣地亚哥的家中被Dipolcar和Gope carabineros逮捕。他们被带至Carabineros第3站,据报告在该处受到严重殴打和死亡威胁。

97. Juan Aliste Vega 1991年10月4日在圣地亚哥被carabineros逮捕,被带至Carabineros第3站,据报告在该处多次受到殴打和电刑。

98. Cristian Eugenio Faúndez Navarro 1991年11月29日在圣地亚哥被Dipolcar和Gope carabineros逮捕,被带至Carabineros第3站,据报告说在该处被蒙住眼睛,铐住双手反复殴打,并且受到电刑。

99. Paula Andrea Carrasco Barrios 1991年12月14日在圣地亚哥被carabineros逮捕,受到的酷刑包括拳打脚踢,被迫长时间保持痛苦的姿势,不给食物和水,不许睡觉,受到假处决和威胁。

100. Wladimir Jiménez Pinto 1991年12月14日被Dipolcar carabineros逮捕,开始被带至Carabineros第44站,后来转至第3站。他一再受到殴打,受到假处决并连续几天不给食物。

101. Rodrigo Alejandro Olmedo Olmedo 1991年12月14日在圣地亚哥被Carrascal carabineros逮捕,开始被带至“Cerro Navia” Carabineros第45站,后来转至第3站,在该处据报告说受到毒打,三天不给饭吃,用塑料袋蒙在头上造成窒息。

102. Bernardo Antonio Acevedo Lagos 1992年1月9日在圣地亚哥的家中被警察逮捕,据报连续4天不给他摘下的铐,审讯期间受到毒打。已向第3刑事法庭提出了酷刑的指控。政府的答复说,Acevedo Lagos因从事恐怖主义受到审判。法律医务处1992年1月20日签发的医疗报告证明,他身上留有此前7至9天受到钝器打击的伤

痕。1992年1月27日向第3刑事法庭提起了酷刑正式控告,后来诉讼因证据不足而被驳回。

103. Ramón Supúlveda Alarcón 1992年1月18日在圣地亚哥Lo Espejo区被carabineros逮捕。据报告说,他在被捕时受到殴打,致使右手腕骨折。他被带至carabineros第3站,据报说在该处再度挨打,不给食物和不许睡觉达72小时。

104. Waldo Antonio Olivares Fernández 1992年2月11日在圣地亚哥被警察逮捕,被带至警察总部,据报告说他受到电刑,逼他承认参加了各种袭击活动。

105. Marcela Elisa Núñez Carrizo 1992年2月6日在圣地亚哥被便衣警察局的成员逮捕,据报告说连续几天受到侮辱、殴打、死亡威胁和假处决。

106. Carlos Eduardo Saavedra Saavedra 1992年2月2日在圣地亚哥被警察逮捕,连续4天受到一再的电刑折磨和殴打。

107. Jaime Enrique Poblete Cortés 1992年3月7日在圣地亚哥的Plazade Armas被警察逮捕,被带至中央警察站,据报告说在该处受审问时遭到一再的威胁和殴打。政府答复说,法律医务处1992年3月11日签发的医疗报告未表明有受伤的任何可见痕迹。

108. Ulises Bachler Grandi 1992年3月16日在Temuco被Carabineros民事委员会成员逮捕。他开始被带至Carabineros第2站,次日又被转至Dipolcar办公处。据报告说他受到严重殴打、假处决,用塑料袋致使窒息。政府答复说, Temuco区医院1992年3月18日签发的医疗报告表明Bachler先生身上有多处伤痕。

109. Jaime Antipil Añiñir 1992年3月16日在Temuco被Carabineros逮捕,据报告说,他被带至区医院,身上有逮捕时受的枪伤和受到殴打造成的伤口。据报告说,他次日被转送Carabineros第2站,在该处受到的酷刑包括电刑、塑料袋窒息、将头按入水中、假处决和殴打。

110. Rafael Escorza Henríquez 1992年4月在圣地亚哥的家中被警察逮捕。据报告他受到的酷刑包括殴打头部和脚部,5天不给食物,不许睡觉,并受到威胁。该国政府的答复说,他因恐怖主义被判无期徒刑,从未指控受到过警察的虐待。

111. Luis Alejandro Reyes Reyes 1992年3月16日在Temuco与carabineros发生冲突时被捕,因枪伤被送至区医院,据报告说身上各处,包括受伤的胳膊都受到殴打。据政府方面说, Temuco区医院1992年4月20日签发的医疗报告表明, Reyes先生受了枪伤,一只胳膊骨折。

112. Maria Cristina San Juan Avila 1992年3月31日在圣地亚哥的家中被警察逮捕,据报道她一连两天两夜被蒙住眼睛,不给食物,不许睡觉,受到殴打。政府

答复说,她因恐怖主义被判无期徒刑,从未指控受到过警察的虐待。

113. Víctor González González 1992年3月6日在圣地亚哥的Plaza被捕,被带至General Mackenna 中央警察站。据报道他在该处受到一连串的审问,审问过程中受到殴打,对他威胁说要伤害他的妻子,并遭受电刑。政府答复说,法律医务处1992年3月9日签发的医疗报告表明,他身上没有可见的伤痕。

114. Axel Osorio Rivera 1992年6月11日在圣地亚哥被 carabinieros逮捕,被带至 Carabinieros 第3站。据报告说他在该处不断被打,连续5天不给他食物,不许睡觉。该国政府答复说,法律医务处1992年6月12日签发的医疗报告表明,他身上没有可见的伤痕。

115. Vicente Vega Moreno 1992年6月11日与Axel Osorio Rivera 一起在圣地亚哥被捕,被带到 Carabinieros 第36站,据报告说在该处多次受到拳击,威胁说要杀死他和他的家人。据政府说,法律医务处1992年6月15日签发的医疗报告表明,此人身上没有可见的伤痕。

116. Andrés Eduardo Castro Caracciolo 1992年6月14日在圣地亚哥 La Florida 区的家中被捕,被带至 Carabinieros 第3站,据报告说在该处一再被威胁、殴打和剥夺食物。据政府说,法律医务处1992年6月16日签发的医疗报告表明此人身上没有可见的伤痕。

117. Alex Zuna Espinoza 1992年6月18日在非洲服兵役时被“Huamachuo”第24步兵团的士兵逮捕。在审问他是否加入了某一颠覆集团时,据说他被用一把椅子殴打,全身被踢,受到威胁说要杀死他。

118. Alejandro Rodríguez Escobar 1992年7月1日在圣地亚哥街头被 carabinieros逮捕,据报告说他在被捕时身上中了若干枪。他被带至 Gran Avenida 的 Carabinieros 第3站,据报告在该处反复被打,不给食物,不许睡觉。据政府说,1992年7月2日签发的医疗报告表明,Rodríguez先生身上确有被捕和被射击时受到的重伤。

119. Víctor Hernán Torres Oteiza 1992年8月11日在圣地亚哥被 La Victoria 的突击处成员逮捕,被带至 General Mackenna 警察总部,据报在该处受到殴打和电刑。据政府说,1992年8月12日法律医务处签发的医疗报告表明此人身上没有可见伤痕。

120. Andrés Jordán Fariña 1992年9月3日在圣地亚哥被 carabinieros 逮捕,被带至 Gran Avenida 的 Carabinieros 第12站,据报告说在该处一再被打,连续5天不给饭吃。据政府说,法律医务处1992年9月8日签发的医疗报告表明, Jordán

先生身上有钝器造成的轻伤。

121. Jorge Antonio Espínola Robles 1992年9月15日在圣地亚哥一名亲属家中被警察逮捕,被带至警察局,在该处他的耳朵和身体其他部位被打,被吊在空中,受到假处决。据政府说,法律医务处1992年3月9日签发的医疗报告表明,Espinola 先生右臂负有枪伤。

122. Wilson Enrique Rojas Mercado 1992年9月15日在圣地亚哥被 carabineros 逮捕,被带至 La Castrina 和 San Gregorio 的 carabineros 站,据报告说在该处被打,受到威胁、电刑,用香烟烫双臂、前胸和后背。据政府说,法律医务处1992年9月17日签发的医疗报告表明 Rojas 先生身上有可能是钝器造成的伤痕。

123. Alejandro Rodríguez Escobar 1992年7月1日在圣地亚哥街头被 Carabineros 逮捕,据报告说逮捕他的人开枪打中了他的右臂和左脚。据报告说,尽管他受了伤,在审问时仍受到严重殴打。

124. Carlos Alberto Silva Duncan 1992年3月6日在圣地亚哥被警察逮捕,带至 General Mackenna 警察总部,在该处被关押至3月16日。据报告他受到的酷刑包括电刑、殴打全身各处和威胁。据政府说,法律医务处1992年3月9日签发的医疗报告表明,他身上没有可见的伤痕。

125. Pablo Hernán Morales Fuhrmann 1992年10月8日在圣地亚哥 Plaza de Italia 区被 carabineros 逮捕。他被带至 Carabineros 第3站,据报告说在该处被打,受到电刑。政府说,法律医务处1992年10月9日签发的医疗报告表明,该人身上没有可见伤痕。

126. Rodolfo Retamales Leiva 1992年10月12日在圣地亚哥被 carabineros 逮捕,被带至 Carabineros 第3站,据报告说在该处被打,受到威胁,不许睡觉,并受到电刑。据政府说,法律医务处1992年10月13日签发的医疗报告表明,此人身上没有可见伤痕。

127. Danielo Eduardo Macaya Cocio 1992年11月9日在圣地亚哥的 Renca 区被警察逮捕,被带至南部警察局,据报在该处受到严重殴打。据政府说,Barros Luco 医院签发的医疗报告表明此人身上没有可见伤痕。

128. Jorge Mauricio Mateluna Rojas 1992年在圣地亚哥 Costanera 街被捕,被带至南部警察局,据报在该处受到的酷刑包括殴打、电刑、手掌同时抽打双耳及把头没入水中。据政府说,Barros Luco 医院签发的医疗报告表明,此人身上没有可见伤痕。

129. Ramón Escobar Díaz 1992年7月16日在圣地亚哥与 carabineros 冲突时被捕,被带至 Carabineros 第3站,据报告说在该处受到毒打,手部挨打尤重,3天不给食物,5天不许睡觉,并威胁说要强奸他的女友。据政府说,法律医务处1992年8月25日签发的医疗报告表明,Escobar 先生身上有钝器造成的伤痕。

130. Eduardo Alfonso González Castro 1992年8月20日在圣地亚哥 Lo Espejo 区被警察逮捕,被带至警察总部。据报道他在该处受到殴打、电刑,四天不给他食物和水。据政府说,法律医务处1992年8月25日签发的医疗报告表明,此人身上没有可见伤痕。

131. Manuel Osvaldo Martínez Garcés 1992年7月16日在圣地亚哥一处公用通道外被 carabineros 逮捕,接连被带至两处警察站,据报告说他一再受到殴打和威胁。

132. Esteban Huiniguir Reyes 1992年10月13日在圣地亚哥 Lo Prado 区被警察逮捕。他被带至省区人命案分队的住地,据报告说在该处若干次受到电刑。据政府说,1993年10月15日法律医务处签发的医疗报告表明,此人身上没有可见伤痕。

133. Manuel Francisco Saavedra Rodríguez 1992年11月12日在圣地亚哥家中被警察局官员逮捕,他被带至 Gran Avenida 和 Departamental 的交界处,据报告说被剥去衣服,全身受到钝器殴打。据政府说,Barros Luco 医院签发的医疗报告表明,Saavedra 先生面带伤痕。鼻梁骨折。

134. Héctor Navarro Salinas 1993年1月8日在圣地亚哥街头被警察局成员逮捕,被带至南部警察站,据报道说他在该处反复被打,并受了电刑。据该国政府说,1993年1月13日法律医务处签发的医疗报告表明,Navarro 先生身上有钝器造成的轻伤。

135. José Luis Galarce Gallardo 1993年1月19日在圣地亚哥 La Victoria 住区家中被警察局官员逮捕,被带至 Macul 和 Los Alerces 交界处的警察处,据报告说在该处受到殴打和电刑。据政府说,法律医务处1993年1月21日签发的医疗报告表明,此人身上没有可见伤痕。

136. Daniel Antonio Torres Vicencio 1993年1月19日在圣地亚哥被警察逮捕,带至 Macul 和 Los Alerces 交界处的警察站,据报告说在该处受到殴打和电刑。据政府说,法律医务处1993年1月21日签发的医疗报告表明,此人身上没有可见的伤痕。

137. José Mauricio Saldías Gómez 1993年1月19日在圣地亚哥的家中被突击处第1站的成员逮捕,据报道同时受到殴打和电刑。据政府说,法律医务处1993年1



月2日签发的医疗报告表明,此人身上没有可见伤痕。

138. Fernando González Olivares 1993年1月8日在圣地亚哥街头被警察逮捕,据报告说受到的酷刑包括殴打和电刑。据政府说,法律医务处1993年1月13日签发的医疗报告表明, González 先生身上有锐器造成的伤口。

139. Juana Enriqueta Baeza Rocha 1993年3月25日在圣地亚哥被警察逮捕,带至 San Miguel 警察站,据报道说她在该处反复被打,并受到要伤害其亲属的威胁。据政府说,法律医务处1993年3月27日签发的医疗报告表明,此人身上没有可见伤痕。

#### 政府就以前报告所提案件转交的资料

140. 该国政府在上述1993年12月2日的信中还就下列各段提及的案件作了答复,这些案件是1992年8月21日向其转交的。

141. Adán Eloy Pacheco Pinto 据报告说于1991年被捕,并被带至圣地亚哥第3警察站。据政府说,他被依照第12.927号国家安全法起诉,并被判监禁。在诉讼过程中他从未提出过挨打的控告。Carabineros 医院一名医生签发的医疗报告说, Pacheco Pinto 身上没有近期造成的伤痕。

142. Nelson Ernesto Ruz Aguilera、Alfredo Heriberto Marchant Figueroa 和 Francisco Javier Diaz Trujillo 于1991年5月被捕,带至第3警察站。政府答复说,依照武器管制法对这三个人进行了审判。

143. Ana María Sepúlveda Sanhueza 1992年3月被捕并带至中央调查营地。政府答复说她因恐怖主义受到审判。她从未向法院提出过受到酷刑的指控。法律医务处1993年3月11日签发的医疗报告表明,没有发现可见的伤痕。

144. Alicia Lira Matus 1991年11月在参加和平示威时被逮捕。据政府说,她向圣地亚哥第5刑事法庭提出了受到酷刑的控告。但该案1992年12月1日因缺乏证据而被驳回。

145. 关于 Bernarda Eugenia Valenzuela Montecinos、Juan Carlos Chávez Pilquil、Jorge Alfredo de la Fuente Llanos、Mario Valenzuela Martínez、Roberto Antonio Morales Pinochet、Nélida Molina Morgado、Lorena Reyes Anderson、Jose Antonio Sabat Méndez、Francisco Olea Lagos、Cristián Cárdenas Jofré、Mirentchu Vivanco Figueroa、Antonio Lenín Sánchez Pardo、José Cristián Arriagada Melo、Jorge Antonio Concha

Meza 的案件,政府答复说,司法部门没有收到正式的控告,所以未对指称是否属实进行调查。

## 中 国

### 转交政府的资料和收到的有关答复

146. 特别报告员1993年8月26日向中国政府转交了一封信,其中有收到的关于该国酷刑作法的指称摘要及若干起个别案件。另外,特别报告员代表据资料说有受酷刑危险的人发出过四次紧急呼吁。该国政府就其中有些作了答复。

#### (a) 关于酷刑作法的一般性资料

147. 据收到的资料看,虽然酷刑在中国为法律所禁止,但警察和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继续用这种作法对犯人逼供、威吓或处罚。酷刑往往发生在紧接逮捕之后的初步审讯过程中,警察试图强迫嫌疑犯交代关于其本人或他人的情况,或承认犯有指称的罪行。在审判之前的拘留期间酷刑可能仍然继续发生,这一阶段为期若干星期或若干个月不等,被拘留者在此之后或者受到起诉和审判,或者不起诉获释,或被处以有期行政拘留。

148. 据收到的资料说,犯人被法院审判和判刑或被不加审判处以行政拘留之后,被转送监狱和劳改营,在这些地方酷刑和虐待也是很普遍的。在监所里,当犯人违反条例或不服从命令时经常发生虐待事件。据报告说,普通刑事犯和因政治原因被拘留的犯人都受到酷刑。但是,多数受害人似乎是受教育较少或较为不受重视的层次。

149. 据报告说,最常见的酷刑方法包括殴打、电棍或击昏枪击打,用手铐和脚镣引起痛苦,以扭曲的姿式吊住双臂,被迫做出痛苦或消耗体力的姿式,不许睡觉或不给食物,暴露于寒冷或高温之下,在中国规章允许的15天期限之后继续延长隔离关押以作为一种处罚。据指称说,对被判死刑的犯人采用的通常作法是,自其被判死刑起直至处决,一直戴上手铐和/或脚镣,即使长达几个月也是如此。

150. 另外还收到报告说,犯人经常由于没有正常的清洁卫生及营养不良而生病,而生病的犯人得不到正常的医疗。

151. 据收到的材料说,中国法律没有规定保护犯人不受酷刑的基本保障措施。法律只是保障被拘留者在依刑事法被起诉时有权找律师。即使在这种情况下,

法律也并没有规定在审判前的拘留期内有权找律师或向司法部门提出申诉,找律师的权利只有在审判开始后才有保障。在这种情况下,被拘留者几乎不可能对酷刑提出控告。法律中含有允许不加起诉或审判而进行行政拘留的规定,因此在最长可达四年之久的时期内都没有找律师或向司法部门申诉的权利。犯人通常只有在被审判、判刑或“处以”行政拘留之后才能获准与家人见面。而且,家人探视被认为是一种优待而不是一项权利,因而可以剥夺。

152. 虽然刑事诉讼法规定,供认本身不构成认定一人有罪的充分证据,但在实践中,当其他定罪证据不足时,供认往往被认为是足够用以定罪的。另据报告,法院经常无视被拘留者在审判中提出的酷刑指控。

153. 据报告说,对酷刑指控进行的调查是不充分的,只作过很少的调查。调查不公开进行,结果也不受公众监督。酷刑肇事者经常只受行政处分,如调离之类。即使被起诉,得到的处罚也很轻微。事实上许多调查不了了之,被指称的肇事者根本不受起诉。

#### (b) 转交政府的个别案件

154. 以下各段提及的34起案件也已转交该国政府,政府于1993年11月22日作了有关答复。

155. 安福兴,前辽宁省吉林化学工业公司干部,1989年因政治罪名被捕,被判5年徒刑。据指称说,他在辽宁省凌源第二劳改监狱训练大队第一中队期间多次受到殴打。另据报告说,他被隔离关押在一间黑暗狭小的囚室内,被剥光衣服按在地上,全身各处多次受到高压电棍的电击。据指称说,他因此而休克,不得被送入医院。但当他回到监狱时,马上又再度受到电棍酷刑。据政府说,安福兴因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违法活动,于1991年3月被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5年徒刑。现在辽宁凌源第二监狱服刑。此人身体状况一直较好,从未住过医院。

156. 李杰是吉林省的一名犯人,也被关在凌源第二监狱,据报告说,在1991年6月4日企图进行一日绝食抗议之后被剥光衣服,按在地上,用50,000伏电压的电棍打击身体若干部位。据政府说,李杰因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违法活动,于1991年2月被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5年徒刑。现在凌源第二监狱服刑。经查,此人从未遭过打骂。

157. 张铭是辽宁省凌源第二劳改监狱的犯人,据报告说,他1992年2月4日因在墙上写诗而被踢打,据报道说,大队长于1994年4月4日将其叫到办公室,用电棍打他

的胸部、背部和颈部。据政府说,张铭因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违法活动,于1991年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曾在凌源第二监狱服刑并已于1992年6月25日刑满释放。此人在服刑期间没有在“狱中墙上写诗”,更不存在因此事或其他原因而遭毒打的问题。

158. 除了以上人员之外,辽宁省凌源监狱的以下犯人据报告说也受到酷刑,包括经常的殴打:

- (a) 迟寿柱是吉林市的一名高中毕业生, 1990年5月因印刷和散发传单被捕,被判处10年徒刑。据政府说,迟寿柱因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违法活动,于1990年6月经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10年徒刑,此人在狱中从未受过打骂和体罚。
- (b) 李德君,前辽宁省本溪县教员,因政治罪名被判处3年徒刑。据政府说,李德君因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违法活动,于1989年8月被本溪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3年徒刑,此人在服刑期间从未遭打骂和体罚。
- (c) 司伟是吉林省通化市的一名高中毕业生,1989年因散发传单被捕,判处3年徒刑。据政府说,司伟因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违法活动,于1990年11月被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4年徒刑,现在凌源第二监狱服刑。此人身体状况良好,从未受过打骂和体罚。
- (d) 田晓明,丹东市的大学毕业生,因政治罪名被判处7年徒刑。据政府说,田晓明因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违法活动,于1989年12月被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7年徒刑,身体状况良好,从未受过打骂和体罚。
- (e) 梁立维,前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助理工程师,1989年6月10日被捕,被判处3年徒刑,于1991年被转至辽宁。据政府说,梁立维因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违法活动,于1990年11月被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曾在凌源第二监狱服刑。1992年6月10日刑满释放。此人从未受过打骂和体罚。
- (f) 陈柱满是福建省莆田县农民,1991年12月14日被逮捕,被控“非法”加入一宗教集团并被送到莆田县拘留所。据报告说,他被殴打并被用一种可活动的酷刑器具长时间倒吊在窗户框上。1992年8月他被转送至泉州市的另一所监狱,据说在该处一再被殴打,因而至今仍有听觉障碍,双手抖动不止。据政府说,陈柱满1991年12月因从事违法活动被依法审查,1992年被劳动教养3年。此人从未遭打骂和体罚。
- (g) 范学元,84岁,原河北省保定的主教,1990年11月被捕,在1992年4月死

亡之前一直下落不明。据报告说,公安人员1992年4月16日夜间将他的尸体送交其家人,对死因未加任何解释。唯一的官方说明是官方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的一名发言人提供的,说他死于肺炎。但尸体照片显示他的面部一侧有大块紫红色瘀块,腿部有可见伤口。

- (h) 格桑坚赞是Zogang Dzong Thentho Xiang的生意人,1989年7月7日因参加示威被逮捕。他被关押在Chamdo,据指称说在该处受到酷刑和隔离关闭。1990年12月7日被转至第2劳改所,据报告说健康状况很差。据政府说,此人的情况有待调查。
- (i) Lada Dunzhu( Lawa Dondup或Lhapka Dondrup)1989年被判处2年半徒刑,送至拉萨的Gutsa拘留所。据报告说他受到了几种酷刑,如将双手用铁链反绑后吊起来,在被吊的时候打他的背部和腹部。在冬季寒冷时,据说他被迫完全光着身子躺在地上达一、两个小时。据报告说他因酷刑受了许多伤,包括脾脏破裂,身患重病。他1991年11月在拉萨人民医院死亡。
- (j) 李林为衡阳市工人,与其弟李治一起1991年在湖南省衡阳被逮捕。起初他们在白沙洲调查所被关数日,然后又被转到衡阳的武家湾拘留所。据报告说,他们在受审过程中数次受到拳击和电棍击打。他们在5个月之后获释。据政府说,李林和李治1991年在湖南衡阳被逮捕,5个月后被释放,后出境。他们在关押期间没有遭毒打。
- (k) 洛桑遵珠是拉萨Dnapchi监狱的一名犯人,据指称说,他在1991年4月一次狱中抗议之后受到毒打,被隔离关押。据政府说洛桑遵珠因从事分裂祖国的违法活动被西藏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6年徒刑,曾因严重违反监规被监狱依法处以短期隔离反省,并未受到打骂和体罚。
- (l) 鲁德成,湖南省公共汽车公司浏阳分公司工人,1989年8月被认定犯有“反革命”罪,被判处16年徒刑。据报告说,他自被捕起受到了严重的虐待。在审判之后,他被转至Lingling的湖南省第三监狱,据报告说他在狱中被隔离关押达6个月之久,条件极为恶劣。据政府说,鲁德成因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违法活动,被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判处16年徒刑,现关押在湖南省第二监狱。该犯从未受到打骂和体罚。
- (m) 马志强,上海市工人,1989年6月15日因企图成立独立工会被捕,送至南市看守所,在该处多次被打,双手被紧锁式手铐反铐,致使双手肿胀。据政府说,马志强因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违法活动,被上海市中级人民

- 法院判处5年徒刑,现在上海市监狱服刑。此人从未受过打骂和体罚。
- (n) 阿旺央金,拉萨Tsamkhung女喇嘛寺的女喇嘛,8月21日因参加呼口号的示威被逮捕,送至拉萨Drapchi中心监狱。据说她受到毒打和酷刑,不得已被送进拉萨人民医院。据政府说,此人情况待查。
- (o) 王宁和朱文华,天津第一监狱犯人。据报告说,他们自1989年以来经常被打,用电棍电击,用紧锁式手铐铐住,长期受到隔离关押。在被拘留时,王宁是天津工人自治联合会主席,朱文华是该组织常务委员会成员。据政府说,王宁因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违法活动,被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8年徒刑;朱文华因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违法活动,被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5年徒刑。两人现关押在天津第一监狱,在狱中监禁期间从未受过任何体罚和打骂。
- (p) 金鑫,记者,前海南经济报山西分社社长,1989年7月在海南岛海口市被警察拘留。此后他又被转到过其他的拘留所,包括太原市公安局。据说在太原公安局受到毒打,并被加戴重达50公斤的镣铐,造成他暂时瘫痪。据政府说,此人情况待查。
- (q) 唐柏桥,1989年抗议活动期间的学生领导人,1989年7月被捕后先后在湖南省6个拘留所和监狱关押。在长沙第一拘留所期间,同牢犯人在监狱官员的煽动、指使下经常受到毒打,并受到电棍击打。在龙溪监狱时,据报告说他受到毒打,戴上手铐脚镣,禁闭在寒冷、阴湿、狭小的牢房内。据政府说,唐柏桥现已出境。此人在关押期间从未遭到打骂或体罚。
- (r) 扎西(伦珠甘丹),西藏Maldrogunkar Gyama Ziang甘丹寺喇嘛,1988年3月5日被捕。据指称说,他在被捕时被剥光衣服,用铁棍抽打头部,致使他失去知觉。据报告说他被戴上手铐脚镣达10个月之久。据指称说,现在他在医院内不能下床,有时失去视觉和听觉,站立不稳。据政府说,扎西因从事分裂祖国的违法活动,被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9年6个月徒刑。曾在西藏自治区监狱服刑,后因患脑血管疾病,于1993年3月31日被保外就医。经查,此人在监狱服刑期间从未受过打骂和体罚。
- (s) 泽西,喇嘛,1989年在拉萨被拘留,带至警察局,据称在该处被用赶牛鞭、棍棒和枪托殴打,一整夜被吊在房梁上。后来他被转至Gutsa拘留所,据报告说在该处被置于一张铁椅上,双手与椅子铐在一起,双脚铐

在一根水泥柱上，达8天之久。据指称说，他后来又被用头部呈三棱状的棍棒殴打，致使头部留下了长达两英寸的伤疤。据政府说，泽西的情况待查。

- (t) 王希哲，被拘留在Huaiji县的广东省第一监狱。据指称说，他自1988年起就受到隔离关押。据报告说他在1990年进行绝食抗议，被用竹筒强行灌入食物。1991年他的书籍和个人用品被抄走达数月，据说他患有忧郁症，健康恶化，据政府说，王希哲1993年2月3日被依法假释。经查，此人在服刑期间，身体状况良好，考虑到他本人提出希望有一个看书的安静环境的要求，狱方曾安排其单独居住一间面积较大的监舍，平时的文体活动和其他犯人在一起。
- (u) 谢宝全，陕西省Mian县看守所犯人，因于1989至1990年因参与斗殴受到惩处。据指称说他和另一个人被背对背地铐住，用绳子绑在一起，由另外一些犯人拉扯绳子，越快越好，将被绑在一起的两个人在地上拖。称为“老牛耕地”的这种处置使谢宝全背部大面积受伤，数月之后才痊愈。据政府说，此人情况待查。
- (v) 徐文立被判15年徒刑，目前在北京第一监狱服刑。据指称说，他的服刑已有11年是在隔离关押下渡过的，不时受到处罚。据指称说，他在1986年被关在一间没有窗户，从顶部开有进出口的囚室，减少了给他的食品，不许探视、通信或看书、报。据报告说，近年来的官方来源已确认他仍被隔离关押。据政府说，徐文立1993年5月26日被依法假释。他在北京第一监狱服刑期间，狱方曾根据他本人的要求，安排他居住在一间较大的监舍，以便于他的学习。平时的文体活动都与其他犯人在一起。这与单独关押有本质区别。
- (w) 姚贵生，甘肃省工人，1989年6月以后在株州被捕，判处15年徒刑。据报告说，他在龙溪的湖南省第6监狱期间由于虐待而精神失常。他不时被隔离关押，经常挨打，被戴上手铐脚镣。据政府说，姚贵生在服刑期间，曾因打架斗殴，严重违反监规，受到10天禁闭的处分，但从未受到打骂和体罚。
- (x) 张旭东，长沙电梯厂工人兼厂长。据报告说，他1989年被捕，送入长沙第一拘留所，被戴上手铐脚镣长达近1年。据政府说，此人情况待查。
- (y) 张瑞玉，福建省Xianyu县体育学院教师，54岁，新约教会会员。1990年5月31日被一群冲入其住宅的当地公安局人员毒打。据报告说，她的面

部受到电棍击打，牙齿被打落。据政府说，张瑞玉因从事违法活动，触犯刑律，于1991年11月被判处4年徒刑。此人在关押期间从未遭到打骂和体罚。

- (z) 朱民，据报告说于1989年6月在长沙被捕，送入长沙第一拘留所，在该处一再受到虐待和电棍击打。1990年6月他被判处6年徒刑，转至Yuanjing的湖南省第一监狱。
- (aa) 朱梅，73岁，退休小学教师，上海新教会会员。据报道说，她在上海市主要监狱提篮桥监狱中服5年徒刑时几次受到毒打，由于挨打，一只膝盖1991年骨折。
- (bb) 张乐治，被禁止的新约教会基督徒，1992年9月8日在Shouguang县Nine Lanes村被捕，起初被带至当地警察局，两天之后转至Shouguang市拘留所。在被关押期间，据报告说受到两名警察用电棍击打。殴打之后他的双脚被戴上重9公斤的脚镣，手上也戴上手铐，脚镣和手铐又被用一段铁链连在一起，迫使张乐治身体弯曲180度。据报告说，在他被铐住的时候殴打仍未停止，后来腿上又加了一付脚镣，使总重量达到13公斤。据报告说，他被用这种痛苦的姿式昼夜铐住达三个月，连睡觉或吃饭时都不曾取下中间的铁链。据说天气转冷时，他曾要求取下铁链以便加穿衣服，但连这个要求也未获批准。
- (cc) 朱泽生与张乐治被捕的情况相同。据报告说，他被强迫一整天坐在周边有钉子的所谓“安全椅”上。据报告说，这把椅子在拘留所内被用来处罚犯人，任何时候坐上去都会造成巨大痛苦。据报告说朱泽生坐在椅子上时被殴打，强行将食物塞入嘴中。

159. 关于以上四人，政府答复说有待调查。

### 紧急呼吁

160. 除了以上提及的案件之外，特别报告员代表以下段落中提及的人向中国政府转发了四次紧急呼吁，有人担心这些人可能会遭受酷刑。所作相应摘要末尾的括号内为发出呼吁的日期。

161. Sonam Wangdu 和 Ganden Tashi 拉萨市 Drapchi 监狱的犯人，据说由于自1988年被捕以来受到的虐待身体状况很差。有人表示，除非他们得到应有的医护并保护其不再受虐待，他们的生命会有危险。(1992年12月16日)



162. Rinchen Gendun, 导游, 和 Lobsang Yanten (又名 Tsasur Choened), 前 Drepung 寺院的老喇嘛, 以及未报来姓名的一名妇女1993年5月13日午夜在拉萨Ramoche 的家中被逮捕, 去向不明。据报告说, 逮捕是在一个欧洲共同体代表团访问该地区之前约48小时发生的, 据消息来源说, 逮捕的原因是防止这些人与代表团成员发生接触。另据指称说, 有几个人过去曾在同样情况下被逮捕, 隔离关押, 受到严重酷刑, 其中包括 Sonam Wangdu、Lhundrups Kalden 和 Sonam Dolkar: 据说前两个人由于酷刑造成终生瘫痪; 第三人为妇女, 据说因对外国记者讲话而被捕并受到酷刑。(1993年5月21日)

163. 关于这些案件, 政府于1993年5月26日答复说, Rinchen Gendun、Lobsang Yonten 和一名妇女是依法拘留审讯的。该妇女当天获释。拘留另外两人的原因是, 他们盗窃了大量国家财产, 并且长期从事分裂主义活动, 直接威胁了中国的国家安全。中国司法机关将对案件做进一步调查, 依法妥善处理。这些人被捕与欧洲共同体代表团访问西藏毫无关系。

164. 以上文提及的8月26日的信中(见第146段), 特别报告员向政府转交了他收到的有关与 Rinchen Gendun 和 Lobsang Yonten 同时被捕的第三人的补充资料。该人姓名为 Damchoe Pemmo, 是一个二十五岁左右的拉萨商人。她被捕时已怀孕, 据说警察在 Seitru 拘留所强迫她保持站立至少12小时, 并用电棍打她, 一周之后流产。

165. 1993年3月27日晚, 在陕西省旬阳县李家镇桃园村, 一队警察冲入25名当地基督教徒和5名邻近安康县的人举行的宗教会议。据报告警察在不加任何解释的情况下, 动手用警棍殴打在场的人, 包括一名9岁的男孩。包括一个姓名为来满平的22岁男子在内的五名安康县基督徒在被带至当地警察局之前受到毒打。来满平几天后获释, 但因受伤, 不久死亡。据说在该事件发生之后, 同一地区有90多人被捕。(1993年5月25日)

166. 政府于1993年5月28日答复说, 包括一名21岁叫来满平的人在内的三名陕西省安康市人在陕西省旬阳县鲁河区桃园村组织非法聚会。当地公安机关于3月28日下令禁止扰乱当地社会秩序的这一集会。来先生因不法行为遭到当地群众用竹条抽打屁股, 受了轻伤。1993年4月6日他因心脏病突发死亡。他的死亡与所受的轻伤毫无关系。此外, 关于警察殴打26名基督徒, 逮捕90多人的报告纯属毫无根据。

167. 在上述8月26日信件中特别报告员向政府转交了他收到的与此案有关的补充资料。据这一资料说, 事件发生于1993年3月27日晚, 地点是旬阳县桃园村。当时警察冲击了约26名当地基督徒和来自邻县安康县的另外5个人举行的宗教聚

会。据报告说警察不加解释，动手用警棍殴打在场的人，并给安康县的5名基督徒戴上了手铐，其中两人是妇女。此后，这些安康县的基督徒一再受到警察殴打，其中包括来满平。据报告说，当地的基督徒被迫参加殴打，如果不打安康的人就得打自己。此后安康县的基督徒被关押在当地警察局达8天之久。据指称说，来满平因被打而状况很严重，警察发现他可能会在关押时死亡之后将其释放。他从警察局向外勉强挣扎了几公里，被当地农民发现之后不久即死亡。

168. 该国政府1993年11月28日重申了1993年5月28日提供的资料。

169. 刘刚，关押在辽宁省凌源第2劳改监狱的前学生领导人。据报告说，他因持续受到虐待和严酷的拘押条件，健康状况很差。虽然他患有心脏和胃疾病、牛皮癣和脱肛症，但据报告说他得不到应有的医疗。另据报告说，他在1992年10月2日会见亲属之后受到严重虐待，包括电击，指称他向家人透露了受到的待遇。(1993年5月25日)

170. Lodoe Phuntsok, 拉萨市医院和Bharkor当地警察局的保安助理。据报告说1993年5月23日因涉嫌参加“反革命活动”而被捕，被带至拉萨东北部 Sangyip拘留所第四处。(1993年9月13日)

171. 政府1993年10月25日就此案答复说，Lodoe Phuntsok 因参加分裂国家和推翻政府的非法活动于1993年5月20日被西藏自治区公安机关拘留。他由于承认有罪，表现良好而获释。他在调查期间受到的待遇良好。

## 意 见

172. 特别报告员及其前任若干年来收到报告的一致性使人不得不承认，有严重理由对中国各地持续存在的普遍性酷刑和虐待犯人问题表示关注，尽管该国有禁止这种现象的法律。特别报告员意识到禁止酷刑委员会的有关结论和建议(A/48/44第423-429段)，并对此表示同意，尤其是关于防止长期隔离关押和将酷刑肇事者绳之以法的建议。特别报告员建议，依照《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和《保护所有受到拘留和监禁的人原则》，应当取缔长期隔离关押和使用镣铐的作法。

## 哥伦比亚

### 转交政府的资料

173. 特别报告员在1993年8月26日的信中告知该国政府，他收到了有关据报告说该国发生的17起酷刑案件的资料。以下各段对这些案件做了说明。

174. Wilson Méndez 1992年10月26日因被怀疑参加了反对派团体哥伦比亚 Fuerzas Armadas 革命党被军队成员逮捕。他被带到 Florencia 营，据报告说，在该处双腿受到枪击，不得不转至 Maria Inmaculada 医院动手术。据证人说，他在医院时看护他的士兵用武器打他，使他腿上再度受伤。据报告说，试图进行干预的医疗人员受到了死亡威胁。

175. Luis Fernando Martínez 和他的妻子 Sonebia Pinzón Herrera 在 Santander 省 Sabaneta 的家1992年11月7日被第2机动旅的5名士兵闯入。Luis Fernando Martínez 被带至监狱，据报告说他的妻子 Sonebia Pinzón 和她两岁的女儿 Marcela Becerra Pinzon 被士兵强奸。据说此后的医疗检查证实了这一报告。据收到的资料说，第二机动旅下属的第18反游击队营的4名士兵被控残害儿童、强奸和阴谋犯法而受到拘留。

176. Heberto Sánchez Tamayo、Diego Miguel Hernández 和 Astrid Liliana Rodríguez 一行18人1993年3月20日乘船从 Tres Esquinas 至 Caqueta 省 San Vicente del Caquan 市的Cartagena del Chaira，据报告说，该船在Puerto La Reforma 外被陆军第1机动旅的士兵截住，强迫包括上述三个人在内的一些乘客脱去衣服下船。然后这些人受到关于游击队在该地活动的审问，并受到酷刑，包括在河泥中窒息。Herberto Sanchez 和 Diego Hernandez 双臂和双膝被扭住，倒吊起来。Astrid Rodriguez 被用锥子砸脚，嘴里塞上肥皂，胸部被打。然后他们被转至 San Vicente del Caguan 的第36营，Astrid Rodriguez 在该处又受到酷刑。

177. Gilberto Jurado Alvarán 和 Henri Cardona 1993年8月3日在 Arauca 省 Fortul 至 Arauquita 的路上被机械化骑兵部队 Reveiz Pizarro de Saravena 营士兵逮捕。他们被带至 Vereda “La Salve” 的 Simon Bolivar 学校，据报告说在该处受到毒打。Jurado 先生据说还被在附近的湖中浸溺。在四天之后获释前，他们被迫在声称他们受到良好待遇的一份声明上签字。

178. 特别报告员还得知了以下案件，据报告这些案件发生在 Santander 省的 Barrancabermeja。

179. Armando Gómez 1993年4月18日乘摩托车行于 Barrancabermeja 市 El Llanito 省监处附近时被武装部队成员逮捕。他被带至附近的一处农庄，据报告说在受审问时被打，头数次被没入水盆，几乎淹死。然后他被和另一名被捕的19岁的人 Dimas Benavides 带至 Nueva Granada 营，两人在该处遭打时睾丸、颈部和脚部据说受到电击。他们4月20日被释放。

180. Miguel Angel Duque Valencia 1993年4月30日被10名便衣人员逮捕，被带至 Nueva Granada 营，在该处受到的酷刑包括窒息、殴打和脚踢全身各部位。

181. José Manuel Rodríguez Sampayo 1993年5月1日被一群便衣人员逮捕，带至 Nueva Granada 营，在该处受到窒息和殴打全身，致使他失去知觉。他在被送交政府检察官办公室之前被迫在声称受到良好待遇的一份声明上签字。

182. José Antonio López 1993年5月3日被便衣人员逮捕。据报告说他被带到 Nueva Granada 营，并被蒙住眼睛穿过东北部的若干区。在其中一区，他被迫用头开门。此后这些人将他带至一处沼泽，反复把他的头没入水中，几乎使他淹死。然后又带他回到 Nueva Granada 营，据报告说在该处又把他的头没入水中，睾丸受到电击，并用香烟烫他。

183. Orlando Noguera 1993年5月3日被便衣人员逮捕，手、脚和腰部被用带刺铁丝捆绑。他们将其带至 Nueva Granada 营，把酸性液体灌入他的胃中，致使发生溃疡。他们又将他绑住带到东北区，用泥塞进嘴里，然后又带到一处泥沼地，反复将他的头按入水中，持续折磨了两个小时。此后又把他带回营地，据报告说在该处脚踩和电击他的睾丸，把尖棍插入他的鼻孔。据说这些人还踢了他的耳朵，造成听觉障碍。

184. Yofre Cervantes Corzo 1993年5月3日被便衣人员逮捕。他被拘押在 Nueva Granada 营达32小时，在此期间受到步枪挥打，睾丸受到电击，头一再被浸入水中。

185. Orlando Rueda Arguello 1993年3月13日在 San Vicente de Chucuri 附近的一处军事哨所附近被 Luciano D'Elhuyart 营士兵逮捕。他被转交给 San Vicente de Chucuri 警察，据报告说警察对他施加的酷刑包括，把他的头蒙上塑料袋，然后向袋中灌水。据报告说他们还往他的指甲下面钉别针并进行殴打。

186. 特别报告员在8月26日的同一封信中向该国政府提醒了1992年转交，但

一直未获答复的一些案件。

### 政府就人权委员会第1993/48号决议提交的资料

187. 政府根据这一决议就1990年至1993年8月的查禁毒品方案的结果提供了资料。该政府还说，贩毒分子1993年4月15日在波哥大进行了一次恐怖主义袭击，造成10人死亡，在此之后按照紧急事态法采取了进一步的措施。

### 意见

188. 特别报告员意识到哥伦比亚的目前局势，其前任的最后一份报告(E/CN.4/1993/26第116段)提及的该国政府1992年7月24日信件对这一局势做了说明。他也意识到这一局势的特点之一是武装反对集团和贩毒匪帮的残忍暴力行为。政府并没有把无论多么罪恶的此类行为当作官方保安部队或在其支持下行事的其他人施行酷刑的理由，这是正确的。特别报告员期待着该国政府向他通报为控制这一问题而拟议采取的措施，看来这个问题相当普遍，特别是在冲突地区。

## 古巴

### 转交政府的资料

189. 特别报告员在1993年11月的信中告知该国政府，他收到了关于7起据指称说在该国若干监狱发生的严重虐待案件的资料。以下各段对这些案件做了说明。

190. Julio Pérez Benítez 是 Matanzas 省 Aguica 监狱的一名19岁被拘留者，据报告说，一群卫兵1992年5月19日用橡皮警棍殴打他，直至他失去知觉。

191. Manuel Benítez Hernández 因敌对宣传在 Santiago de Cuba 的 Boniato 监狱服刑，据说，1992年9月在称为 Boniatico 的处罚地受到毒打，致使他头部受伤缝了几针，全身都有伤痕。

192. Joel Alfonso Matos 是 Quivican 监狱的被拘留者，据说1992年10月23日被七名卫兵殴打，嘴部和一只眼睛受伤，不得被送入 San Antonio de Banos 医院。

193. Juis Alberto Pita Santos, 一个自称为“Asociacion Defensora

de les Derechos Politicos”的组织的主席,据指称说,他1992年12月在 Boniato 监狱受到毒打,胳膊骨折。据报告说,后来他被送至 Camaquey 要犯监狱,关押达数月之久,从早上5点至晚上9点脚上一直戴着镣铐。1993年4月22日,他由于拒绝穿囚服再次受到一名监狱看守的殴打,因此受伤。

194. José Pascual Castillo 是 Villa Clara Manacas 省监狱的犯人,据指称说1993年2月15日被几名看守殴打。据收到的资料说, Castillo 先生手被铐住,遭到用橡皮警棍的殴打和脚踢,直至几乎失去知觉,后来被送入隔离监室。

195. Gerardo Montes de Oca, Combinado del Este 监狱第2区的犯人,据说1993年5月被4名看守毒打。此后显然被送进封闭的囚室关了3天,在此之后因其受伤不得不将他送进监狱诊所。

196. Juan Carlos Aguiar Beatón 是哈瓦那省 Guanajay 监狱的犯人。据指称说他1993年7月5日受到几名看守的毒打,他们用橡皮棍子和其他钝器打他。据报告说挨打的原因是他不肯停止隔着窗户与另一名犯人讲话。该人因受伤而数日后死去。

197. 另外还向政府转交了以下两起案件:

(a) Heriberto Arce Vázquez, 据报道说,他1992年5月在 Villa Clara 的 Santa Clara 街头和一群青年在一起时其中一人呼喊“打倒菲德尔”的口号,招致若干警察对他的殴打。据说此后他被带至第三警察所,再度被打,结果不得被送入医院。由于受伤,医院给他开了医生证明,建议全休。

(b) René Contreras Blanch, “Partido Cubano de Derechos Humanos”的成员。据报告说,他1993年3月16日在哈瓦那中心 Estrella 和 Reina 街之间遭到几名警察殴打,他们打他并用石块砸他,造成头部重伤。

### 紧急呼吁

198. 特别报告员1992年12月16日代表古巴人权和民族和解委员会领导人 Elizardo Sánchez Santa Cruz 向该国政府发出了一项紧急呼吁。该人1992年12月10日在哈瓦那的家中被国家保安部队的成员拘留。据指称说他在被拘留时被打并送入医院。第二天他被转送地处 Calle 100 和 Aldabo 的技术调查处拘留所。人们担心他在拘留期内会受虐待或酷刑。

199. 政府1993年3月12日答复说, 该人犯有破坏和平罪行, 对国家政治和社会制度提出了愤怒和激烈的批评, 而且侮辱了与之辩论的公民和邻居, 引起吵架。吵架过程中出现了打和对骂的情况, 导致执法人员干预。E. Sanchez Santa Cruz 被带至 Carlos J. Finlay 军医院, 这家医院离他家最近, 由此可看出没有人想要掩盖此事及其后果。他在医院里得到了必要的医疗。他受的伤是轻伤, 与拳打造成的普通轻伤相一致, 打他的人几乎全是妇女。此后他被送至地处 Calle 100 和 Aldabo 的调查处, 被控扰乱和平秩序, 并在古巴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时限内获得保释。他从来没有受过隔离关押, 他的亲属知道他被关押和关押地点。关于他受的轻伤, 显然是他与邻居争吵造成的, 肯定与警察无关。

### 多米尼加共和国

#### 转交给政府的资料

200. 特别报告员于1993年8月26日的信件向政府通报, 他已收到了有关1993年7月21日事件的来信。在该事件中, 警察曾试图把若干农民家庭从1960年代期间分配给他们的 Guera, Mate de Palma 地区的一些土地上驱赶出去。据报告, 其中一位农民, Juan Diaz Ulerio, 遭到了毒打。更甚的是, 陪同警察前来的一名商人, 声称该土地是他的, 在警察面前, 把汽油浇遍 Diaz Ulerio 全身, 当场点着。结果, Daiz 被送入医院, 被确定为三度烧伤。

201. 特别报告员在同一封信中提请政府注意, 1992年转呈的 Felipe de Jesus Medrano Garcia 一案, 但一直未收到答复。

### 厄瓜多尔

#### 转交给政府的资料

202. 特别报告员于1993年8月26日的信件, 提请政府注意下述据称在罪行调查局的办公处遭酷刑的六人案件。

203. William Fuasto Andrade 于1992年6月6日在 Sucumbios 省, 亚马孙区 El Eno 教区的家中被两名身穿警服的警察和四名着便装者逮捕, 他们指控他与某人的死亡有牵连。他被押往 Lago Agrio 警察局, 并据报, 几小时后, 五名警察把他带往

Aguarico 河堤,在那对他进行了审讯并对他施用了酷刑。

204. Victor Hugo Cadena 于1992年7月25日在基多南部的Atahulpa区的街头被两名警察逮捕,而后被押往Pichinicha的罪行调查局。在被蒙住双眼、铐住双手的情况下,由那的四名警察就某些摩托车失盗问题,对他进行了审讯。根据所得到的资料,警察们用脚踢他的腹部和大腿、将其双手反绑悬吊并对他施行电击。三天后,在他获得释放之际,他向罪行调查局总部提出了申诉,据称,为此他遭到某些罪行调查局官员的死亡威胁。

205. Julio Lara Teran 于1992年7月17日在基多市北部地区被捕,而后被押往预审拘留中心。第二天,被押往 Pichinicha 罪行调查局,就一抢劫案对他进行了审讯。在审讯期间,他被捆住双手悬吊在空中,而他其中的一条手臂在此期间已经骨折。据报,他后来被押回预审拘留中心,未给予任何医疗照顾,一直关押至7月29日他被释放之日。

206. Felip Moreira Chavez 于1992年8月20日在洛斯里奥斯省的Quevedo被警察逮捕,因怀疑他曾抢劫了银行。他被押往罪行调查中心,而后在那死亡。据称,这是因为他所遭到的酷刑,特别是电击所致。

207. Luis Olmedo Aguilera Lopez 由于遭偷盗耕牛的指控,于1993年2月24日在其基多附近的 Pintag 家中被罪行调查局的一名警察带走,而后被转押至基多的罪行调查局。第二天当他被转押至Pichinicha 罪行调查局时,据报,他在那的朋友和亲属注意到他显然具有曾遭酷刑的迹象,并发现他行走困难。据报,他曾被押往基多省的第三国家警察局,而后又被转送回预审拘留中心。同一天,他被送往 Eugenio Espejo 医院,他在那死去。根据尸体解剖报告,他全身伤痕累累。

208. Jose Ignacio Chauvin 17岁,于1993年2月14日在基多市被警察逮捕,把他押往一所警察办事处。据称,他在那被铐在椅子上,抽打他的脸部和腹部以及其脚掌。几小时后,他在El Ejido 区附近获释。

## 埃 及

### 转交给政府的资料

209. 1993年8月26日,特别报告员向政府通报,他收到了一些报告。根据这些报告,各警察局、Lazoghly广场的国家安全情报局总部和Firaq al-Amn(治安旅)的住地以及全国的国家安全调查局警察施用酷刑已成为日常做法。据报,律师们向检



察厅提出的正式申诉,一直得不到答复或从不开展明确的调查。

210. 特别报告员还通报,国家安全调查局三年来一直非法利用中央治安部队在该国南部的营地,作为其拘留和拷打被怀疑属穆斯林团体的一些被拘留者的中心,目的是迫使这些人提供情报、或承认对他们的指控,或作为对他们的一种惩罚形式。其中具体提及了下述营地: Assiut 城附近, Assara 村对面, 位于尼罗河东岸的 Abnoub 营地; Qena 城6公里处, 位于 Sawam' a 地区附近的 Qena 营地; Fayyom 城15公里处, Kahafah 区域的 Fayyom 营地; 和 Dahar 警察局附近, Hurghada 市的红海营地。根据报告, 没有颁发过总统法令, 指令(在被视为军事禁地的地带)建立这些营地作为特别监狱, 而且这些营地也不属于1965年有关组建监狱的第396号法律所列的其他类监狱, 因此, 这些营地不属主管执行监狱组织法和决定的监狱当局的职权范围之列。此外, 据报, 这些营地不受司法监督、也没有登记拘留令的官方记录, 而且被关押在这些营地的被拘留者均不准与律师或家人联系。

211. 据报, 在中央治安部队营地采用的酷刑手段与国家安全调查局手法相同。这些手段从殴打、鞭打和折磨方式的悬吊, 直至把受刑者按入水中而后在水里通上电流, 对人体的敏感部位直接和间接地施用电击, 以及性虐待, 甚至威胁进行强奸。以下所列的人员均在这些营地内遭受过酷刑。

212. Mohamed Bakri el-Sheik 于1990年被捕, 被指控为纵火焚烧录像俱乐部。他被关押在中央治安部队在 Abnoub 的营地, 并据报, 他在这一个星期内遭到了殴打、折磨方式的悬吊、电击和性虐待等酷刑。

213. Ossama Bahey-Edin Mahmoud 于1991年11月11日被捕, 并被押往在 Assiut 的国家安全调查局。据称, 他在那遭到殴打。一天之后, 他被转送至 Abnoub 中央治安部队的营地, 被关押在阴暗、潮湿、不通风的囚室里。据报, 他被从那间囚室转押至营地的医院后, 被蒙住双眼、带着手铐、裸体悬吊在门柱上, 对他身体的敏感部位施用电击。

214. Moustafa Seddik Ibrahim 和 Gamil Hassan Metwalli 于1992年1月2日遭国家安全调查局逮捕并被押往他们的办事处。据报, 他们在被蒙住双眼、铐住双手的情况下, 遭殴打和冰水灌顶的虐待。两天之后, 他们被押往 Abnoub 中央治安部队的营地医院, 据报, 他们遭到严酷的殴打、五花八门折磨方式的悬吊、电击和性虐待。

215. Ashraf Aboul-Hassan Ibrahim 和 Saber Hamza Moubarak 于1992年7月31日在亚历山大遭国家安全调查局的逮捕。他们在亚历山大国家安全调查局的办事处和 Al-Labban 警察局关押了17天, 据称, 他们在那遭受了酷刑。随后, 他们又被转押

至中央治安部队的Qena营地,据报告,他们在那被蒙着眼睛、铐住双手、全身剥光、绑着双手悬吊,并在双肩上加压或双脚捆上重物、用电线和棍棒抽打、冰水灌顶以及电击。

216. Mohamed Elwi Ali 于1992年3月13日被捕、Hassan Mekkawi Hussein于1992年6月10日被捕、以及 Atteya Ahmed Mohamed于1992年7月17日被捕,据称,均在 Fayoum的中央治安部队营地遭到酷刑,包括棍棒殴打、用点着的烟头烙烫并对身体敏感部位施用电击。

217. 特别报告员还向政府转呈了下述段落中所描述的一些酷刑案件。

218. Al-Sharif Hassan Ahmed、Ahmad Ibrahim' Abd al-Galil、Qassim Ibrahim Qassim Qettish、' Ala' al-Din Isma' il' Abbas Ramadham 和 Mohammad Sa' id Mohammad' Abdu,于1992年8月在亚历山大被控为地下恐怖主义组织的成员而遭逮捕。其中一人,Al-Sharif Hassan 被判处死刑,其余的人分别被判处一年至终身监禁的徒刑。据报,他们在被捕后曾遭到酷刑,而且官方法医对他们进行检查之后,证实了与他们声称所受的酷刑相符的生理伤痕。据报所述的酷刑手段包括,对身体各部位施行的电击和殴打。

219. Mahmoud Guhayni al-Sa' dawī据称是1992年2月29日被捕的,被关押在 Istiqbal Tora监狱直至1992年5月21日,该日他被转送至Lazoghly广场的国家安全情报局总部。据报告,他在那的六天遭到严刑拷打,随后他在那座大楼里死亡。授权检查官进行的正式调查确认,他的死是由于循环和呼吸系统受抑制的原故,但未能详细说明死因。

220. ' Amer' Abd al-Mun' im 系反对派报刊《al-Sha' b》工作的新闻记者,于1992年7月因被控编制反政府传单而遭逮捕,在Lazoghly广场的国家安全调查局总部被关押了一个月。据报告,他曾遭殴打而且全身各处,特别是其左手遭电击施刑。

221. Mohammed Ali Mohammed Ali 因偷盗汽车的嫌疑于1993年1月24日被捕并被押往Agonza警察局。据报,在拘留期间,他曾被吊在门上,并抽打他的脚掌。据报,抽打之后,审讯主管最后还用粪尿污水伤害他,致使他腿上留下了坏疽。为此,他不得不在Oasr Al Alny 医院进行了三次手术。

222. 同时,还收到了有关开罗地区一些监狱现状的资料,特别是Tora Istikbal 和 Abu Za' bal LIman 监狱的情况。据报告,由于治安原因而被捕的被拘留者在被转送至监狱之前,在国家安全调查局审讯期间遭酷刑已成惯例,有时甚至还被悄悄地从监狱押解至国家安全调查局遭受酷刑。施行酷刑的手段,除其他外,还

包括用电棒和栓有金属片的皮鞭进行抽打。下述是一些来文呈送的各个案件。

223. Mohammed As-Sayyid Said博士和 Amir Salem 系埃及人权组织董事会董事,和Hisham Mubarak, 律师,于1989年8月被捕,因为据称他们是埃及工人共产党党员,并据报告,Hisham Mubarak曾遭酷刑,造成右耳内出血并暂时性地失去听力,此外,他的背部和头部也伤痕累累。同时,由于对其脊骨的直接敲打,使得他无法移动其右腿。

224. 此外,还有报告称,那些迫切需求治疗或那些被建议送到监外医院专门护理的囚犯们往往被拒绝医疗照顾。据称,因为医疗照顾的条件差,甚至根本就没有,有些囚犯在监狱的医院或其囚室中死亡。以Talip Kilich,52岁,一案为例,他系关押在Qanater狱中的土耳其籍囚犯,据称因于1991年7月27日遭狱警的殴打后,死于其囚室中。还有一件是Mohammed Mahmoud Shak案,他是关押在Qanater狱中的索马里籍犯,据称,由于他曾企图越狱,遭到毒打后,于1991年11月29日死亡。虽然,曾批准(将他的头、手臂及腿捆绑在十字型的木架上)抽打75鞭,但却大约有一百名狱警对他进行了轮流抽打。后来,他就死在随后被关进的那间地下囚室。据称,他所受的伤未得到过医治。

225. 特别报告员于1993年8月26日的同一封信中提醒政府注意,一直未收到政府答复的、1992年转呈的酷刑指控案。

### 评述意见

226. 特别报告员与禁止酷刑委员会对埃及恐怖主义的严重问题甚为关注和震惊(CAT/C/SR.170,第2段)。这些从事恐怖主义行动的集团,荒谬地援引宗教为其险恶的袭击行径辩护,其直接伤害的往往是平民百姓、埃及人和外国人。同时,他也颇为关注委员会所作的评论意见,即酷刑在埃及已成为通常的做法,而困难的局势不能成为对恐怖分子嫌疑或任何人采取绝对禁止的酷刑做法的理由。他赞同委员会的提议和建议,特别是旨在于结束单独监禁和将负有责任者绳之以法的提议。

### 赤道几内亚

### 转交给政府的资料

227. 特别报告员于1993年8月26日的信件向政府通报他所收到的资料。根据

资料,酷刑是赤道几内亚惯常的作法,以作为从被拘留者提取口供的手段或惩罚的形式。虽然,这种手法主要是针对因政治原因的被拘留者,但据报这也用来对付一般罪行的嫌疑。各种酷刑的手段包括殴打,特别是抽打脚掌、电击生殖器以及捆绑住被拘留者的双脚或双手的悬吊。此外在警察拘留期间,酷刑是常见的现象,但还有报告称,一些已被判刑的囚犯有时也被安全部队押出监狱并受酷刑。

228. 据报,管教所的条件,特别是妇女的状况颇为悲惨。Malabo的“黑色海岸”监狱与Bata监狱没有任何真正隔离男女囚犯的措施,因而男囚犯和/或狱警对女囚犯进行性虐待和强奸的事件常有发生。医疗照顾遭到蓄意的剥夺。

229. 以下是一些转呈政府的各个案件:

- (a) Andres Angue Abeso 是Sen-Esason的前市镇委员会委员,1992年4月因利用魔术反对当局的指控而被捕。据称,他遭到严刑拷打,并被绑在一根柱子上,在太阳下暴晒了五个小时。
- (b) Demetrio Alfara、Tomas Buechecu、Julio Esono、Enrique Ndong、Pablo Ndong、Gaspar Ondo 和 Guadalupe Ngue 是1992年9月1日警察突然搜捕 Malabo的赤道几内亚进步党党部时被拘留的29人中的几位人员。这些被拘留者被押送至国民警察总部,而以上所列的一些人员则被转入Playa Negra 监狱。据报,所有的被拘留者都遭到抽打脚掌的酷刑。
- (c) Esteban Juan Mbomio Nchama 在黑海岸监狱服四年的刑役,于1991年6月8日被押往某一警察局因某些被指控犯有谋杀罪的囚犯案件被提审。据报,他被捆住手脚,并遭毒打,而且还绑着手腕悬吊达六个小时,直到他的一条胳膊折断才罢休。而后,他被送回监狱,关在警闭囚室里达七个月之久,不提供任何医疗照顾。
- (d) Damas Abaga Nve 死于1993年3月31日,据称,是在Ebebiyin警察局办公处遭到的酷刑所致。据报,当地医院的一名医生对尸体进行了验查,并确认其左手骨折、头部3处青紫块、前额两处青肿和左手指被砍伤。

230. 特别报告员被告知,由于1992年11月24日的和平集会,约有40名学生和教员遭警察的逮捕,并被关押了两天。据报,他们都遭到严厉的酷刑。

231. 此外,1992年12月17日在Malabo约有100人被捕,其中包括Malabo全国中等教育学院的教师,并在10天之后才获释。据报,其中大部分人的头部、背部、生殖器以及他们的脚掌均遭到反复抽打。例如,Celestino Bacale,系促进社会民主聚

会成员,肾部被严重打伤,牙齿被打断,而 Arsenio Moro 肋骨被折断,耳膜被穿破。

### 紧急呼吁

232. 特别报告员就下述段落所提及的一些人员发出了紧急呼吁,因担心他们在被拘留期间可能会遭到酷刑。这些呼吁转呈的日期列在摘要相应案文末尾的括弧内。

233. 1993年8月底民众联盟党领袖从流亡中返回时,有21人遭逮捕。据称,被拘留者被押送到前摩洛哥卫兵的兵营,他们在那被浇上汽油,置于烈日下暴晒达数小时。其中一名后来获释的被拘留者称,曾遭到严刑拷打,致使其耳朵、脚和大腿受伤,造成行走的极度困难。同时,还有报告称,一位民众联盟党的成员, Pedro Motu 于8月22日被捕,几天后,因在黑色海岸监狱遭酷刑而死亡。(1993年8月31日)

234. Francisco Engono Micue 系Bata市镇厅51岁的公务员,以及其表亲 Jose Ramon Obama 据称于1993年8月31日被Bata治安警察的成员逮捕,并在被押往警察局的途中一路遭到殴打。(1993年9月31日)

235. Tobia Obiang Nguema 前陆军上尉,于1993年9月3日在木尼河省西北部的Ebebiyin被捕。据报,他后来被转押至Malabo,在位于总统行官附近的一所军事兵营接受审讯。在审讯期间,他遭到严刑拷打,强迫他签署一份承认曾参与推翻本届政府未遂政变的供认书。(1993年9月14日)

## 埃塞俄比亚

### 紧急呼吁

236. 特别报告员于1993年10月21日就埃塞俄比亚东部 Dire Dawa 的 Oromo 救济协会地区办事处的下述一些人员,向政府发出了一份紧急呼吁: Ahmed Mohamed、Abbas Said、Sharif Mohamed、Usaman Umar、Ali Haider、Abdulaziz Abdallah、Mohamed Ahmed、Ammw Hamid、Mohamed Abdu、Mussa Ibrahim、Raya Abdi、Hamid Abdullahi、Galaye Tufe、Tajudin Abdullah 和 Mohamed Izzedin。据报,他们于1993年9月26日-1993年10月2日期间被治安部队的成员逮捕,显然是因为怀疑他们与Oromo解放阵线有牵连。人们认为他们被关押在Dire Dawa 附近的一所“纠正营”内,该处原是一座军事训练营,自1991年以来一直被用

作关押被指称为Oromo解放阵线成员的拘留营。人们担心他们可能会遭到酷刑。

### 危地马拉

#### 转交给政府的资料和所收到的答复

237. 特别报告员于1993年8月26日向政府转呈了下述据称在该国发生的酷刑案件：

- (a) Pablo Itzep Hernandez、Cruz Luz Hernandez 和 Manul Baten Hernandez 均系埃尔基切省Cunen 自治区,Chiul,Xequiquel社区的农民,也是“Runujuel Junam”民族社区委员会的成员,于1993年5月8日被传唤至Chiul军事分队。 据报,当抵达该分队部后,他们遭数小时施加酷刑的审讯。据报,除其他形式的酷刑外,他们还遭到对其脸部的踢打和用烧着的木材烙烫。 由于所遭到的酷刑,他们在获释之后,不得不住院治疗。
- (b) Santiago Cabrera Lopez 和 Anastasia Lopez Calvo 均被指控为危地马拉 全国革命团体的成员, 于1991年3月在圣马科斯省的圣佩德罗 Colima I 附近被G-2军事情报局的成员逮捕。 据报,他们被押往圣佩德罗的 El Provenir军事分部, 在那遭到严刑拷打。 据称, Cabrera Lopez 被投入一水坑而后遭电击。
- (c) Julio Cesar Reyes, 是一名街头流浪儿童,他于1993年3月14日在危地马拉城的1号区,被两名检查其身份证的警察逮捕。由于他无法出示身份证,警察准备把Julio Cezar Reyes 带回警察局,但他拒不服从。据报,其中一名警察焚烧他的左肩和手指,造成29处烧伤。
- (d) Sergio Fernando Archila, 学生,1992年8月3日在危地马拉城的6号大街上 被 G -2军事情报局的特工人员逮捕, 他被蒙住双眼, 往Alta Verapaz,Coban附近外界不详的一座军事拘留营。据报,在对他进行审讯时,他遭到烟头的烙烫、头上套着浸透杀虫药剂的蒙头罩,并击打他的腹部。

238. 特别报告员还于同一封信中感谢政府对1992年转呈的Juan Pablo Lemus Silva(仍在调查中)的案件所作的答复,并提醒政府注意1992年转呈的,但一直未收到答复的一些案件。

### 紧急呼吁

239. 特别报告员于1993年7月22日向政府发出了一份有关Tomas Perez Perez, 农民团结委员会成员的紧急呼吁。据称,他是1993年7月9日在埃尔基切省,奇奇卡斯特南戈自治区的Santo Tomas ,Chontala 被若干国民警察和一些便衣逮捕的。根据所得到的资料,Tomas Perez Peraz 在被审讯期间,曾遭严刑拷打,要他供出从其家中搜出的一些有关Rigoberta Menchu 的小册子来源,以及1991年对被秘密埋葬在Chontala 27具尸体进行发掘验尸的目的。

### 政府就委员会第1993/48号文件提交的资料

240. 政府于1993年11月19日的普通照会阐明,以往数年来的国内冲突,造成了数千人丧生、失踪、沦为难民和流离失所者,并造成对基础设施的肆意破坏和对资源不公正的分配。照会还阐明,在该国内活动的游击队团体在冲突中违背了民主法律和各项国际盟约,犯下了严重的侵犯人权行为,并且多次侵害了未参与冲突的平民百姓。政府还提及了为制止毒品贩运所采取的一些措施。但是它指出,毒品贩运分子从事的活动不能被视为恐怖主义活动,因为他们不是蓄意反政府的活动。

### 海 地

### 转交给事实上政府的资料

241. 特别报告员于1993年11月8日的信件向事实上政府通报,他收到了指控军方的某些排长虐待平民以及与他们一起工作的平民的报告。据称,在逮捕人时必然要进行严刑拷打,而且在军方或警方的拘留营里的殴打也是每天所发生的常事。同时,还有报告称不论是在集会期间,还是治安部队闯入太子港或其他主要城市的某一住区时,都发生过在街头殴打人的事件。在这些事件中妇女和儿童均遭严酷的毒打。还有报告称,太子港的警察前往街头儿童夜间露宿的地方,一般是城市的公墓周围,抽打这些儿童,从而把他们赶到不太引人注目的地点去。下述各段落还转呈了各起案件:

242. Jude Damus 在格兰德-安斯省Anse d' Hainault,Dame Marie 暴发的反

政府集会之后，于1992年9月10日被武装部队逮捕。据报，他起先被关押在Anse d' Hainault 监狱，在那每天都遭到虐待，而后又被转押到Jeremie监狱。由于所遭受的虐待，他的一条胳膊被折断。

243. Rigend Severe 据报于1992年10月10日在Verrets遭士兵的毒打，造成其左手骨折。

244. Leres Sidor 据称于1992年11月12日在Desarms被非法逮捕，并遭到该排长的毒打。他是在向两位加拿大和三位美国人展示本区域发展项目时，当着这些来访者的面被捕并遭毒打的。据称，他后来被押往军事驻地，并再次遭殴打。

245. Philippe Pierre 于1992年11月20日被捕，并被押关至Petit-Goave军营，遭严刑拷打之后死于军营内。

246. Jean Augustin 系一基层组织的成员，据报于1992年11月30日夜间在太子港被捕，并被带往防止不法团伙情报局，在那遭到严酷的毒打。

247. Maurice Damucy 系民主运动大会全国委员会成员，据报于1992年12月8日在东南省的Bainet被一群士兵逮捕，并遭到毒打。

248. Dieuland Corjelas 系Jean Rabel城西北地区附近的一农民组织的成员，于1993年1月6日被驻该地的武装部队排长及其助手们逮捕并遭到毒打。

249. Raymond Amazan 于1993年1月11日在南部省的Les Cayes镇被治安部队的成员逮捕，并遭殴打。

250. Origene Crierias 于1993年1月15日因被指控为Lavalas嫌疑，被驻Saut d'eau的排长逮捕。据称，士兵们对他进行了严刑拷打，撕扯他的胡子并用火柴烧他身体的各个部位。

251. Jean-Emile Estimable 系《Cacique电台》的记者，于1993年1月22日在拉蒂博尼特省Marchand Dessalines的第3区段，Pont Joux村被捕，并先被转押至Marchand Messalines监狱，而后又转入ST· Marc 监狱。据称，他曾遭到毒打，特别是用“Calotte marassa”手法施用的酷刑，即一般由站立在其身后的人双手同时拍击他的两耳。

252. Ernst Jeudi 于1993年2月7日在Desdunes大教堂前被全副武装的下士逮捕，被押往Desdunes兵营。据称，他遭到“Jack”式的酷刑手法，即把受刑者捆绑在穿过其双腿和双臂的棍棒上，对他进行殴打。

253. Monsignor Willy Romelus 系Feremie的罗马天主教的主教，据报在太子港的教堂里主持了弥撒仪式之后，遭一群武装众伙的袭击和殴打。据目睹者所述，当时治安部队的成员们袖手旁观主教被击倒在地上，面部一再遭到拳打脚踢。



254. Jean-Luc Antoine, 据报因在街上边走边饮而遭一下士的逮捕后,被驻西南省Bainet的军队于1993年3月初殴打致死。

255. Patrick Bourdeaux系一基层组织的成员,据报于1993年3月1日在格兰德-安尼斯省的Jeremie被武装部队成员逮捕,并遭严重的殴打。

256. Cajuste Lexius系工人总工会(Central General de Travailleurs)的秘书长;Phabonor ST· Vil 和 Saveur Aurelus 均为总工会的成员,据报于1993年4月23日在太子港的《Caraible电台》前,被第3营着军装的军警逮捕。在被拘押期间,他们遭到警棍和拳脚对他们全身乱踢的毒打。据报,Cajuste Lexius 因此而连续两天昏厥不醒,臀部遍布创伤并出现肾衰竭。

257. 特别报告员还被告知,1993年3月3日人们认为与政府部队有关的一群武装枪手,彻底搜查了位于太子港Pouplard大街,美国籍居民,Saint-Jean Servi的住房。这伙袭击者殴打了他73岁的老母并殴打和强奸了他的妻子。

258. 除上述这些案件外,特别报告员还收到了载有,据称在1992年6月至1993年1月期间被捕后,遭酷刑的如下一些人员的名单: Franckel Augustin、Waldeck Augustin、Serges Belval、Luc Bienaime、Herlod Bourcicault、Wilfrid Bruno、Julien Cadet、Pierronvil Calixte、Clemard Canadien、Bona Charles、Roger Charles、Jean Chery、Georgette Dantes(孕妇)、Arnold Dehoux、Franckel Delva、Daniel Demesmin、Jean Ernsso Divers、Gabriel Dolce、Etienne Dorelus、Jean Denis Ducanord、Pomise Duverseau、(a 63-year-old woman)、Aldrine Duvivier、Jacques Eddy、Clerma Edmond、Mathurin Elusma、Jackson Etienne、Guerda Exenor、Lucien Fils Aime、Germene Garconvil、Orilaire Guerrier、Volvick Guerrier、Monfiance Herard、Nelio Jabrun、Josue Jean Herad、Dutemps Jean Louis、Luciani Jean、Louisjean Joanis、Euclide Josassin、Stephen Joseph、Judith Lacouture、Janise Laroche、Francois Louis、Carlot Louis、Neder Marcelin、Altide Mathieu Louisdor、Jacob Michard、James Michel、Baptista Milot、Pierre Mixo、Francois Mondesir、Lucenie Myrthil、Titet Nenet、Abner Nicolas、Elvie Payoute、Denis Philippe、Charles Pierre、Jaccilia Pierre、Philippe Pierre、Auguste Porcelay、Nicolas Raymond、Fresnel Regis、Jean Baptiste Samson、Luckner Simeus、Patrick Somezil、Celiane St. Fleur、Jeancilia St. Hilaire、Pierre St. Louis、Selondieu Sylvestre、Christian Theodore、Maurice Theodore、Jean Thomas、Lepe Ti、Thony Pierre

Vixamar、Huguens Voltaire 和 Voltaire Remy。

### 紧急呼吁

259. 特别报告员就1993年11月20日在太子港被士兵们逮捕的,拉蒂博尼特省, Gonaives, Raboteau 贫民区居民 ,Sergit Metazer、Djobit Cius 和 Bertrand Dorismon的案情,于1993年12月6日向事实上的政府发出了一份紧急呼吁。据称,他们在被捕时遭到殴打并被押送至 Gonaives 监狱。同一天, Chatte Metayer 和 Anvi Charitable 也在 Raboteau 遭逮捕并据称遭到“Djak”式手法的酷刑。

### 评述意见

260. 特别报告员赞同海地人权情况特别报告员提交联大的临时报告,认为海地的军警仍然广泛并蓄意地采用酷刑对待和虐待平民百姓以及与他们一起工作的平民(A/48/561,第68-77段)。

## 印 度

### 转呈政府的资料和收到的答复

261. 特别报告员于1993年8月9日的信件向政府通报,他收到的报告指称,各警察局对罪行嫌疑以及因政治原因被捕的被拘留者实施酷刑,以期提取供述或情报,并且有许多被拘留者因此而死亡。酷刑手段包括:向两边撕拉受刑者的腿,以造成巨大的痛苦和骨盆内伤;用沉重的木棍或金属棍滚压受刑者的大腿;电击受刑者的生殖器、头部、耳朵和腿;用藤条和皮条长时间地抽打;把受刑者的双手捆绑在背后,并将他或她双脚朝上倒吊在天花板下;强奸、威胁强奸或骚扰;断绝食物和饮水;将人裸身置于冰冻寒冷之处,而夏天则置于烈日下暴晒。

262. 同时,根据所收到的资料,全国的警察进行强奸已是普遍现象。这些受害者一般是一些贫困的妇女和社会地位颇低的易受害和少数人群体的妇女,他们是被作为嫌疑或以受通缉罪犯或政治案犯亲属的名义作为人质或为了敲诈赎金而被捕的。据报,在一些冲突地区镇压反叛行动期间,也发生了强奸事件。

263. 以下阐述的是转呈给政府的一些案件。

264. Ganeshan 系泰米尔《Nakkeeran》新闻周刊的出版及印刷商,因该报刊登发表了一篇社论,抨击了泰米尔纳德的主管部长对待新闻界的作法,于1992年4月10日被泰米尔纳德的警察逮捕。据称,在他于4月20日被释放出来之后,在向其同事述说他如何遭受警察的酷刑时,昏倒在《akkkeeran》的办公室里。他被立即送入一家私人医院,之后在医院里死亡。

265. 政府1993年12月3日的答复称,此人被捕是因为他在《Nakkeeran》上发表了满篇庸俗、煽动、下流和诽谤性语言的文章。他被当即提交给了都市增设首席法官,该法官将他转交司法监押。同时还启动了保释申请程序,列明于1992年4月16日开庭审理,对此,法官曾记录“没提出受酷刑或虐待的申诉”。甚至在1992年4月16日保释申请的审理过程中,他的律师也未提出过此类申诉或医治的要求,尽管保释要求未得到批准。1992年4月20日Madras 的法庭批准了保释。获释那天,R.Ganesan在Madras中央监狱附近接受了《Nakkeeran》编辑的工作人员献给他的花环。《Nakkeeran》1992年4月30日刊发表了有关这一事件的照片,未提及任何有关酷刑或虐待之事。但是,该周刊却提到Ganesan患有心脏病和高血压。他于1992年4月26日被送入Devaki医院。但验尸报告也并未载明他有曾遭受酷刑的迹象或证据。

266. Nadagopal 系贱民社区出身的某一大学雇员,据报因与偷盗有关而于1992年5月29日被捕,并拘留受审。据称,他于1992年6月3日在泰米尔纳德的南Arcot区,Chidambaram, Annamalaingar 警察局被拘留期间,遭受4天的酷刑后死亡。尸体解剖验查报告证实身上有21处伤。他的第二位妻子,Padmini也于5月29日被捕,也被关押在同一个警察局。据报,她被当着其丈夫的面遭四名警察的强奸。

267. Vidyadharan 系喀拉拉邦Alppuzha区,Haripad Taluk, Karthikapally Panchayat国民大会“改革派”主席,于1993年2月18日在Haripad被警察逮捕。据报,他在警察拘留期间曾遭酷刑,并被紧急送入Haripad 的政府医院,入院后当即被宣布已死亡。

268. 1993年12月3日政府向特别报告员通报,曾发现Vidyadharan在Harpiad被拘留期间企图上吊自杀。第二天发现他一动也不动地躺在那后,立即被送入医院,而后医院宣布他已死亡。这已列为刑事案,并正由警署监察长进行调查。

269. Satyavan 来自Jharoda Kalan 村,据称,因在德里的Najafgran警察局遭酷刑,于1993年3月2日死亡。据报,与他同期被捕的几位朋友,在警察局里均遭到毒打,直至Satyavan倒下之后。

270. Rajinder Prasad系Mayapui工业区印度保险箱厂的工人,据称在遭警察和工厂经理的打手们施行的酷刑之后,于1993年4月11日死亡。据报,有两名警察被

停职并已由分署调查法官进行调查。但是,据所知,没有一个完全独立地当局就此展开调查,也没有对被指称应为其死亡负责的警官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271. 政府于1993年12月3日的答复称,据报Rajinder Prasadey 其另两位朋友于1993年4月11日在跨越铁路时,被一列火车意外地撞倒压死。铁路当局的调查表明这是意外的事故。在死亡发生之后,工厂的一位工人提出了一份申诉,声称他们曾遭厂主的殴打。根据此申诉已经立案,并逮捕了厂主和其他一些人。该案正在调查之中。

272. 特别报告员还收到资料,据称治安部队的成员在查谟和克什米尔的行动期间,犯有某种格局性的侵犯人权行为。其中包括往往针对克什米尔民兵团体袭击部队的行动,治安部队报复性地施行酷刑和强奸的报告。据报,酷刑被当作从被拘留者口中提取情报、迫使其供述或对付某些据认为是游击力量同情者的惩罚手段。在克什米尔展开活动的每一支政府部队,包括印度军队、印度联邦预备役部队、中央预备役警察部队和边防保安部队都在克什米尔设有自己的审讯中心。

273. 据报,治安人员在拘留人时,往往无视程序性的保障条款。尽管印度法律规定,被被拘留者必需在24小时内提交地方法官,但实际上被拘留者却极少被提交出去。虽然,印度的《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禁止逼供并规定了对在被拘留期间死亡案的调查条款和对犯有施用酷刑罪的官员应判处的监禁条例,但也一概无人理睬。据报,应为在克什米尔实施酷刑负责的治安部队人员,从来也未因其行为而遭到刑法的追究。

274. 还有报告称,强奸在克什米尔已司空见惯,以作为迫害被怀疑同情所谓民兵分子的人或与他们有牵连的妇女的惩罚手段;或成为针对据认为同情这些民兵分子的平民百姓的一种报复形式。当局极少调查对治安部队提出的强奸指控,即便进行了调查也从不确立刑事诉讼程序。这类事件在例如,Pluwama区, Shopian附近的Chak Saidapora; Srinagar 附近的Harana; 和 Handwara区的Gurihakhar等均有报道。下述一些段落中所述的各起案件均已转呈给了政府。

275. Muzaffar Ahmed Mirza 于1991年10月4日在Srignar 南部约4 公里处的Tral村被捕。据称,他曾遭到殴打并对其生殖器施用了电击。而后,又用一根铁条插入他的肛门,直穿至他的胸部。他在一条小道边被找着,第二天因极度的疼痛被送入医学院的附属医院。次日,他在医院里接受了胸部手术,开刀后发现胸膜和左肺大面积撕裂。在随后的二、三个星期内,由于内部感染而死亡。

276. Manzoor Ahmed Ganai 系查谟和克什米尔Gahderbal, Wakoora区的居民,据报于1993年1月7日在Bihar第10陆军团的士兵对其村庄进行大搜查期间,与其他14

人同时被捕。据报,他在被捕的10天内遭到士兵们用电击、棍棒和枪杆的殴打以及踩踏。据称,而后又把他倒吊了约24个小时,直至他失去知觉,而且还用煤油烧他的大腿后部。

277. 政府于1993年12月3日向特别报告员通报,Manzoor A·Ganai经审讯后已经获释,并于1992年1月22日返回其家庭。他于1992年2月14日死于医院。验尸证明,其死因是肾衰竭所致。其父于1993年5月28日提出了上诉,现正就此案进行调查。

278. Nazeera Jan 于1993年5月25日遭到驻 Srinagar 郊外 Zainakote 工业区 Rajput 长枪队的一群士兵当着其孩子面,对她进行的轮奸。

279. Masroof Sultan 系来自 Batamaloo 的学院学生,于1993年4月8日被准军事边界治安部队拘留。据报,他被四名士兵蒙住眼睛后,施行的毒打,而后与其他一些青年人被押解至一栋大楼里,那里的边界治安部队警员企图逼迫他承认自己是一民兵队员。据报,当他拒绝时,他被双膝捆在一根横杠上倒悬,遭受毒打,直到他的脚被打断为止。他后来被转押至Papa II,即 Srinagar 附近的一所审讯中心,据称,他在那遭到电击的酷刑。最后,他遭到枪击,尽管身中数弹,却有幸存活下来了。

280. 在旁遮普邦似乎也具有类似的情况,据称,该邦的特别立法《防止恐怖主义和破坏活动法》准许治安部队有权不按一般的法律保障条款并在不予起诉或审理的情况下,任意逮捕和拘留人员。被囚禁者可在非法、无人确认的拘留营内被关押达数周,甚至有时达若干个月,而不把他们提交给法官。此外,法律还规定,在督监级别警衔以上的警官前所作的供述,可成为可接受的证据。据报,这些情况促使了酷刑的施行,据称酷刑已成为各警察局、监狱和在准军事力量所使用的拘留营内蓄意采用的手法。以下段落所述的是已转呈给政府的各例案件。

281. Gurmit Kaur 来自(Batala) Bham 村,于1989年4月21日被Karthu Nangal 警察局的警官们逮捕,他们就她父亲与各反对党派团体的关系对她进行了审讯。据报,在被拘留期间,她遭到毒打、倒吊和轮奸。三天后,在未对她提出任何起诉的情况下获释,并被送入Dhaliwal 医院。

282. Gurbir Singh 来自 Ludhiana 区的 Ghungrana 村,于1991年底被捕,并被 Ludhiana 区的警察拘留,并据称,曾遭到警察的毒打。在他被从监狱中释放出来以后,他不得不住了若干个星期的医院。

283. Harjider Kaur,系Latala 村Hardeep Singh 的妻子,据报于1992年8月11日遭到搜查其住房警察成员的殴打。据报,她的丈夫,Hardeep Singh、她的姊妹, Nasib Kaur 以及其内弟,Amarjeet Singh在被押解至 Sudhar 警察局之前,均

遭到毒打。由于毒打造成的伤势,Harjinder Kaur 当晚就死于Kundan Lal 医院。

284. 政府于1993年12月3日答复称,在得到 Hardeep Singh 是恐怖主义死硬分子的确凿情报后,对他的住房进行了突击搜查,并对此案作了登记。关于 Harjinder Kaur 之死,该国政府重申,她是被其家院中的水牛撞死的。她被紧急送往附近的医院,但却因伤势过重而死亡。由于这是非自然性死亡,已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74节进行了调查。Latala 村的长老会发表的证词明确无误地阐明,Harjinder Kaur 是由于在其自己家中遭水牛顶伤后死亡。Ludhiana 公民医院的一组医生进行解剖后提交的报告也断定,由于水牛造成的大面积创伤,导致内部出血和休克而致死。

285. Bhai Gurdev Sikh 系锡克族宗教传经士,于1992年12月25日被 Jagraon 警察逮捕。据报,由于他所遭到的酷刑,于数日后死亡。

286. Bishambar 于1992年10月6日在哈里亚纳邦的Nikhri村被警察成员逮捕。据称,他们用轮胎胶皮编制的皮鞭抽打和殴打他,并在他昏迷过去时,阉割了他。

287. Vikal Kumar Adhana 系来自哈里亚纳邦Faridabad,Tigaon 的财政部助理,因假冒和索贿嫌疑,于1993年2月23日下午在 Rajdeep 宾馆被中央调查局逮捕。他先在中央调查局的办公处受审,当晚被转押至Lodhi Colony 警察局。警察显然未在每日记事录上将Vikal Kumar 的被捕登记入册。第二天清晨,发现他已死于禁闭室内。尽管警方声称他是自缢身死的,但“死亡报告”列明尸体上的若干伤痕显示出酷刑的迹象。

### 评述意见

288. 特别报告员就以下人们担心在被拘留期间可能会遭酷刑的一些人员,向政府发出了四份紧急呼吁。在下述摘录的相应案文末尾括弧里均注明了以上呼吁的发出日期。

289. Mohinder Singh Grewal 系旁遮普邦 Ludhiana的国际人权组织的秘书长,据报,于1993年3月23-24日被召到中央调查局驻Ludhiana办公处接受传讯。据称,旁遮普邦的一名高级警官不但对 Grewal 先生进行了虐待,并且还威胁他,如继续编写指称警察侵犯人权行为的报告,他将会遭到严厉的酷刑或遭谋杀。(1993年4月5日)

290. 关于此案,政府称德里派出警察前往Ludhiana 调查 Delhi商人遭绑架的事件。由于德里的警察得知绑架者曾使用过 Mohinder Singh Grewal 的电话,因

此,召他前往Ludhiana的(中央调查)监察长办公处进行查问。政府断然否认,Mohinder Singh Grewal曾遭 Ludhiana 警察督监或任何其他虐待的指称。此外,否认曾有夺走或没收他的笔记本,或曾强迫他说出其个人电话号码之事。

291. 据称曾由于1992年5月在西孟加拉邦,Durgapul警察局遭酷刑而身亡的一位18岁学生的家庭,Rupesh Singh 一家,据报由于他们提出了上诉,警察威胁他们将为此付出直接的代价后,他们逃到了哈里亚纳邦的 Gurgaon 。但是,Rupesh Singh 的母亲和妹妹,即Seema Raghavan 和 Kanta Devi 又于1992年11月返回了故里。1993年1月有一民权组织向加尔各答高级法院提出了一诉讼案,而 Seema Raghavan和 Kanta Devi 也参与了此起诉案。据称,警察为此闯入其住房,再次对她们进行了骚扰并威胁。(1993年4月8日)

292. Gurjit Singh 据报于1993年5月8日在旁遮普邦Ludhianar Mohi 村被五名便衣警察逮捕。5月11日警方当局非正式地承认 Gurjit Singh 已被他们收押。但家属和律师均不准探望他。(1993年5月17日)

293. Nazir Ahmed Misri 系一学校教员,据称,于1993年6月7日被在 Sringar 的零号桥地区开展军事行动的边界治安部队拘留。人们担心,在被拘留期间,他可能会遭到酷刑或虐待。(1993年6月25日)

#### 从政府收到的有关上几次报告中所列的一些案件的资料

294. 政府提交了特别报告员于1992年8月转呈的据称因遭酷刑而死亡的若干案件的资料。以下各段落载有有关的摘要。

295. Jarim Singh 于1991年8月18日死于Patel Nagar 警察局。政府于1992年12月10日向特别报告员通报,四名警察因犯有用权过度和施用酷刑的嫌疑而被捕并停职。这一案正有待于德里的增设法院和地方法官进行审理。对当初在该警察局审讯 Jaiam Singh时在场的监察长下达了一项部门调查令,并且已把他调往不太敏感的地点。

296. Uppuleti Chandraiah 来自Karimnagar区的 Peechupalli,1991年3月死于Husnbad警察局。1992年12月11日政府向特别报告员通报,区和地方法官已经过调查,确认Uppuleti Chandraiah 警察局遭到非法的拘留并遭用Lathi(棍棒)施行的酷刑,由于多处致伤而死亡。他不是警察局的禁闭室内用布条自缢身亡的。其中一名警官应为造成他的死亡承担直接的责任,另外五名也与造成他的死亡有牵连。从事尸体解剖的法医官也应为袒护警察方人员肆意和蓄意歪事实,编造验尸结论假

证明而承担责任。国家政府接受了委员会的调查结果,并停止了一名警官的职务。那位解剖验尸的医生也被停职。本案目前正在调查之中。

297. 特里凡得琅 Neyyattinkara 的 Kuttappam 于1991年7月3日被特里凡得琅Parassala 警察逮捕,第二天即死亡。政府于1992年12月14日向特别报告员通报,1991年7月9日夜晚人们发现Kuttappam鬼鬼祟祟地在椰树林里潜行,看夜人向Parassala警察局报告后,将其逮捕。经审讯后,发现他是一个疯子,而后于上午10时30分将他释放,他于1991年7月10日19时死亡。1991年7月17日就此列为刑事案,并由国家刑事分庭展开了调查,结果查明看夜人和其他两人在Parassala警察抵达之前曾一起殴打了Kuttappam,造成其脾部严重受损。调查结束后,于1992年3月19日向法院提出了起诉,而该案正在审理之中。

298. Bulbul Barw 来自Maza Lakhimpur, Kherajghat, Puli Nahoroni村,于1991年10月12日被驻Bandraawa村的军方逮捕,并于10月22日死亡。政府于1992年12月12日向特别报告员通报,Bulbul 是Assam联合解放阵线,即一恐怖主义组织的成员。1991年10月14日治安部队就其与联合解放阵线活动的关系进行了询问,但于1991年10月15日释放,并返回其叔叔的家中。他没有提出过遭受酷刑的指控。但是,根据死后的报告,还是立了案,目前正在调查之中。

299. Dbakar Handique, 来自北Lakhimpur, Dhplpur Maiza的Basapukhuri, 于1991年9月28日被捕,10月1日死于一军方的兵营内。政府于1992年12月21日向特别报告员通报,由于其所患的疾病,他在被拘留期间病故。为搞清事实,地方法官已确立了对他的调查案,而调查正在开展之中。

300. Dhruvajyoti Gogoi 于1991年3月17日在 Tinsukia 的 Doomdooma 被军队逮捕。两天后他遍布酷刑伤痕的尸体被送交给了警察。政府于1992年3月17日向特别报告员通报,治安部队于1991年3月18日在Naharani村开展反恐怖主义行动时,捕获了联合解放阵线的恐怖主义者,Dhruvajyoti Gogoi。从他那搜到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和钱款,以及由于他所揭露的隐藏物品。他于1991年3月19日被俘期间死亡。在捕捉他的一场扭斗挣扎期间有人击伤了他的头部,很可能是造成其死亡的原因。1991年6月18日Guwahati高等法院随后对此作出了判决,根据法院下达的法令,向Dhruvajyoti Gogoi先生的父母支付了一笔善后费。

301. Gambhir Gogoi,来自 Dibrugarh 区的 Duliajian, 于1990年11月底被军方逮捕。几天之后,他遍布酷刑痕迹的尸体被移交给了警察。政府于1992年12月23日向特别报告员通报,Gambhir Gogoi 曾因怀疑其与联合解放阵线的恐怖主义活动有牵连而被拘留受审问。他承认他曾在胁迫之下为联合解放阵线效劳,但自愿协



助军方,带路引导治安部队前往联合解放阵线的营地“Saraipung森林”。在接近营地处,军队与联合解放阵线的武装分子之间展开了一场激战。联合解放阵线的武装分子引爆了许多自制的爆炸装置。在一枚此类的装置爆炸时,Gambhir Gogoi先生与两名保护他的治安人员均严重受伤。Gogoi先生当即被撤出并给予了抢救,但因伤势过重而死亡。死后的尸体解剖也证实了致死的原因。

302. Savinder Singh 系德里南部的居民,于1992年2月28日被捕,并被押往 Khan 市场附近位于Loknank Bhavan 财政部的执法司。次日,人们在 Lok Nayak Bhavan 大楼里发现他的尸体。政府于1992年12月24日向特别报告员通报,经调查并查明了有关官员曾犯有严重的失误,并已对执法司的两名官员提出了采取处理行动的建议。同时,印度最高法院下达了法令,指令德里新增区及地方法官进行调查,并将调查报告直接提交最高法院。目前正在就此问题展开调查。

303. Ram Singh 来自Arra Koder 村,于1992年4月初死于Bohandiguda 警察局。政府于1992年12月28日向特别报告员通报,Ram Singh 先生于1992年4月9日死于其本村,而且其尸体已被其亲属火化,既未事先通报警察,也未通告地区官员。事后,才提出指控称,Ram Singh 是由于遭警察们的虐待而死亡的。由于尸体已被火化无法进行解剖或验查;但是,经调查已初步查明,Koder 警察局的人员具有行为不规的情况。为此,一名副检查员于1992年4月14日被停职。1992年4月21日还另行下达了一项调查令。目前正由地方法官进行调查。

304. Muthusamy Dindiguul 系区 Oddancharam人,因与一偷窃案有牵连于1992年初被捕。后来,他的母亲、妹妹和父亲也先后被捕。据报,他们均遭毒打,结果造成 Muthusamy 死亡。政府于1992年12月29日向特别报告员通报,Chinnan Alias Muthan ,即 Muthusamy 先生是按 Ambilikai 警察局立案的一刑事案件而被捕的。1992年1月8日他患上了胸部疼痛和头晕症。他被立即送入地方医院,而又被转入政府医院,在那被宣布已死亡。为此进行了调查,而后,政府于1992年5月11日下达了一项法令,就五名警方人员玩忽职守案采取了部门行动并采取了些必要的后续行动。

#### 从政府收到的一般性资料

305. 政府于1993年12月9日向特别报告员转呈了对其1993年8月9日信件中所载一般指控的答复资料。根据政府的资料,那些指称治安人员惯常性地无视程序保障措施、被害者极少提交给地方法官、印度《刑法》和《刑事诉讼》所列的禁止条

例和保障条款时常被置之不理,以及治安部队人员从未因此行为而被追究过刑事责任等指控均与事实不符。

306. 为与宪法条款保持一致,有关司法行政的法律守则载有保障生命、自由和享有适当法律程序等各项基本人权详细的保障条款。此外,还有许多其它直接旨在维护公民防止遭受各种侵权行为的法律和立法规定。

307. 对治安人员的起诉将开展调查,并且必将对对应负有责任者采取行动。即便为遏制恐怖主义而通过的各类特殊法律,也并未确定出条款,保证执法和治安人员在实施这些法律所赋予的权利时,可不受任何形式的法律追究,或可不对任何行动诉诸于纪律治裁程序。

308. 仅在查谟和克什米尔邦发生恐怖主义和反叛期间,就对170名军方和警方部队的官员和士兵采取了处分行动,其中包括判处严厉的监禁徒刑;开除军、警职;停职调查以及其它形式的部门惩罚,而这可对受惩罚者的职业前途产生长期性的影响。

309. 除宪法和立法保障条款外,司法机构还竭尽全力地维护这些权利。政府维护治安的行动须受到司法审查。所涉人员可对军事法庭和其它调查得出的结果提出质疑并可在民事法庭上进行详尽的审查。除须由一名警方官员对被拘留期间的死亡进行调查外,还必须实施强制性的地方法官调查。

310. 司法程序向所有各级公众公布,并按例由新闻界进行分析。鉴于新闻界高度的敏锐性,凡重大的问题从未遗漏过。此外,印度的Locus Standi规则比其他国家宽松得多,而且也被认为具有较大的自由度,并使得自愿及非政府组织能充分地支持法院的人权事业。

311. 在旁遮普邦和查谟和克什米尔,印度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重恐怖主义的局面。在此情况下,按照本国一般的刑事法和刑法制度实施司法,已不能产生实效,而且也不够充分了。为了保护人民的人权,不得不制定出特殊的法律。其中,《恐怖主义者和破坏活动(预防)法》是一项临时性的立法,每两年须由议会进行一次审查,而《武装部队(特权)法》则只能临时性地适用于一些被宣布为“动乱”地区的区域。在这类立法中,十分慎重地注意到了根据适当的法律程序保护个人的各项权利。根据印度的司法制度,所有人在任何情况下都可诉诸于人身保护令状。根据《恐怖主义者和破坏活动(预防)法》,被拘留者必须在24小时内提交给地方法官。一旦确定予以拘留,被拘留者则须通过主管法庭下达下的法令,始终置于司法监押之下。

312. 该法的第20(3)节列有明确的规定,规定有关人员必须在24小时将被拘留提交地方法官的刑事诉讼法条例,适用于所有按此法被捕的人员。此外,被拘留者可按现行的一切法律,充分行使与其律师联系的权利,绝不存在任何对法律援助和帮助的限制条款。

313. 特别报告员表示关注的是,有关在督监警衔的警官前作出的供述,能成为可接受的证据的立法,而这种情况将促使利用酷刑的做法,据称,酷刑已成为各警察局、监狱以及拘留营的准军事部队均蓄意采用的做法。《恐怖主义者和破坏活动(预防)法》的第15节已规定,只有警衔不得低于督监级别、担任某一区警察局的局长并已经历了其三分之一职业生涯,级别很高的警官才能被赋予这种权利。由于他们的地位,有理由相信,他们将公正、按照司法条例和不偏不倚地行事。更为重要的是,以任何此类供述为依据的证据,可遭到根据《恐怖主义和破坏活动(防止)法》第15(2)节条款提出的反驳,该条款规定警察官员有责任证明,他们曾经向当事者说明,他可以不作供述,而此种供述有可能用于指控他本人,向他通告他们已经记录下了他的供述,并向他宣读他们录下的供词。同时,条款还规定,每次由此所录的供述,都必须提交地方首席法官,然后,由他把所录的供述转交给指定的法庭。

314. 关于被拘留的妇女易遭强奸一说是毫无根据的,而且也与事实不符。《印度刑事法》已列有,关于强奸被拘留者罪以及对被告事实推定的具体明确规定。强奸被拘留者罪,一旦被查证确凿无疑,可被判处终生监禁。对这些违犯法律的行为,特别是针对那些被受命维护这些权利的人员的违法行为,制定出了具有威慑力的惩罚条例。

315. 政府还于1993年10月28日向特别报告员提供了新设立的全国人权委员会的资料。该委员会除其他职责外,还可就侵犯人权的申诉,自行开展调查,或提出上诉;在此情况下,委员会可对有关人员提出诉讼程序,或采取委员会认为适当的行动,并且,除其他外,也可向有关当局建议,批准向受害者及其亲属提供直接的临时性救济。

### 评述意见

316. 特别报告员确认,印度对法治传统性的尊重,意味着对于酷刑,特别是造成死亡的严重酷刑案件,可采取纪律惩罚行动,有时甚至可诉诸于刑事诉讼程序。如政府就其答复中所述的各项调查,或刑事或纪律惩治程序的结果提供进一步的资料,他将表示感激。至于针对旁遮普邦以及查谟和克什米尔一些官员所采取的行动,

特别报告员也将会感到赞赏地了解,这些行动是参照特别报告员职权范围内的行动,所采取的措施。同时,特别报告员也十分敏感地注意印度政府在这些地区所面临的“恐怖主义的严峻程度”。他的理解是,政府不准备以这些严重的问题来掩盖酷刑做法。特别报告员还期待能收到新设立的人权委员会在处置这一问题方面取得成功的消息。

## 印度尼西亚

### 转交政府的资料和收到的答复

317. 特别报告员在1993年8月26日的信中通知该国政府,据他所收到的资料称,尽管酷刑和虐待被《宪法》立国思想潘查希拉、《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所禁止,但自从1989年中期起,军方和警察当局一贯在亚齐实施这种行为,造成一些人的死亡。据报道,亚齐独立运动的涉嫌支持者及其同事或亲属遭到酷刑,目的是逼取口供或恐吓他们。

318. 据报道,最常用的方法是:用拳头、木棍、铁棒、瓶子、石块和电线殴打头部、胫骨和身体;用沉重的军人皮靴踢打;用点燃的香烟烧烫;电击;用剃刀刀片和刀子在身体上乱划;死亡威胁、假处决和故意用武器击伤;往鼻子里灌水;将人长期泡在臭水中;吊住双脚倒挂起来;将重物压在膝盖上和其他关节上;隔离以及不让睡觉和饮食;残害性器官,性骚扰和强奸。

319. 据报道,几乎在各个层次的军事指挥机构中以及在几十个保安部队的设施中都发生了酷刑和虐待事件。最经常提到的地区是 Pidie、Aceh Utara、Aceh Timur、Aceh Besar 和 Aceh Tengah。有时被拘留者还被转移到北苏门答腊的棉兰的各种军队和警察设施,并在那里遭到酷刑。据这些报告称,由于担心被送交军事监禁并面临着进一步的酷刑,由于政治罪而受到审判的许多人被迫认罪,而且没有提出任何辩护。以下几段中叙述的案件已经转交该国政府。

320. Nasrun Majid 于1990年6月被捕,当时一批大约40名左右的士兵前往他在佩雷拉克 Alue Nirih 的住所搜查他的哥哥--一位涉嫌的亚齐独立运动的活动家。他在司马威 Aceh Utara 地区军事指挥部被关押11天,据报道在此期间,他在被讯问其兄弟的下落时,他的胫骨和头部遭到木棍的殴打。

321. 村长 Ishak bin Ismael 于1992年被保安部队逮捕,并被带往 Baktia 警察所,在那里他被拷打致死。据报道,警察在他的后颈上横放一条粗木梁,然后站上

去或在上面跳动,直到他死亡为止。

322. Ismail bin Gani 系 Pidie 摄政办公室的一位公务人员,他于1992年3月在Paloh村被军事当局逮捕。据报道,他在 Rancong 被单独囚禁在 Kopassus 总部长达2个月,在此期间,他反复遭到殴打。当他的妻子于1992年5月得到允许探访他时,他的手臂和腿已经骨折,必须由士兵搀扶。

323. 所收到的资料还表明,1992年4月,搜寻两位涉嫌的亚齐独立运动成员的士兵至少殴打了帕斯 Tjot Kruet 村的十几位村民。受害者包括3位老人,他们被迫殴打自己的家人,在崎岖不平的地上爬行并凝视着太阳长达几小时。

324. 如同以下两起案件一样,据报道,在该国其他地方,对刑事嫌疑犯也一贯实行酷刑或虐待:

(a) Sofyan Lubis, 16岁的擦鞋的男孩, 被指控偷鞋, 1992年9月死于棉兰 Tanjung Gusta 儿童监狱。据其亲属和律师称,他的尸体上留下了明显的酷刑的痕迹; 他的胃部、胸部和颈部严重受伤,两颗牙齿被打落,嘴里、鼻子里、耳朵里和性器官出血。

(b) Amas H a diansyah 涉嫌到一起武装抢劫案, 于1992年初在万隆被逮捕。据说他由于遭到三位警察的殴打,一只眼睛失明。

325. 特别报告员继续收到关于在东帝汶施行酷刑的资料。据报道,军方和警官拷打或虐待1992年11月及其以后被拘留的一些涉嫌的政府反对派。他还获悉 Agostinho Pereira 的案件,此人于1992年8月在帝力机场被保安部队拘留,因为他们怀疑他是一个赞成独立团体的成员。据报告,他当场受到士兵的殴打,直到他的脸部肿胀和耳朵出血为止。

### 紧急呼吁

326. 特别报告员代表以下所提到的人向该国政府三次发出紧急呼吁,因为他担心他们在拘留期间可能会遭到酷刑。转交呼吁的日期列在有关摘要后面的括弧里。

327. Rui "Los Palos" 是巴厘新阿拉查的一位学生,据报道于1993年5月14日在巴厘连同另外2位大学生一起被军方成员逮捕。(1993年5月27日)。

328. Martinho Rodrigues Pereira, 原东帝汶的一位囚犯,据报道因被怀疑协助住在雅加达的政治上活跃的东帝汶人而于1993年7月5日在雅加达被军方情报人员逮捕。另据报道,另外两人在同样的情况下被逮捕,而且他们都被单独囚禁。(1993年8月27日)

329. 据报道, Fausto da Silva, Vil Lemos, Julio X da Silva, Sebastiao Pedro da Silva, Cristiano Araujo, Augusto Pachao Monteiro, Tinoco, Bento Pereira, Isac da Costa, Francisco da Silva, Benjamin Madeira, Alberto Carvalho, Hermenegildo Carvalho, Tiago de Jesus, Alberto Alves, Virgilio Augusto, Tomas da Costa, Olimpico Castro, Januário de Jesus, José de Jesus, Pedro Patima, Januário alias Aleixo, Casimiro Andrade, Jovito das Dores, Rosalino Pereira, Gustavo Sarmento, Jânio Lobato, Simplicio Madeira, Antonio Baptista, Fernando Tilman, José S. Bento, Lito da Costa, Joaquim Sarmento, Aníbal Magno, Danociano dos Mártires, Jose Manuel, Francisco Atanasio, Octaviano dos Santos, Aleixo de Jesus Tilman, Gelito Freitas da Silva, Ambrósio da Cstas Sarmento, Domingos Dontel Faria, Constâncio manuel Alves, Narcisio Madeira Neves, Leônio Maria das Dores, Eufrásio G. Nieves, Atanasio P. Gaspar, Celestino Morato da Cunha and Claudio Cortinhal. 在美国国会成员1993年9月1日和2日访问东帝汶之前, 连同许多学生被驻扎在东帝汶帝力的印度尼西亚保安部队逮捕。据称, 尽管家属反复提出要求, 但当局仍然没有表明拘留他们的地点。(1993年9月13日)

330. 特别报告员还根据委员会第1993/64号决议代表一位东帝汶人 Gabriella Lopes de Cruz Pinto 的妻子 Constancio Pinto 发出呼吁, 而在这之前他曾于1991年4月29日提请政府注意, 因为根据所收到的指称, 他于1991年1月遭到酷刑。Pinto 先生于1993年3月在人权委员会提出陈述, 并表示担心, 他公开陈述可能会使住在帝力的其妻子和家属的生命遭到危险。根据所收到的资料, Gabriella Lopes 于4月12日被逮捕, 并被带往一个军事情报基地--WISMA SENOPATI II, 讯问其丈夫的活动。讯问以后, 他被释放, 但据报道, 4月13日, 军方情报人员几次找她, 并再次将她带走讯问。这一呼吁于1993年4月21日转交该国政府。

331. 1993年6月16日, 政府答复说, Pinto 先生的妻子从未被逮捕、拘留, 也没有遭到任何骚扰。她仍然住在她的住所里, 甚至连外国记者也可以同她自由接触。印度尼西亚政府绝对没有任何理由拘留象 Pinto 女士这样没有被指控犯有任何违法行为的人。1993年4月, 联合国秘书长私人特使阿莫斯·瓦科先生在东帝汶会见了一些人, 并同他们谈话, 其中包括被拘留者。他同他们私下会谈, 因此他们有机会自由地表达其意见和见解而不必担心。

## 关于特别报告员1991年11月访问该国的报告中载列的建设的后续行动

332. 1992年9月4日,特别报告员致函该国政府,提请它注意关于其前任访问该国的报告中载列的各项建议,并请它就为了执行这些建议而采取的任何步骤提供资料。1993年1月26日,收到了一份答复,其中指出,该国政府在人权领域采取了以下措施:

### (a) 概论

333. 1991年1月21日至22日,与联合国人权事务中心合作,在雅加达举办了一次人权问题全国讲习班,讲习班上概述了加强全国促进和保护人权活动的结构性办法。

334. 讲习班上通过的决定包括建立一个人权问题机构间常设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于1991年2月22日建立,它包括来自各政府机构和部门的代表以及重要的全国非政府组织的成员。另外还设立了三个工作组,其各自主要的任务是处理:印度尼西亚加入国际人权文书的问题;国家人权政策,包括为建立一个全国人权委员会做准备工作;参加国际人权会议。至今为止,该委员会和三个工作组举行了几次会议。同时印度尼西亚人民代表会议也设立了其本身的人权委员会。

335. 在1992年11月2日举行的常设委员会会议上讨论了同人权事务中心建立技术合作的可能性,特别是在训练执法人员、法官和律师方面、传播资料和其他资料方案的可能性。此外还为制定大学一级的人权研究课程和建立人权材料图书馆作出了安排。

336. 该委员会还负责筹备1993年1月26日至28日在雅加达举行的亚太地区人权问题讲习班。

### (b) 具体问题

#### 1. 印度尼西亚法律的发展

337. 在第五个五年发展计划中,印度尼西亚法律的发展是通过一些政策和一些措施展开的,其中包括制订新的规章,提高人民的法律意识、执法、指导司法机构,指导缓刑机制,法律服务、司法人员的教育和训练以及建立管理和监督。

338. 在提高人民法律意识的范围内,就法律指导、法律援助和法律咨询问题展开了直接和间接活动。通过“检察官进入村庄”和“法官进入村庄”等方案、向城市社区提供法律指导、在地方当局各部门设置统一的指导职务以及创建具有法律意识的家庭等方面展开了提供法律指导的活动。此外为了支持平等提供法律援助,从第三个五年发展计划开始,向社区的低收入阶层免费提供了法律援助。

339. 为了提高司法人员的效力和效率,教育和训练活动得到了改进和增加。针对司法机构的各方面,例如技术性执法人员、法官、法院工作人员、法警以及移民和缓刑监督官等,仍然展开了教育和提高认识的活动。另外还展开了训练方案,而检察官参加了教育课程。

## 2. 关于保安机构成员犯下的罪行

340. 对于保安机构成员犯下的罪行,印度尼西亚政府遵循以下方面法律的规定:由民事法庭或军事法庭对违法的保安机构成员提起起诉,或强制实行行政制裁;通过酷刑逼取的资料均属无效(《刑事诉讼法》第117条);按照《刑事诉讼法》第12节和第13节给予受害者以补救和赔偿;受害者有权通过法律援助基金提出上诉;由新闻媒介广泛公布所采取的纪律制裁和所实行的惩罚。

341. 对于警察部队,正在展开一项纪律运动,对每一个成员按照“优”、“良”或“差”评分。其表现被评为差的成员将参加为期1月的重新训练方案,并接受心理测试,以判断他是否容易采取暴力和/或是否适合于携带枪枝。如果重新训练效果差,此人在第一次得到自愿辞职的机会以后,可能会被解除职务。

342. 1993年9月13日,特别报告员再次致函该国政府,除了其他事项以外,提请其注意人权委员会题为“东帝汶的情况”的第1993/97号决议。在其第8段中,委员会再次鼓励印度尼西亚当局采取必要的步骤,以执行酷刑问题特别报告员继访问印度尼西亚和东帝汶之后在其报告中提出的建议,并不断向特别报告员通报执行建议方面所取得的进展。有鉴于此,特别报告员向该国政府提出了以下问题:

- (a) 据该国政府1993年1月26日的函件称,人权问题机构间常设委员会的一项任务是研究印度尼西亚加入国际人权文书的问题。该委员会是否得出了任何结论或在这一方面提出了具体的建议?
- (b) 新的《刑法》的拟订是否已经完成?文本草稿中是否有任何规定确认酷刑是一项刑事罪?如果这样,对此项罪行规定了何种惩罚?
- (c) 是否已采取任何步骤来修正或废除《反颠覆法》?



- (d) 是否已经采取任何步骤以建立一种制度, 由一个独立的当局定期访问包括警察所在在内的所有拘留所?
- (e) 是否有任何独立于保安部队和执法当局的任何当局或机构被授权调查包括酷刑在内的关于侵犯人权行为的指控?
- (f) 是否已经设想任何措施以确保检察官更多地参与刑事调查?
- (g) 是否有可能取得资料以说明被确定在过去两年中实施或纵容酷刑罪的武装部队和警察的成员的人数和身份, 并表明对他们所采取的措施? 他们是受到军事法庭还是受到民事法庭的起诉?
- (h) 是否已经采取任何措施以确保在酷刑下逼取的任何供词在法律诉讼中不作为证据?
- (i) 是否有可能取得资料来说明法院最终在裁决中得出结论说, 某个被拘留者的供词是在酷刑下逼取的? 受害者是否取得任何赔偿?
- (j) 为了确保所有被拘留者能够取得律师的帮助, 是否设想任何长期或短期的措施, 以便增加该国的辩护律师的人数?

343. 特别报告员在同一封信中提到第1993/97号决议第9段, 其中委员会促请印度尼西亚政府邀请酷刑问题特别报告员访问东帝汶, 并对他履行职责提供便利。

####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 转交政府的资料

344. 特别报告员在1993年10月18日的信中提请该国政府注意住在法国的一位政治避难者 Ali-Akbar Ghorbani(别名 Mansour Amini)的案件, 据说他于1992年6月4日在土耳其被伊朗政府的特工人员绑架。他的尸体于1992年6月29日在伊斯坦布尔郊外被人发现。根据所收到的报告, 他在被杀害之前遭到严重的酷刑; 他的身体一部分被切割成碎片, 他的睾丸被割除, 他的指甲被拔掉, 他被电线勒死。

345. 特别报告员还通知该国政府, 根据他所收到的报告, 拷打由于政治原因而被关押的犯人的现象在全国各地仍然很普遍, 目的是取得情报或逼取供词。酷刑方法包括用粗电线鞭打犯人, 电击, 假处决(绞刑)和用香烟烧烫。特别报告员还对在该国似乎很普遍的截肢和鞭笞等体罚现象表示关注。

346. 特别报告员在同一封信中提请该国政府注意1992年转交的一些案件至今没有收到任何答复。

### 紧急呼吁

347. 特别报告员于1993年11月15日就据称是一个称为“Komala”的非法库尔德政治组织的成员Ghobad Veysi、Ali Soleimani、Jalal Mohammad-Rezaie、Abbas Feyzi和Moussa Maleki向该国政府发出紧急呼吁。根据这些报告,他们是大约于1993年10月21日在萨南达杰附近被伊朗军队成员逮捕的,并据认为,他们被单独囚禁在这一城市。有人担心,他们可能遭到酷刑。

### 伊拉克

#### 转交政府的资料

348. 特别报告员在1993年11月10日的信中通知该国政府,他所收到的报告中载有据称由于酷刑而在拘留期间死亡的以下人的姓名:

- (a) 来自Al - Musharah的Al-Sa'eed Al-Derbash于1993年6月死于Al-Radhwania监狱;
- (b) 来自Al-Kahia 的 Mohammad Salih于1993年3月死于Al-Radhwania监狱;
- (c) 阿马拉Al-Majediah的Jaffar Lafta Al-A'lwai; 他的尸体于1993年7月7日转交给其亲属;
- (d) Attisla Ahmet Nimet 是于1992年9月被警察逮捕并随后处决的9位土库曼人之一。据称他的尸体上留下了酷刑的痕迹(一只眼睛被挖掉),于1993年7月15日转交给其亲属。

#### 从该国政府收到的关于前几份报告中载列的案件的资料

349. 1992年12月11日,该国政府对于1992年12月3日就据称1992年9月和10月在伊拉克南部,特别是在Misan省发生的大规模逮捕事件转交的紧急呼吁做出了答复。

350. 据政府称,特别报告员收到的关于伊拉克当局命令伊拉克南部沼泽地区当地居民从该地区疏散的指称是捏造的,是毫无根据的。在这一方面应该参阅外交部长1992年8月6日致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信中提供了详细的情况,并驳斥了在这一方

面提出的所有指控。有人指称,军队于9月份在巴士拉省al-Mudaina附近的al-Salem村发动地面袭击并实施任意逮捕和酷刑,一些人在Misan省遭到拘留,而其他则被拘留在阿马拉镇第四军军部,而且其中有些人被强制转移到巴格达,这种说法同样完全是不准确的,是有偏向的,是由众所周知敌视伊拉克的具有政治动机的团体散播的。伊拉克南部沼泽地区的所有伊拉克公民如同其他居民一样受到保护和照料。所收到的指控并不是新的指控,而是伊朗政权对伊拉克和伊拉克人民发起的一种攻势,试图掩盖伊朗正在追随的干涉内部事务的政策。

#### 政府提交的与委员会第1993/48号决议有关的资料

351. 按照委员会第1993/48号决议,伊拉克政府于1993年7月29日发出一份普通照会,其中报告了据称北部的库尔德武装团体和据报告同该国南部的“伊拉克逃犯和逃兵”勾结的伊朗武装团体实施的暴力和恐怖主义行为。据报道,在北部,特别是在政府在起义后从该地区撤出以后,库尔德武装团体控制了经济、公民和公共机构,没收了其设备。根据这种资料,他们还没收了水坝上的机器,从而使灌溉项目陷于瘫痪,使居民陷于苦难之中,并阻碍了他们的迁移。据报道,恐怖主义活动包括引爆汽车炸弹和扔手榴弹。关于南部的情况,该国政府称,武装团体杀害了许多官员和平民,摧毁和掠夺了经济和公民机构以及粮食仓库,并在该国发行假纸币。

#### 以色列

#### 转交政府的资料

352. 特别报告员在1993年8月26日的信中通知该国政府,根据它所收到的资料,在军事审讯中心仍然持续存在酷刑的做法。酷刑方法包括严厉殴打、给犯人带上头罩、长期带手铐、用令人痛苦的姿式捆绑犯人、监禁在窄小和无空气的空间、施以电击、剥夺睡眠、让他们处于极端的温度下以及长期单独监禁。

353. 另一种普遍的抱怨是缺乏医疗设施。需要身心保健治疗的被拘留者往往被剥夺看医生的机会或不得接收药品。此外据称,以色列医生和其他医疗人员参与证明被拘留者应该接受以色列当局采用的一些审讯方法;参与在允许受害者重新接受审讯之前审查和向他们提供治疗;参与掩盖审讯者的虐待行为。有人报告了以下个别案件:

- (a) Samir Omar, 加沙地带al-Shati难民营的一位17岁的少年,于1992年5月31日死亡。他于5月13日被逮捕,被拘留在加沙中心监狱审讯科,直到5月21日为止。据报道在获得释放以后,他说,审讯时,他被带上头罩,被关押在非常冷的牢房中,被剥夺饮食,并被迫坐在椅子上长达4天之久。他还说,他全身遭到殴打,包括其生殖器,他的头部遭到铁锤的敲击。
- (b) Mustafa Mahmud Mustafa' Abd al-Hadi Barakat, 西岸阿纳卜塔村的一位居民,在1992年8月3日被捕以后大约36小时之后于8月4日死于图勒卡尔姆拘留中心。据报道,他由于拘留和审讯的条件,特别是被带上头罩以后所引起的气喘病发作而死亡。据称,他遭到严重的虐待,从而导致在8年中气喘病第一次发作。
- (c) Ayman S a' id Hasan Nassar 是于1993年3月20日在加沙德尔巴拉难民营的一次军事行动中被逮捕的。据报道,他和另外三人被带往附近的海滩,据称他们的脸部和胸部遭到踢打和殴打。此后他们被带往阿什克伦监狱,据报道他们在那里被单独监禁,进一步遭到殴打,长期被带上手铐脚镣,头上套上肮脏的口袋,不得睡觉,并连续几天不得使用厕所。3月23日,Ayman Nassar 由于严重的呼吸综合症而被送入Barzalai 医院的重病房,但死于4月2日。
- (d) 来自巴拉塔难民营的Husniyeh Abdel Oader 于1992年4月9日被逮捕。她被拘留在Kishon拘留中心,并被单独监禁,在拘留的前四天里,她的手臂被铐在背后,头部被套上肮脏的口袋。她于1992年9月14日获得释放。
- (e) 来自图勒卡尔姆区阿纳卜塔的Hassan Badr' Abdallah Zubeidi 于1992年9月25日被逮捕,他被拘留在图勒卡尔姆和法拉监狱长达33天。Zubeidi先生在被捕以前身体状况良好,但据说获得释放以后患有“严重紧张症”,这是对外界完全没有反应或联系的精神失常症。
- (f) 来自Nusseirat难民营的Youssef Farahat 于1992年1月24日被逮捕,并被带往加沙中心监狱。据报道他受到酷刑,特别是他被关押在称为“冰箱”的一个牢房里(一个很小和乌黑的牢房,从房顶上的一个开口送入冷气),每天长达10至15小时。
- (g) Ghazi Abdul Rahim Omar, Algason村的居民,于1992年9月25日被逮捕,并被带往图勒卡尔姆拘留中心。11月3日他的亲属被告知,Ghazi

Omar 由于肾病而在 Ha' emek 医院住院,看来这是严重殴打造成的。

(h) Nader Raji Qumsieh 于1993年5月3日和4日在西岸贝特萨胡尔其家中被逮捕,并被带往伯利恒的一个军事拘留中心。他一直被单独监禁到5月6日为止,据报道,随后他被转到扎赫里亚拘留中心接受审讯。审讯时,他的阴囊遭到损害,他的医疗记录可以表明这一点。一份医疗报告声称, Nader Qumsieh 说,他从楼梯上摔下来,而他本人反复表明,他是在扎赫里亚由于遭到酷刑而受伤的。

354. 特别报告员在同一封信中提请该国政府注意对于1992年转交的一些案件至今尚未收到任何答复。

### 紧急呼吁

355. 特别报告员代表拉马拉附近的 Mazari 'al-Nubani 村的一位巴勒斯坦人 Muhammad Ya' qub' Abd al-Wader al-Nubani 于1993年7月16日向该国政府发出紧急呼吁,据报道,此人于1993年4月22日在比尔泽特镇被以色列部队逮捕,并被带往拉马拉监狱。1993年6月9日,据说他在一次宣誓口供中表示,他被长期套上头罩,绑住手脚,以令人痛苦的姿势被绑在一个低矮的椅子上,并被剥夺睡眠。特别报告员表示担心,他可能继续受到这种待遇。

### 从政府收到的关于前几份报告中所列各项案件的资料

356. 1993年1月20日,该国政府转交了关于 I' taf Daoud Hussein I' Elian 案件的资料,根据特别报告员所收到的资料,此人在特勒蒙德中心监狱被关押在一个隔离牢房中,长达3年半之久,并被剥夺医疗护理。政府表示,在 I' Elian 女士在监狱服刑处被拘留的整个期间没有对她试行任何体罚或酷刑。I' Elian 女士是称为伊斯兰战组织的一个恐怖主义组织的一位成员,她拒绝遵守关于监狱犯人行为的条例和规章。然而关于她被单独监禁长达3年半之久或任何类似延长的期限的报告是没有任何根据的。在一次定期医疗检查中,监狱医生诊断她患有鼻隔膜偏离,并建议近期内在一个适当的医院里动一次手术(I' Elian 女士大约在两年前曾经动过一次鼻科手段)。I' Elian 女士曾一度宣布绝食。然而在这种情况下通常展开的日常医疗检查表明,她的同狱犯人私下给她喂食。此时该犯人结束了“绝食”。

357. 关于医疗道德守则,该国政府援引了以色列医疗协会分发的报告(1992年9

月13日第29962号):

- (a)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代表定期查访监狱,没有人提出任何具体的上诉;
- (b) 10个监狱犯人(其中包括I'Elia女士)同意由以色列医疗协会的医生成员进行检查(监狱的医疗队不在场)。就I'Elia女士而言,除了隔膜偏离以外,没有任何其他医疗诊断。
- (c) 以色列医疗协会还在其报告中提到监狱中普遍的一般条件:犯人的住宿条件是每间牢房六张床位;食物与以色列国防军中女兵的供应相同;每间房间都配有一架电视机。监狱还有一个图书馆,向希望为学术考试作准备的那些犯人提供阅读材料以及研究材料。

## 意 见

358. 特别报告员指出,在过去两年中,该国政府迄今仅仅答复了一起案件,即对此发出紧急呼吁的那期案件。特别报告员意识到保安部队在长期占领期间面临的困难。他希望最近的政治发展动态将对局势产生实际的影响。然而他表示关注的是,许多人报告往往相当于酷刑的虐待现象以及有人指控医护人员卷入到有些程序中,要求他们证明犯人应该受到施行这种虐待的审讯。

## 意大利

### 转交政府的资料

359. 特别报告员在1993年10月29日的信中通知该国政府,他所收到的资料表明,在执法人员和监狱看守人员的监护下被关押的人有时候遭到酷刑和虐待。据称最常见的形式是反复拳打脚踢以及用警棍长时间殴打,有时候涉及到许多犯人。据报道,特别是在1992年期间和1993年前几个月中,这种性质的事件发生在以下地方:阿西纳拉监狱、Buoncammino 监狱(撒丁,卡利亚里)、Canto Mombello监狱(布雷西亚)、Gazzi 监狱(西西里,墨西拿)、帕多瓦地区监狱、皮亚诺扎岛监狱、Poggioreale 监狱(那不勒斯)、Regina Coeli 监狱(罗马)和Secondigliano 监狱(那不勒斯)。以下几段叙述的个别案件已经转交该国政府。

360. 原吸毒者Ciro Esposito和一位朋友于1992年6月25日在那不勒斯中部驾驶一辆小型摩托车时被警察拦住,他们被指控盗窃车辆。他们被逮捕并被带往那不

勒斯Marianella警察局,在下午4点半至下午9点半他们获得释放这一段时间内,据报道6位警察使用棒棍殴打他们,包括使用铁棍。6月26日早上,据报道,Ciro Esposito在那不勒斯Cardarelli医院求医治疗其伤口。该医院签发的医疗证明显然提到其左腕上的伤口和各种擦伤的伤口,需要10天才能治愈。另外据称,Marianella警察所所长以及据说参加指称的虐待行为的一个法警前往Ciro Esposito的住所,叫他不要对自己的遭遇提起正式起诉。

361. 海洛因吸毒者Carmelo La Rosa于1992年6月24日在西西里墨西拿上诉法院出庭,由法院审理他对在Gazzi监狱服刑提出的上诉。据报道,审理时,他告诉法院,他面临着严重的戒毒的危机,每次这种危机之后,监狱看守人员都用警棍殴打他。据报道,法院承认,他的胸部和肩部上留下了钝器严重殴打的明显迹象,因此命令将他的陈述立即转交检察官。6月24日至25日晚上,Carmeol La Rosa被发现死亡,他的颈部被一根裤带吊在其牢房的窗铁栏杆上。

362. Biagio Mazzara是帕多瓦地区监狱的一位犯人,据报道,1992年10月他在同一位看守人员争吵之后在监狱诊所外面遭到殴打。据报道,他的律师提出了一项正式上诉,其中指称,Biagio Mazzara遭到拳打脚踢和皮带扣的抽打,而且看守人员将点燃的香烟按在他的前额上直到熄灭为止。据报道,法医检查的结果符合上诉指控。

## 约 旦

### 转交政府的资料和所收到的答复

363. 特别报告员在1993年8月26日的信中通知该国政府,他所收到的资料报告说,Husayn al-Jidi、Fu'ad Shrifat、Basel al-Zaghlul和Sulayman al-Zuyud由于被指控参加约旦的非法解放党和参与暗杀约旦哈桑国王的阴谋而于1993年4月20日被逮捕。据报道,他们首先被带往阿曼的总情报部;然而据说保安当局首先否认拘留过他们。据称,他们所有人都不得接触律师,8月中旬当他们被关押在扎尔卡军事监狱候审时,才允许家属探访。家属在这些探访以后报告说,被拘留者在总情报部被关押期间遭到酷刑,而且他们身上仍然带有殴打的痕迹。

364. 该国政府在1993年9月8日的信中强烈否认上诉指控,并指出被拘留者得到正当法律程序的全面保护,包括根据宪法保障的司法程序和标准得到法律咨询和辩护。这些案件仍然在司法调查中,审判预定于1993年9月9日举行。审判将向报界和公众开放,包括被拘留者的亲属。

365. 鉴于政府作出的答复,有关人士告诉特别报告员,10月,所有被拘留者都收回了自己在法庭上的供词,声称这是在酷刑下逼取的供词。他们说,他们在阿曼的总情报部总部拘留中心拘留时,他们遭到酷刑,其方法包括打脚板和威胁拖以强奸。其中一人是Husayn al-Jidi,他的左眉受伤需要缝合,他本人说这是殴打所致,而检察官表示,这是他试图自杀头撞在牢房墙上所造成的。有关人士还报告说,法院不允许被拘留者按照其辩护律师所要求的那样接受自己所选择的医生的检查,而只能接受通过卫生部选择的医生的检查。直到9月底才进行这些检查,其结果正在讨论。

## 肯尼亚

### 紧急呼吁

366. 1993年12月6日,特别报告员就Geoffrey Kuria Kariuki的健康状况向该国政府发出紧急呼吁,此人是在1993年11月6日在纳库鲁的一次警察行动中被逮捕的,并被带往纳库鲁监狱。根据这些报告,尽管一个法庭于1993年11月16日命令将他送往医院,而他严重的伤寒没有得到医疗。

### 从政府收到的关于前几份报告中所列案件的资料

367. 1992年11月12日,特别报告员就Wangari Maathai和其他女绝食者据称于1992年3月遭到殴打的问题致函该国政府。1993年3月31日,该国政府答复说,关于据称的殴打事件的情况有很大的出入,而且是一种虚假的情报。当这些人首先决定在Uhuru公园扎营时,政府急于同他们保持联系,以便对他们的不满情绪寻求一种解决办法。为此总检察长于1992年2月28日同他们举行了一次会议,并答应调查他们的上诉。

368. 尽管反对派向政府保证,他们的抗议是非暴力的,但他们开始在母亲绝食的地方举行未经批准的公共集会,并在该地区附近进行非法的游行和示威。此外不久以后,绝食地点附近的一些人开始向过路的开车人扔石头,并阻碍交通。鉴于这些活动,政府指示警察开进去恢复法律和秩序。正是为了这一目标,警察将绝食的母亲和绝食现场及其附近的人转移到其他地方。在这一行动过程中,控制这一运动的有些人向警察和公众扔石头。对于这种事变,警察以适当的武力加以回击。鉴于Uhuru公园的情况,举行绝食的母亲转移到附近大教堂,继续绝食。鉴于政府为了解决他们



的不满而采取了步骤,绝食于1992年底取消。

369. 该国政府在1993年4月1日的信中补充答复说,Wangari Mathai 和据称遭到殴打的其他绝食的母亲都没有向当局提出正式的上诉,因此无法对这一问题进行任何调查。

### 马拉维

#### 转交政府的资料

370. 特别报告员在1993年6月9日的信中通告该国政府,他收到了关于据称于1992年发生的争取多党制运动的支持者遭到逮捕和短期监禁的报告。称报道,被捕者监禁的条件极为恶劣。称报道,他们被带往主要监狱--布兰太尔的Chichiri和利隆圭的Maula,这是该国条件最差和最拥挤的监狱。囚犯被迫挤在一起站着过夜,因为甚至连他们坐下的空间也没有。据称许多被捕者遭到严重殴打、电击和性虐待。

371. 另据报道,《马拉维刑法》规定殴打和酷刑为犯罪,而《马拉维民法》规定为非法行为,受害者有权对损害提起起诉。然而据了解,没有任何人对殴打或酷刑提起起诉或民事诉讼。有人报告了以下个别案件:

- (a) Sophia Nkosana于1992年4月17日左右被捕,被关押5天左右,然后获得释放,而没有受到指控。据报道,她在Lilongwe警察总部被监禁时,衣服被剥光,遭到殴打,遭到赶牛刺棒的抽打,并被关在一间充满粪便臭气冲天的牢房里。
- (b) 学生会领导人Samuel Mkandawire 和Kenneth Govati于1992年3月17日在Blantyre被逮捕。他们由于示威而连同大约75位学生一起在科技学校被警察逮捕,随后被带往Chichiri监狱和Chilomoni 和Ndirande的警察所,然后遭到殴打。另外据称,Samuel Mkandawire和Kenneth Govati遭到酷刑,他们的生殖器受到挤压。
- (c) Chakufwa Chihana 是南部非洲工会协调整理事会的秘书长,他于1992年4月6日被捕,并被带往松巴的防被措施最严格的监狱--Mikuyu监狱。他被关在一个只有其身体大小的极小的牢房里,而且窗户故意被封死。头天晚上,看守人员将一只野猫放进他的牢房,他被戴上脚镣将近一个月。

## 马来西亚

### 转交政府的关于前几份报告中所列案件的资料

372. 1991年11月12日,特别报告员就Aaron Cohen Shelton向该国政府发出紧急呼吁,据报道,此人于1991年9月被判处终身监禁,并按照《马来西亚危险毒品法》被鞭打6次。

373. 1993年8月5日,该国政府答复说,鞭打的判决已于1991年12月12日执行。鞭打是自1975年起根据上述法令执行的。这不应该视为一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行为,而是根据对社会和国家犯罪的严重程度执行的。Aaron Cohen Shelton 被指控拥有海洛因,并按照马来西亚法律制度规定的正当法律程序被判定有罪。他有充分的机会得到公平和公正的审理。这一判决是符合由本国人民自由选举产生的议会所通过的法律的。

374. 1992年8月21日,特别报告员代表43位亚齐寻求庇护者向该国政府发出紧急呼吁,这些人占领了吉隆坡的难民署大楼,因为他们受到威胁,他们将被强行送回印度尼西亚。他们表示担心,如果他们被送回,他们就会在到达以后被拘留并受到酷刑。

375. 1993年8月5日,该国政府答复说,自1991年6月起,总共为290人的几批亚齐人在马来西亚海岸登陆,要求政治庇护和难民地位。根据关于外国人非法入境的马来西亚法律,他们被拘留在各个移民拘留中心里。到1993年8月为止,被拘留者中有162人获得释放,并自愿返回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政府从未强迫他们返回其本国。至于其他人,正在作出安排将他们释放。在他们由于非法入境而在马来西亚被拘留的整个期间,这些亚齐人得到所有必要的设施,包括适当的食物、住房和医疗。他们从未被否认或被剥夺其基本权利。

376. 至于占领吉隆坡难民署大楼的44人,有关当局正在进行磋商,以便按照关于国内外国工人的有关法律向希望离开难民营的人提供在马来西亚临时工作的机会。马来西亚政府无意将他们强行送回印度尼西亚。尽管他们被视为非法移民,但在这么长的几个月里,他们仍然能够留在难民署大楼里,这一事实显然表明,他们从未面临违背其意愿被强制送回印度尼西亚的危险。

## 毛里塔尼亚

### 从政府收到的关于前几份报告中所列案件的资料

377. 1992年9月28日,特别报告员就据报告在姆巴涅省Sory-Male村发生的酷刑事件据称造成Din Hamath Atouman死亡一事向该国政府发出紧急呼吁。

378. 1992年12月24日, 该国政府通知特别报告员,1992年8月22日晚上,在Sorimale 经营的一位商人被严重打伤, 几小时以后死亡。 经过调查, 逮捕了Sarr Amadou Mamadou (又名Allassane)、 diop Ismaila、 Niass Yaya 和 M' bodj Hamidou。他们被送交政府检察官,并被转到阿莱格监狱候审。他们可以会见其律师、医生和亲属。

379. 被告所作的供词并不是在酷刑下逼取的,政府检察官办公室的调查和审判将完全遵守法制国家所适用的通常规则。

380. Dia Hamath Atouman 死于自然原因,与上述案件完全无关。他从未受到调查官员的审讯。从未有人为他提出任何上诉,如果有人提出上述,将依法展开正式的调查。

## 墨西哥

### 转交政府的资料和收到的答复

381. 特别报告员在1993年8月26日的信中通知该国政府,根据他所收到的报告,在刑事调查的初步阶段,司法警察仍然施以酷刑和虐待,以此来逼取被拘留者的口供。然而这些口供继续作为证据得到多数法院的认可。最常用的方法是殴打、将碳酸水灌入鼻孔、在头上套上塑料袋使之窒息,或将头浸入水中、施以电击和死亡威胁。

382. 根据所收到的资料,由于肇事者很少受到起诉,因此助长了酷刑和虐待的作法。即使全国人权委员会有时提出建议,但这种建议被置之不理,有关人员仍然逍遥法外。即使政府当局有时承认存在酷刑的现象,受害者也很少得到赔偿。

383. 特别报告员还被告知,有人提出法案草案以修正宪法的各种条款,例如要求将防范性拘留期从目前生效的24小时延长到72小时。据这些人士称,这一改革将

阻碍对被拘留者权利的保护,并将助长酷刑和虐待的做法。以下几段中提到的个别案件已经转交该国政府。

384. Rubén Medina Rubio于1989年11月23日在哈拉帕镇被逮捕,并被带往设墨西哥城Médico Militar街的联邦地区司法警察大楼。据报道,在他被捕时和移送途中,他由于拒绝供认参与绑架和杀人案件而遭到严重殴打。另外被逮捕的还有Angel Chávez Sánchez,医生证明和照片表明他受到酷刑,据报道,他把Medina先生牵连到他受到指控的罪行中。据报道,Chavez先生在联邦地区第八刑事法庭上撤回了其供词。根据所收到的资料,Chávez先生原来的供词是Medina先生被判处37年监禁所依据的唯一证据。

385. Manuel Manríquez San Agustín是伊达尔戈州Tutotepec,Rancheria Piedra Blanca Otomí土著社区的成员,他于1990年6月2日在墨西哥城被联邦地区司法警察逮捕,而没有向他出示逮捕证。据报道,在他被单独监禁的四天里,他遭到严重殴打、窒息和电击。最后他被迫签署一份西班牙文写的供词,而实际上他并不懂这一语言。

386. Pablo María Jonathan Molinet Aguilar是一位18岁的学生,他于1992年3月24日在瓜纳华托州萨拉曼卡被州司法警察成员逮捕。据报道,他遭到严重殴打、受到威胁死亡,并被迫签署一份空白的供认书。尽管这样,政府检察官办公室还正式指控他犯有谋杀罪。鉴于这些情况,他于1992年3月向全国人权委员会提出上诉,而该委员会在一年以后提出一项建议,吁请瓜纳华托州当局对关于Molinet先生遭到非法拘留和酷刑的指标进行调查。

387. 特别报告员还获悉,1993年3月29日在恰帕斯州圣克里斯托瓦尔-德拉斯卡萨斯市 San Isidro el Ocotal 镇发生了一起事件,Tzotzil土著社区的13位成员被军队成员逮捕,并被指控谋杀两位士兵。根据所收到的资料,以上提到的土著社区的成员在酷刑下而且在没有翻译的情况下被迫供认他们参与了指控他们的行为。尽管两天以后他们获得了释放,但他们所有人身上都有遭到酷刑的痕迹,而且似乎没有任何肇事者受到起诉,而受害者也没有得到赔偿。

388. 1993年10月11日,该国政府向特别报告员送交了一份全国人权委员会1993年5月12日就以上案件提出的建议的付本,其中证实了上述Tzotzil社区成员遭到司法警察人员的任意拘留和虐待的事实。因此委员会建议对后者提起法律诉讼。

## 紧急呼吁

389. 特别报告员于1993年5月4日代表 Luis Alfonso Luz Flores和 José Martín Escarcega Solís 向该国政府发出紧急呼吁,据报道他们自1993年4月22日起一直被单独监禁在墨西哥城南部候审监狱处理区。他表示担心,他们可能遭到酷刑。

390. 1993年7月26日,该国政府通知特别报告员,南部候审监狱的一位犯人 Luis Alfonso Luz Flores 根据其刑事记录被定性为具有言行好斗、自我控制能力差、犯罪倾向强烈、社会适应能力差和反社会倾向严重的迹象的惯犯。至于 José Martín Escarcega Solís, 该政府指出,他与 Luis Alfonso Luz Flores 关在同一牢房中,他于1991年由于抢劫罪被判处6年监禁。1993年4月25日,没收了这两位犯人的284个“Roche 2”的烟泡,而他们承认这些烟泡是他们的。因此他们被带往特别处理区,1993年5月6日向总检察长办公室提出了上诉。随信附上的1993年4月25日的医生证明表明, Escárcege Solís 身上没有最近受伤的痕迹,而 Luz Flores 在左肩上有轻微的伤疤。

391. 特别报告员于1993年5月19日就 Olga Torres Hernández、Roberto Palacios Sánchez、Manuel Escalante Magos、Alicia Enriqueta Altamirano Jacinto、Froylan Martínez Chagoya、Cirilo Hernández Rubio 和 Juan González Hernández 向该国政府转交了紧急呼吁。据报告,他们是于1993年5月16日在墨西哥城支持 Reclusorio Preventivo Norte 的犯人的绝食时被逮捕的。特别报告员表示担心,他们在单独监禁期间可能遭到酷刑。

392. 对于这一案件,该国政府通知特别报告员,1993年5月17日,大约30人来到全国人权委员会办公室,表示他们关注的是,一批公民显然被公路和道路安全总秘书处的工作人员驱逐出他们正在举行示威和绝食所在的地方,他们的下落不明。随后公路和道路安全秘书长通知全国委员会,当天下午 Torres Hernández先生、Palacio Sánchez先生、Escalante Magos先生和 Altamirano Jacinto 先生获得释放,他们曾被带往库奥特莫克警察所,因为他们犯下了行政罪。这一情况于1993年5月18日得到了原告的证实。后者还于1993年6月3日告诉全国委员会,绝食的问题已经在两周前得到解决。

393. 政府还通知特别报告员,在会见在确定其亲属和朋友的下落方面寻求全国人权委员会协助的公民时证实,他们同全国委员会联系,并不是为了提出上诉,而是要求得到紧急协助。他们被告知,如果他们希望就侵犯人权行为提出上诉,他们应

该提出具体事实,并表明他们希望应该调查这些事实。这些公民说,如果他们决定提出上诉,他们将在以后提出。至今他们尚未这样做。

## 意见

394. 特别报告员注意到反对酷刑委员会在根据《禁止酷刑和其它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审议了墨西哥的定期报告后提出的结论和建议(A/48/44,第226-229段)。他还赞赏地注意到全国人权委员会似乎认真地审议了它所收到的上诉。特别是考虑到反对酷刑委员会对受到惩处的施行酷刑者的人数很少表示的关注,特别报告员如果能够获悉全国人权委员会建议展开正式调查和/或法律起诉的案件中已经采取何种正式行动,将不胜感谢。

### 摩洛哥

#### 从政府收到的关于前几份报告中所列案件的资料

395. 1993年3月5日,该国政府转交了关于Driss Touati案件的资料,据报道,此人于1991年4月被带往Rachidiya警察所几小时以后死亡。根据答复,有证据表明Touati先生参与了严重盗窃的法定罪行,于1991年4月18日被捕,由刑事调查官员审讯。他与1991年4月19日自杀。

396. 在调查他的死亡情况时,拉希迪亚的检察官查验过他的尸体,而且该镇的Moulay Ali al-Sharif医院的医官也查验过尸体。除了调查以外,检察官还命令解剖尸体,证明这属于自杀,而没有任何暴力的迹象。检察官决定由拉希迪亚地区医官和两位医生组成的一个委员会进行第二次尸体解剖。解剖结果符合第一次解剖报告。根据调查结果并考虑到没有任何刑事证据证明死亡是谋杀所致,对身份不明的人提出了控诉,这一问题付诸调查。

397. 同一天,该国政府还对据称于1989年12月31日在丹吉尔被国家保安警察严重殴打的西班牙国民Samir Alsadi Jassin案件作出了答复。根据答复,司法部的官员同丹吉尔上诉法院的检察官和监狱局进行了联系,查寻此人的档案、对他作出的判决和关于他是否关在摩洛哥监狱的资料。尽管展开了这些努力,但没有发现任何人具有同样的姓名。

398. 该国政府还通知特别报告员,公诉局经依法授权监督被警察拘禁的人的

案件,并对警察所进行视察访问,以便会见被拘禁者,并查清拘留他们的原因及其拘留期和条件。检察官就这些访问期间其意见向司法部每月提交报告。司法部的作用是防止和惩除可能妨碍个人或团体的自由或财产的任何任意或虐待行为。由于负责调查、起诉和判决的各个当局之间的协调和合作,在人权文书确定的国家立法和原则范围内取得了理想的效果。向法院提交的关于警官或地方当局的任意行为的案件显然表明了这一点。

## 緬甸

### 转交政府的资料

399. 特别报告员在1993年11月3日的信中通知该国政府,根据他所收到的资料,由于政治原因被逮捕的人在拘留的初步阶段,特别在审讯期间经常遭到酷刑和虐待。然而另外据说,如果犯人抗议似乎极差的拘留条件,就遭到殴打并被剥夺食物和水。据报道,永盛监狱的一位囚犯--38岁的Aye Lwin先生在遭到监狱官员的严重殴打以后由于体内受伤而于1992年12月初死亡。尽管他吐血,但他没有得到医疗,因此死在牢房中。另据报道。他在1990年在永盛监狱绝食期间遭到严厉殴打,此后他的身体状况恶化。

400. 特别报告员还获悉孟邦丹漂扎耶镇区Win pa Toke村的Milttaw案件。据报道,她前往探望由于同新孟邦党接触而被国家法律和秩序恢复委员会第31步兵营的成员逮捕的其丈夫Nai Sein Aung Kyi。据称,她到达以后,她被当作其丈夫的面遭到反复强奸,她丈夫遭到严重殴打,因此其左手骨折。

401. 另外根据所收到的资料,被军队任意抓来的搬运工和无报酬的劳工往往遭到虐待或酷刑,并被剥夺足够的食物和治疗,尽管他们由于工作条件恶劣而经常生病。据报道,24岁的Maung Nyan Pwa及其父亲U Aung Thein于1993年1月10日在高加力镇区Jine河流中间的Zabu Aye船上连同大约一百人被第97步兵营的成员逮捕。他们被带往巴安第201轻步兵营的基地,随后被转送到兰贝的第210轻步兵营的基地。据称,他们从兰贝开始被迫肩挑箩筐,每个箩筐重50公斤。据报道,当他们挑不动时,就遭到殴打,并不给任何食物,以此作为一种惩罚。据称Maung Nyan遭到竹条的抽打,他的右眼球被打碎,右眼睑被打裂。他的父亲被枪托殴打致死。

### 从政府收到的关于前几份报告中所列案件的资料

402. 1992年8月12日,特别报告员就据报道于1992年6月8日被捕后在Mi-7拘留中心连续几天遭到审讯的Maung Nay Yein Kyaw、Maung Tun Tun、Maung Naing Naing、Maung Soe Naing、U Tin Tun、U Tun Shein and U Swe Tint向该国政府发出紧急呼吁。

403. 1993年2月22日,该国政府答复说,Nay Yein Kyaw、Tun Tun、Naing Naing、Soe Naing、Tin Tun and Tun Sein(Shein)由于散发煽动性小册子试图扰乱全国代表大会而于1992年9月23日被判处十年监禁。对于所指称的一个称为“Swe Tint”的人遭到逮捕一事没有任何记载。

### 尼泊尔

#### 转交政府的资料和收到的答复

404. 特别报告员在1993年8月26日的信中通知该国政府,根据他所收到的资料,自1989年起,该国的人权情况出现了一些积极的发展动态。这些动态包括1990年颁布了禁止酷刑和规定对酷刑受害者给予赔偿的新宪法以及尼泊尔加入《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尽管出现了这些积极的变化,但据报告,政治拘禁中仍然采用酷刑,或者是为了逼取情报或供词,或者是为了惩罚由于政治原因而被关押的犯人。此外,据称没有采取任何官方行动以确保独立和不偏倚的调查或惩办应负责任者。以下几段中叙述的个别案件已经转交该国政府。

405. Chaitu Lama是尼泊尔共产党的一位支持者,他由于涉嫌一起谋杀事件而于1992年10月26日在辛杜利区Bhiman村被逮捕。据报道,他首先在他家里被执政的尼泊尔大会党成员殴打,他们把他绑起来拖到警察所。据称在警察拘禁期间,他由于拒绝签署一份关于谋杀的供认书而连续两天遭到殴打。

406. 1993年11月23日,该国政府答复说,1992年10月27日,辛杜利区Bhirman村和Hardiya村的村民之间暴发了殴斗,两人被打死,其他人受伤。警察进行了调查并向地区法院提交案件,而地区法院命令拘留6人,其中包括Lama先生。此后上诉法院批准了拘留Lama先生并释放了其他5人。他们所有人都在10月27日的事件中受伤。无法证实他们是否在拘留期间遭到酷刑。

407. Tul Bahadur Sarki是在与Chaitu Lama同样的情况下被警察逮捕的。据



报道,在警察所里,他的手臂、小腿部和脚底遭到棍棒的抽打,在他倒挂时也遭到抽打。另外,据说,当他拒绝在一份关于他目击Chaitu Lama和其他人实施谋杀的供述上签字时,他受到死亡威胁。

408. 61岁的Purna Bahadur Bishwokarna由于涉嫌盗窃而于1992年11月1日在廓尔喀区Thalajung村被逮捕,并被带往廓尔喀地区警察局,据说他在那里经常遭到棍棒和sisnu(在皮肤上造成痛苦肿胀的一种植物)的抽打。11月19日他获得释放时无法工作,几天以后死亡。

409. 1993年11月23日,该国政府答复说,Bishwokarna先生在被带往警察所之前遭到当地居民的殴打。受到审讯以后,他获准回家。几天以后,他在尸体在廓尔喀Pokharithok市场上被人发现。验尸报告并没有表明殴打或酷刑是死亡的原因。然而,调查仍然在进行。

410. Bhim Bahadur Gurung是在与Purna Bahadur同样的情况下被逮捕的。据报道,他在廓尔喀地区警察局被人打耳光,被人抓住头发拖来拖去,脸部和腹部遭到拳打脚踢。另外据称,受害者被迫采取鸡的姿式坐着,双手被一根绳子松散地捆绑在背后,然后从大腿下面拉到前面来,两腿弯曲,然后头部塞到两腿之间和捆绑双手的绳子底下。被迫采取这种姿式以后,他遭到殴打,长达半小时之久。24天以后他获得释放,据报道没有受到指控也没有出庭,整个拘留期间一直被单独监禁。

411. Suya Bahadur Rana是于1992年11月3日在与Purna Bahadur同样的情况下被逮捕的,在廓尔喀警察局被单独监禁22天。据报道,他被带往警察巡官办公室,在其拘留期间曾几次被迫采取鸡的姿式,然后脚底、踝节部、大腿和手臂遭到殴打。他的腿部遭到抽打以后皮开肉绽疼痛难忍时,他还被迫上下跳跃。他获得释放以后进行的医疗检查表明,伤口是据称的酷刑造成的。1993年11月23日,该国政府答复说,这些指控是白捏造的。

412. Pratap Bishwokarna是于1992年11月9日在与前3人同样的情况下被捕的,并被带往廓尔喀地区警察局。所称他的踝节部遭到棍棒的抽打,他被迫采取鸡的姿式,他的脚底被抽打大约半小时之久,此后他被迫用受伤的脚上下跳跃。据报道,在单独监禁17天之后获得释放时,警察威胁他说,如果他透露他遭到酷刑,就会再次被捕。1993年11月23日,政府答复说,这些指控是捏造的。

413. Dwean Singh Gurung是于1992年11月6日象前4人一样被逮捕的。根据报告,他被迫采取鸡的姿式,然后脚底遭到粗木棍的抽打。此后他的全身遭到殴打;第6天,他全身的衣服被剥光,连续10分钟遭到在水里浸湿的sisnu的抽打。据报道,他的腹部遭到拳打,并被迫上下跳跃,直到他无法站立为止。他被单独监禁13天之后获得

释放。

414. Sanu Maya Bishwokarma 由于其丈夫 Purna Bishwokarma 在酷刑下提供的证词而受到牵连。她于 11 月 15 日被捕, 并被单独监禁一周, 所报道, 她在被捕时和被捕以后都遭到棍棒和 Sisnu 的抽打, 并被人抓住头发拎到空中。

415. Mnikala Rai 于 1992 年 12 月 13 日在加德满都 Buddhanilkantha 被警察逮捕并被拘留一夜。除了遭到强奸以外, 据称她还遭到踢打和殴打, 直到她失去知觉为止。所报道, 在她获得释放以后进行的医疗检查表明, 伤口是强奸时留下的, 包括胸部、大腿、手臂、脸部和头部的严重抓伤。

416. 1993 年 11 月 23 日, 政府答复说, 副警监由于涉及到虐待 Mani Kala Rai 而被解除职务。然而关于她在警察监禁时被殴打失去知觉的说法不是事实。

417. 特别报告员还被告知, 据称, 在 1993 年 6 月 25 日至 28 日期间, 在尼泊尔共产党在加德满德和邻近城镇召集的示威游行以后许多人被逮捕。据报告, 300 多人被拘禁, 其中多数人的胫骨遭到棍棒的抽击, 因此有些人无法正常走路。

418. 关于这起事件, 政府于 1993 年 11 月 23 日答复说, 在上述全国罢工期间, 加德满都流域各地的示威者无视法律, 放火、毁坏公共场所并向公共住房和车辆扔石头, 警察不得不拘禁参与这些活动的一些人, 以便进行现场调查, 防止暴力失去控制, 并保护公共和私有财产免遭进一步的损坏。经过调查以后, 并确定无罪的一些人在同一天获得释放, 而对于被确定参与暴力和破坏性活动的人则根据现行法律提起公诉。

## 尼日利亚

### 紧急呼吁

419. 1993 年 6 月 23 日, 特别报告员就尼日利亚作家协会和非洲少数民族权利组织主席以及奥戈尼人民争取生存运动的创始人 Ken Saro-Wiwa 据称于 1993 年 6 月 21 日被河流州司令部逮捕一事向该国政府发生紧急呼吁。随后他被转送到咯科特港州调查和情报局, 然后转移到一个地名不详的目的地。特别报告员表示担心, 他可能遭到酷刑。

## 巴基斯坦

### 转交政府的资料

420. 1993年6月9日,特别报告员通知该国政府,根据他所收到的资料,巴基斯坦民族联盟的支持者于1992年11月7日并在巴基斯坦民主联盟召集的示威之前和期间的以后几天内在全国各国遭到逮捕。据报道,1992年12月22日在伊斯兰堡发生了另一起大规模逮捕事件。据报道,由于参加抗议运动而被拘留的好几人在警察拘禁期间受到虐待。以下几段中叙述的个别案件已经转交该国政府。

421. 巴基斯坦人民党新闻秘书Salman Taseer于1992年11月18日在拉合尔被逮捕。据称在警察监禁期间,他被倒挂几小时。据称,他被放下来以后,一条铁棍放在他的腿上,两个身穿便衣的警察作在铁棍上,并用铁棍在他腿上滚来滚去。据称,他的脚底遭到橡皮棍和警棍的抽打。获得释放以后,他试图提交一份关于警官拷打他的第一手资料的报告,但据报告Dharampura警察所派出所的警官拒绝接收这份报告。

422. 巴基斯坦人民党所属人民学生联合会领导人Sohail Malik于1992年12月22日在伊斯兰堡被逮捕。据称在警察监禁期间,他反复遭到大皮靴的踢打,电棍和枪托的殴打,据说酷刑受害者治疗和康复组织的一位医生随后对他进行了检查并宣布,由于遭到酷刑他可能会阳痿。另外,据说,前联邦部长Malik Kukhtar Ahmed Awan和律师Sahafqat Abbasi也在同一事件中被逮捕,随后遭到酷刑。结果Awan先生不得不在联邦政府公务员医院治疗,而Abassi先生则在国际医疗中心接受治疗。

423. 特别报告员还收到关于Mohsin Abbas Raza案件的资料,据说此人于1992年2月15日在卡拉奇Shahrah-e-Quaideen被一个执法机构“突击队员”的人员逮捕,并被带往一个地点不明的拘留中心,据称他在那里遭到严重殴打,受到死亡威胁并受到电击。几天以后他获得释放,而没有受到任何指控。

424. 特别报告员在同一份信中提请该国政府注意1992年转交的指控尚未收到答复。

### 紧急呼吁

425. 特别报告员代表被关押在卡拉奇监狱中的一位美国公民 Lisa Evelyn

Rancore于1993年4月28日发出一项紧急呼吁。据报告,已经怀孕5个月的Rancore女士由于监狱中现有的条件而患有痢疾和肺炎,很可能患有肝炎。据报道,她得到很少或根本没有得到任何治疗,而且食物数量也不足。

## 秘 鲁

### 转呈政府的资料

426. 特别报告员在1993年8月26日的信函内向秘鲁政府转交了一份所收到的关于该国酷刑做法的主要指控的摘要以及一些个别案件。此外,特别报告员代表那些,根据所收到的资料,可能遭受酷刑危险的人发出了两份紧急呼吁。

#### (a) 向政府转交的有关一般酷刑做法的资料

427. 特别报告员在1993年8月26日的信函内告知该政府他已经收悉关于安全部队在该国施行酷刑的许多资料。特别是,据报道自1992年4月以来颁布的关于恐怖主义的新的法令所载的一系列规则助长了对因恐怖主义嫌疑而被拘留者施行酷刑,而恐怖主义嫌疑是定义极其模糊的措词。由于其中的一些规则:

- (1) 辩护权是受到限制,事实上在被拘留人向起诉人提交供述之前,警方不允许律师在拘留期间进行干预。因恐怖主义罪行的防范性拘留可长达15天,因叛国嫌疑的拘留时间甚至更长。
- (2) 在防范性拘留期间,警方具有很大的酌处权,甚至有权把被拘留人单独禁闭。对于叛国罪,警方可以超过法定的15天限制,规定防范性拘留的时间限制,甚至可以决定延长拘留期限。这些权力不受司法当局的控制。
- (3) 在警方调查和司法调查期间禁止行使人身保护令状的补救。

428. 报告还谈到了酷刑和非自愿失踪与即决或任意处决这两方面的联系。那些在长期不公开拘留后重新出现的人和法外处决受害者的尸体上往往留有遭到肉体摧残的痕迹。此类案件显然在该国的许多地方发生,但在宣布紧急状况和有重兵驻扎的乡村和城市地区,这样的情况最普遍。例如,特别报告员收到一份据称是在1992年8月和10月之间在万卡约市被处决的24名秘鲁中央国立大学的学生名单,他们的尸体上有着遭受肉体摧残的痕迹。

429. 根据所收到的资料,最普遍使用的酷刑方式是拷打,窒息、电击、绑住手臂长时间悬吊、死亡威胁和断肢。在紧急状态地区,据报道性骚扰和强奸是习以为常的事情。

430. 几乎在特别报告员收到的所有案件内,酷刑的责任归咎于驻扎在紧急状态地区的武装部队和警察部队的成员。但是,在该国其他地区服役的警方成员有进也被确定为犯罪者。大部分案件没有得到申报,或是因为受害者害怕或者受到威胁,或是因为在许多案件内指控很难得到证实;确实,在大多数案件内,根本没有给予一定的医学或法律注意使之能够提供最低数量书面证据。据报道起诉人和法官往往拒绝对受害者提出的申诉采取行动,或者把警方调查或拘留期间强行逼取的供述视为有效。

(b) 转交该国政府的有关对妇女进行强奸和性骚扰的资料

431. 特别报告员还收到大量关于对妇女进行强奸和性骚扰的资料,妇女往往是安全部队同起义团体作战时被强奸和受到性骚扰的受害者。因此,强奸似乎被用来作为惩罚、恐吓和侮辱的工具。

432. 显然有时在警方审讯时,强奸和其他形式的性骚扰以及其他酷刑方法如电击等一起使用。另一方面,在紧急状态地区,强奸是在乡村地区武装冲突的情况下在没有被拘留的情况下进行的,似乎以此作为恐吓和惩罚被怀疑与起义团体合作的民间组织的一种方式。据报道,1990年9月在阿亚库乔省 Chilcahuayco and Vilcashuaman 和1991年7月在阿亚库乔省 San Pedro de Cachi 都发生了类似事件。

433. 还据报道,犯罪者很少被绳之以法,甚至向有关当局告发的案件也是如此。军事法庭无视这些案件,并不按照法律赋予它们的义务把被告送交民事法庭。不受惩罚的情况再加上其他因素,例如提供证据的困难或者对受害者的社会态度等,意味着有大量的案件甚至没有告发。下面是已通报的个别案件:

(a) Pilar Coqchi 因被指控参加在 Belen 地区与“光辉道路”有关的活动而于1990年1月23日在阿亚库乔省 Huamanga 被捕。据称在拘留期间,她被强奸多次并遭到其他形式的酷刑,如拷打、窒息和悬吊。尽管已向政府检察官揭发了该案件,但由于缺乏证据没有对警方任何成员提出起诉。

(b) Carcosi 镇的农民 María Flores Valenzuela 及其17岁的女儿

Zunilda Pineda Flores 于1990年9月在万卡维利卡被 Julcamarca 军事基地的士兵逮捕。据报道，一到达军事基地，她们就被绑在一根柱子上，在太阳底下曝晒几小时。然后她们被几名士兵强奸后于第二天获释。

- (c) Virginia Huamani Garay 和 Luz María Blas Sánchez 于1991年8月15日在利马的一条街上等待公共汽车时被军方巡逻兵逮捕，据报道她们被带至一个由部队防守的工厂，遭到了12名士兵的强奸，并被警告不得揭发该事件。
- (d) San Martín de Porres 大学教授 María Elena Loayza Tamayo 因被嫌疑与光辉道路的成员有联系而于1993年2月6日在利马被国家反恐怖主义总部成员逮捕。她于2月6日至2月15日一直被单独监禁，据报道在该段时间内为得到她的供词，主要是她的头部和胸部遭到拷打和脚踢，被浸在水中模仿淹死，并被强奸多次。

(c) 转交政府的个别案件

434. 胡宁省 San Pedro de Sulcan 康塞普西翁、万卡约地区的乡村大队副主席 Higinio Quispe Pérez 和 Eleuterio Inga 于1991年4月12日被士兵逮捕，并被带至 Chaquicocha 军事基地，据报道，他们在那儿遭到拷打以便强迫他们提供关于恐怖主义活动的情况。第二天，他们被转移到 Chupaca 军事基地，据报道，在那儿他们与 Héctor Méndez Córdoba 一起被蒙上头罩，他们的手一直被绑在背后并遭到严厉的拷打。

435. 据报道，Rafael Leandro Rodríguez Eduardo 于1991年6月去胡宁省的 El Tambo 警察所报告一起盗窃案，在那儿遭到虐待。据报道，她被蒙住眼睛，身体多处，包括耳朵和生殖器遭到毒打。他的手臂被绑在背后，并用含有洗涤剂的水泼在他的脸上，之后他的双臂被绑在横梁上悬挂起来。

436. Senobio Enríquez Vargas 于1992年1月24日在万卡维利卡 Manta 被捕，人们怀疑这是由当地军事基地的部队成员所干的。据报道她遭到严厉拷打，而且他的左臂和胸部被刀划伤。

437. Juan Arnaldo Salomé Aduato 于1991年4月24日在胡宁省的万卡约被警方成员逮捕，并被带至12月9日警察所，他被关押在那儿，直至1991年6月10日被释放为止。据报道，在他被拘留期间遭到毒打、窒息、被悬空吊挂并且不给他饭吃。

438. San Juan 乡村大队前主席 José Natividad Flores Rojas 于1992年7月22日在亚马逊省 Bagua Chica、Bagua 被第五森林步兵师的部队成员逮捕。他被拘留13天,据报道他遭到严厉拷打并受到电击。另据报道他被长时间吊挂,以至于他的手臂的肩膀部分脱臼。

439. 全国矿工联盟组织秘书 Nnzario Edgat Flires Castro 于1992年5月15日在胡宁省奥罗亚 Yauli 被警察逮捕并被带到当地的警察所。他被拘留一星期,据报道在这期间,他遭到使用钝器的严厉拷打。

440. Antáritico Daniel Salas Córdova 于1992年4月27日在利马圣马丁区被国家警察局的成员逮捕。他被带至警察所,几小时后身亡。据称,尸体解剖报告表明他由于遭到肉体摧残之后窒息而死。

441. 利马郊区 Enrique Guzmán y Valle 大学学生 Nancy Luz Pimentel Cuéllar 于1992年10月10日在 Chosica 家中被武装部队成员逮捕,并遭到拷打,带至国家反恐怖主义总部。除了其他形式的虐待以外,还在她的指尖和头部施以电击直至其晕过去为止。她已于1992年11月2日在没有任何指控和不承认拘留的情况下获得释放。

442. 作为民主律师协会成员和秘鲁共产党(秘共)光辉道路成员的律师 Martha Huatay Ruiz 于1992年10月17日被捕。在被军事法庭判以终身监禁之前,她在国家反恐怖主义总部遭到酷刑。据报道利马律师协会曾经对这一酷刑公开进行谴责。

443. Marco Antonio Zárate Rotta 司令, Enrique Aguilar del Alcázar 司令, Cesar Cáceres Haro 少校和已退役的 Salvador Carmona Bernasconi 少校在一起未遂政变之后于1992年11月被捕。据报道,他们在利马的国家情报局所在地被单独禁闭10天。据报道,他们都遭到了拷打、电击和绑吊等酷刑。

444. Alberto Calipuy Valverde 和 Rosenda Yauri Ramos 于1993年3月在拉利伯塔德省 La Libertad 县 Angasmarca 地区被捕。其后不久,人们发现他们被弃尸荒野。根据所收到的资料,他们死于在军事基地遭到的虐待。

445. 捍卫圣伊格纳西奥人民利益委员会主席 Wigberto Vásquez Vásquez、农村和城市大队县联合会主席 Plácido Alvarado Campos 圣伊格纳西奥农民和大队联合会(农民联合会)主席 Víctor Morales Labán、农民联合会主任 Crisanto Velásquez Flores 圣伊格纳西奥农业生产者委员会主席 Guillermo Granda Rodríguez、圣伊格纳西奥农村和城市大队县联合会秘书 Guillermo Oyola

Cornejo、农民 Javier García Huamán、农民 Benjamín García Huamán、农民 Daniel Cruz Bautista 和农民 Samuel Huamán Huamán。根据所收到材料,卡哈马卡省圣伊格纳西奥县圣伊格纳西奥保护森林委员会的10个成员于1992年6月27日被警方人员逮捕,并遭到了拷打、绑吊和把头淹在水中等酷刑。

446. Marcos González Tuanama 于1992年4月29日被军事巡逻队逮捕,并押至圣马丁省的 Mariscal Cáceres 军事基地。据报道在审讯时他遭到了电击和拷打等形式的酷刑。

447. 农民领袖、Quispampa 社区(皮乌拉省 Huancabamba 县)前主席和皮乌拉地区农村联合会主任 Antero Peña Peña 于1993年5月27日被驻扎在Huancabamba的部队成员逮捕。据称,他被严刑拷打3天,多次失去知觉,并受到威胁,如果他透露遭到虐待的事实将把他处死。

#### (d) 紧急呼吁

448. 特别报告员于1993年6月22日向该国政府发出一份关于 María Lucero Cumpa Miranda 的紧急呼吁,此人早在1993年5月在利马被警方成员拘留。特别报告员于1993年8月16日为出租司机 Juan Abelardo Mallea Tomaila 发出了另一份紧急呼吁,此人于1993年7月10日在利马被国家反恐怖主义总部成员拘留。

#### 从政府收到的关于前几份报告内提到的案件的资料

449. 1992年12月18日,该国政府就据报 Jorge Nabid León Ramírez 及其兄弟 César 于1992年1月在Ayacucho 他们家外面遭到严厉拷打的案件作了答复。该国政府指出这些人既没有遭到军事人员的逮捕,也没有遭到 Huamanga 驻军成员的虐待。

#### 该国政府根据委员会第1993/48号决议提交的材料

450. 该国政府提交了一些普通照会,报告了光辉道路和图勃特·阿马鲁革命运动恐怖主义集团在该国各地进行的活动,包括有选择地谋杀、不分青红皂白地汽车炸弹爆炸、威胁生命、人身和个人财产以及进行绑架等等。

451. 该国政府还提供了1992年和1993年间为打击恐怖主义和安定该国而颁布



的一些法令的材料,包括减刑和忏悔等措施和对军事制裁法的一些修正,目的在于更好地保护被指控犯有恐怖主义和叛国罪的那些人的权利。该国政府还提交了关于在平定政策之下捍卫和促进人权的政策的材料。另据报道,在前几个月内,保安部队和恐怖主义集团之间的冲突次数有所下降,因此侵犯人权的指控数量有所下降。

## 意见

452. 特别报告员理解自1980年以来秘鲁所面临的暴动的严重性和残忍性。暴乱分子所犯下的暴行并不能说明实行酷刑是正当的,也不能说明被迫失踪或即决处决是有理由的。事实上肇事者逍遥法外的现象要求在政治意愿支持下采取坚决的行动以确保保安部队的个人责任性。

## 葡萄牙

### 转交政府的资料

453. 特别报告员在1993年11月3日的信函内告知该国政府他已收悉关于下列两个案件的报告:

- (a) Francisco Carretas 和一位朋友于1992年2月6日在 Charneca da Capari 被共和国的国民警卫队(警卫队)的人员逮捕。据报道在逮捕的时候和以后,在警卫队驻地他们遭到拷打和口头威胁。之后他们被带到阿尔马达附近的一个森林,据称在那儿遭到3个军官的拳打脚踢;据称一名军官扬言要对Francisco Carretas进行性骚扰。之后他在阿尔马达的 Garcia de Orta 医院治疗其伤势。据称X光透视表明尾骨可能骨折,而他释放后拍摄的照片表明其背部、臀部和腿部严重和大规模挫伤。据报道已开始进行司法调查。
- (b) 法国籍葡萄牙人 Orlando Correia 因与贩毒有关的指控在Guarda监狱防范性拘留时据说于1992年9月9日遭到司法警察的人身暴力。据说后来他在处于昏迷状况时被送至Guarda医院进行抢救。根据医院的医疗证明,他的胸部和背部被挫伤和擦伤。据报道9月底司法警察总长办公厅开始对该事件进行纪律调查。

## 大韩民国

### 转交政府的资料和收到的答复

454. 特别报告员在1993年8月26日的信函内通知该政府他已收悉关于囚徒遭拷打、被剥夺睡眠和在审讯期间被迫反复进行体育操练的报告。这些报告还表明在很少案件中,政府进行了独立和公正的调查,一些案件还导致对执法官员的惩办。特别是全国治安规划署(治安规划署)实施了犯法行为,该局可以在作出指控之前拘留和审讯囚犯长达20天之久。下列段落内陈述的个别案件已转交该国政府。

455. 工会活动分子 Chun Hee-sik于1992年9月4日被治安规划署成员逮捕。他被囚禁在Namsan治安规划署所在地长达48小时,在这期间据报道他遭到严厉拷打,并只允许他睡4小时。在他释放之后他被送至汉城医院进行治疗。他就其治安规划署所在地的遭遇,向汉城区检察官办公厅提出了申诉。

456. 1993年11月29日,该国政府答复:Chun先生已向汉城区检察官办公厅提出申诉,声称在治安规划署官员进行审讯时他没有得到正当的待遇。他的申诉正由检察官办公厅进行调查。

457. Song Hae-suk于1992年9月9日被治安规划署官员逮捕,据报道这些官员拷打她并扬言要对她进行性骚扰,以便迫使她在指控其丈夫进行间谍活动的证词上签字。该事件是当着她3岁儿子之面发生的,据称她的儿子和她一起被劫持,直至9月19日才释放。

458. 1993年11月29日,该国政府答复:Song女士是因协助间谍活动之罪而被捕的,之后被判以18个月的监禁,缓刑2年。关于虐待的指控是没有根据的。他和他的代表在其审讯期间都没有提出此类指控。

459. 作为1992年3月议会选举民正党候选人的Son Byung-son于1992年9月26日在汉城南部的家里被捕。据报告,他遭到13个人连续三天的拷打,据称在第四天他被迫不断地作体育操练,如蹲坐,两臂外伸和以手撑地倒立等。还据报道他多次受到医生的治疗;这包括推拿和注射。

460. 该国政府于1993年11月29日答复:Son先生于1992年9月26日因间谍罪被捕。其案件在最高法院待决。1993年6月11日,他就其在审讯期间的待遇向汉城区检察官办公厅提出申诉。该申诉正在调查之中。

461. 被禁止的社会主义工人联盟(Sanomaeng)所谓领袖Baik Tae-ung于1992年4月29日被治安规划署成员逮捕,据称他遭到长达22天的审讯。据报告,他在法庭

作证,在此期间,他遭到各种各样的酷刑,如被剥夺睡觉,注射毒品和暴徒殴打。

462. 1993年11月29日,该政府答复;关于虐待的指控是没有根据的。在审讯中没有予以证实,Baik先生没有提出申诉。

### 紧急呼吁

463. 特别报告员于1993年7月22日为人权活动分子Noh Taehun发出一份紧急呼吁。据报告Noh Taehun于1993年7月15日傍晚时分被国家警察行政局治安处军官逮捕,当时他正在他的律师办公室内。据报告警方出示的逮捕证填写不正确。当律师们要求警官遵守正确的法律程序时,据报告他们遭到殴打和威胁。

464. 1993年8月5日,该国政府就该案件作了答复:Noh先生的拘捕证是由汉城刑事地方法院的法官于1993年7月15日签发的。拘捕证的格式是正确的,表明了拘留地点(Yongsan警察所)及对其罪行的摘要。从7月15日至23日,Noh先生被拘留在Yongsan警察所进行审讯。在此期间,他每天与其律师会面并与其家庭成员会面6次。自1993年7月23日起,Noh先生被关押在汉城拘留中心候审,但没有限制其会见其律师和家庭成员。

465. 1993年9月24日,特别报告员为Kim Sam-sok及其姐姐Kinim Un-ju发出了另一项紧急呼吁,据报告他们是由国家治安规划署根据《国家安全法》在没有逮捕证的情况下于1993年9月8日被捕的。据称在审讯期间他们遭到殴打,并被剥夺睡眠。根据被允许短时间会见被拘留者的家庭成员说,他们处于恍惚状态。

466. 该国政府于1993年10月22日对该案件作出答复:1993年9月8日,Kim Un-JU因涉嫌从事间谍活动而被捕;1993年9月10日发出逮捕证。他和其姐姐被拘留在Jungbu警察所候审。9月24日他们的案件被转交至汉城刑事区检察官办公厅。在提交本答复的时候,他们被关押在汉城拘留中心等待起诉和审判。在审讯期间他们受到人道的待遇。他们的家庭成员或者律师没有就他们在拘留期间的待遇提出任何申诉。

### 从政府收到的关于前几份报告中提到的案件的资料

467. 1992年11月12日,特别报告员通知该国政府,他已收到关于Kim Nak-jung、Shim Keum-sup、Kwon Du-young和Noh Jong-sun于1992年8月被捕并带至国家治安规划署并遭到酷刑的指控的资料。

468. 1993年7月15日,该国政府答复:Kim Nak-Jung于1992年8月25日被带至国家治安规划署审讯;这是经他同意之后做的;他于1992年8月27日因被指控犯有间谍罪而被捕。Shim Keum-Sup、Kwon Du-Young和Noh Jong-Sun先生分别根据逮捕证于1992年8月27日、8月30日和8月29日被捕;被捕之后,根据有关法律和规则,允许他们会见他们的律师;关于遭受拷打和剥夺睡眠的报告是没有根据的;被告本人或者他们的代表在审判前和期间都没有提出此类指控。

### 罗马尼亚

#### 转呈该政府的资料

469. 特别报告员在1993年8月26日的信函里通知该国政府,他已收到报告,指控警官经常对被拘留者施以酷刑和虐待,以迫使他们招供,作为以后法庭上的证据。已报告的有如下个别案件:

- (a) 克卢县 Sic 社区的匈牙利血统人Stefan Tasnadi于1992年8月25日被捕。据称Tasnadi先生在被押往克卢县Gherla镇的警察署时遭到用橡皮警棍和荷弹武器的毒打。抵达时,他的脸部、颈部和双手遭到警棍和拳头的毒打。根据他释放后发表的医疗证明,他身上的伤口需要5-6天的医疗。尽管向军事检察官办公室提出了正式申诉,据报告没有进行任何调查。
- (b) Mihai Poteras 是因被怀疑犯有偷窃罪而于1993年2月底在Tudora-Botosani村被捕并被带至Pascani警察所,据称在那里他遭到长达五天的野蛮毒打。在他被释放之后,他在布加勒斯特得到一名法医专家的检查,之后被送进雅西的St. Spiridon医院治疗。
- (c) 19岁的Doru Marian Beldie因被怀疑同性恋而于1992年6月16日在布加勒斯特被捕。他被带至第17区警察所,据报告他的手掌和脚底遭到警棍的毒打,长达几小时。
- (d) 20岁学生Marcel Brosca于1992年3月7日在特库奇被捕并被带至火车站的警察办公室,据报导他在那里遭到长达3-4小时的毒打。据称有人拉他的头发;并用他的头的两侧和后部撞击桌子和墙,直到满脸鲜血淋漓为止;有扭住他的手臂并用警棍打他的脚底。他最后在一份证词上

签了名,表明其曾强迫一名未成年人与他发生同性关系。

470. 特别报告员还收到关于1992年7月3日在布加勒斯特·罗马社区成员遭受虐待的事件的材料。根据报告,大约40-50名属于军事警察UM 02180部队的士兵手持橡皮警棍、椅腿和凿斧来到Piata Rahova市场,开始不分青红皂白地袭击在市场上的罗马人。结果,若干人严重受伤,其中一人为 Mircea Gheorghe。据称他的头部遭到棍打,使他失去知觉;但是士兵们继续殴打他尽管他已满头鲜血。3小时后布加勒斯特法医学院证明,Mircea Gheorghe头部有4公分长的伤口,他的右肩、胸部、大腿和小腿多处大面积内伤。

471. 特别报告员还收到关于该国普遍的监狱情况的报告。这是指继续使用长时间戴手铐和脚镣等约束方法作为惩罚的一种形式,或者经常使用隔离牢房作为一种方式来惩罚违反监狱内部规则的比较小的错误。

卢旺达

#### 转呈政府的资料

472. 特别报告员在1993年8月26日的信件里通知该国政府,他已收悉关于据称于1991年被捕并遭到酷刑的下列人员的材料:

- (a) Kangura 报编辑 Obed Bazimaziki 和 Adrien Rangira 于1991年12月10日早晨在Kigali被捕,并被带至总统办公室,在那他们遭到警棍和电线的毒打。第二天,在被押往Kami军营之前,他们被用浸透辣椒的材料封住嘴巴。
- (b) 新闻记者Adrien Rangira 的姐姐Providence Kayitesi 于1991年12月21日在Kigali被捕。据称他在总统办公厅被审讯二天,并遭到电线和棍棒的毒打。
- (c) 布塔雷经济社会学校学生Desire Murego 于1991年8月19日被捕,并被带至中央情报局审问,在审问期间他的手脚遭到使用棍棒和电线的极其粗暴的毒打。
- (d) Jean-Baptiste Gacukiro 是Gisenyi 地区的一个小公司的业主,他于1991年4月5日被捕,并被带至 Bigogwe 军营,在那里他遭到了毒打,特别是人们使用枪托毒打他。
- (e) Abdulkheri Mbarushimana 于1991年8月19日在基加利被捕,他被关押

在中央情报局,长达6天,在这期间,据称他遭到使用警棍的毒打、拳打脚踢和用电线的殴打。

- (f) Oswald Manzi 和Faustin Rutalindwa是BIFMAR公司的技术员,他们于1991年7月25日在 Kigali被捕,并被带至总统办公厅,据称他们在那里遭到毒打并被迫在供词上签字。

473. 有人还告诉特别报告员,1993年2月,治安部队成员在基加利逮捕了大量图西公民,并把他们带至军事基地施以酷刑。他们中的19人,包括Kituku Hayidarusi被杀害,他们的尸体上留有遭到毒打的痕迹。

474. 在同一份信函内特别报告员提请该国政府,1992年转交给它的指控、至今没有收到答复。

### 沙特阿拉伯

#### 紧急呼吁

475. 1993年6月23日,特别报告员为作家和利雅得al-Imam Muhammad bin Saud大学讲师以及Lujnat al-Difa'al-Hugug al-Shar' iyya(维护合法权利委员会)创建人'Abdullah al-Hamed向该国政府发出紧急呼吁。据称他于1993年6月15日在他自己的家里被al-Mabahith al-'Ammah(情报总局)的成员逮捕,并被单独禁闭拘留。人们担心他可能遭到酷刑。上述委员会的另一成员,Muhammad' Abdullah al-Mas'ari博士自从于1993年5月15日被捕以后也被单独禁闭,据说他被长时间剥夺睡眠。

### 塞内加尔

#### 转呈政府的资料

476. 特别报告员在1993年8月26日的信函内通知该政府,他已收到关于下列人员的报告:

- (a) Mody Sy是属于塞内加尔民主党的一名国会议员,他于1993年5月20日在达喀尔被捕。他在Miong街的警察所被扣留一星期,据说在那里他遭到酷刑,以迫使他招认他参与谋杀宪法委员会副主席。根据所收到的

材料,他的手指和生殖器受到了电击。一个月之后,他仍然处于医疗之中,据报道,他的律师未能开始调查对该酷刑的指控。

- (b) 芒果小贩Ramata Gueye因与Sy先生同样的调查有关,于1993年7月14日被捕。据称她先在靠近捷斯的Pout警察所遭到酷刑,然后在捷斯警察所又遭到酷刑。两天后,在没有任何起诉的情况下她被释放。她释放之后所作的医疗报告表明,她的右手和臀部有伤痕,一个手指被扭伤;头发被拉掉,并且小便有血。

### 塞拉利昂

#### 紧急呼吁

477. 1993年4月21日特别报告员代表下列人员向该国政府发出紧急呼吁:国防部长任秘书Ernest Allen、女商人Fatmata Binta Jalloh、外交部雇员Foday Kallon、塞拉利昂驻俄罗斯大使馆官员Rosaline Kamara、塞拉利昂信赖保险和运输公司常务董事Ernest Bai Koroma和Bockarie Samura。根据报告,这些人因被怀疑参与阴谋推翻政府而于1993年3月18日左右被捕。但是,据称他们没有被指控犯有任何罪行,他们被单独禁闭关押。人们担心他们可能遭到酷刑或虐待。

### 南非

#### 紧急呼吁

478. 1993年8月17日特别报告员代表下列人员向该国政府发出紧急呼吁:称为马弗京反镇压论坛的非政府组织协调员Thabo Sejanamane、非洲人国民大会(非国大)马弗京支部主席Themba Gwabeni、非国大马弗京支部执行成员Nomvula Hlongwane、Ephraim Motoko、Gordon Kgamanyane和Johannes "Jones" Molefe。

479. 根据报告,Thabo Sejanamane于1993年8月13日凌晨3时在他的家里被博普塔茨瓦纳“家园”治安警察的警官逮捕。据报告警方没收了关于博普塔茨瓦纳人权情况的文件和报告。Nomvula Hlongwane、Ephraim Motoko、Gordon Kgamanyane和Johannes Molefe于1993年8月12日凌晨在他们家里被博普塔茨瓦纳治安警察逮

捕。Themba Gwabeni同天早上10点在其工作场所被捕。另据报告,代表被拘留者的律师向警方询问他们被扣留在何处、根据那条法规以及他们被拘留的理由,但警方没有提供任何情况或者允许律师会见被拘留者,然而允许亲属到Mmabatho警察所为他们送衣服。鉴于拘留他们的情况,人们担心他们可能遭到酷刑或虐待。

480. 在同一份呼吁内,特别报告员提请该国政府注意关于Thkoza 公民协会秘书Louis Sibeko于1993年8月17日被捕的材料。据称南非警察成员冲入其在ThokozaSeronyela街的家,并把他带至政治和暴力刑事局总部。人们担心害怕他可能会遭到酷刑或虐待。

481. 1993年8月26日,特别报告员为Makgowa Letele、Bushy Boy Machere、Power Makgothi、Lucky Maponya、Gift Moeti Mokoena、Ini Mokoena、JabuMokoena、Buti Moloi、Motlalepule Motlounq、Tshepo Sewetsang和Buti Thinane等发出了另一份紧急呼吁。据报告,他们于1993年8月17日在Thokoza被捕,Louis Sibeko也于同天被捕。据报道,根据“不安定地区”(紧急状态)条例第3(1)节,他们都被关押在Boksburg监狱,该条例允许警方在没有指控和审讯的情况下将人扣留30天,并由警方当局任意决定其他人可否接近拘留者。鉴于这种情况,人们担心他们可能会遭到酷刑或虐待。

## 西班牙

### 转交政府的资料 and 所收到的答复

482. 特别报告员在1993年8月26日的信函内告诉该政府,根据他收到的一些材料,尽管《刑事诉讼法》第520条规定拘留者被送交法庭审讯前的拘留时间为72小时,但对怀疑与武装匪帮或恐怖主义集团进行勾结或是其成员而被拘留的人,第520条之二和第527条修改了这条规则。因此,在法院发布命令之前或在警方要求之下,72小时的时间可能再延长48小时,而警方无须把被拘留者本人带至法院接受法院命令。而且,在整个这个时期内,被拘留者可能被单独禁闭,这特别意味着他得不到他所选择的律师的援助,并且不能通知其家人或朋友他拘留的地点。根据这些消息来源,这一法律形势助长了酷刑和虐待的做法。

483. 还据报道,因对被拘留者施以虐待和酷刑而遭到谴责的执法官员在某些情况下仍然担任原职并且有时还得到晋升或者得到宽恕。然而并没有采取任何预防性措施,如在案件未解决前暂停职务,尽管一个具体的案件可能要化好几年的时间才



能得以解决。

484. 特别报告员还通知该国政府他收到的关于下列段落内所述案件的指控，1993年12月13日该国政府对此作了答复。

485. Kapa Urra Guridi于1992年1月29日在巴绍里被民防队逮捕。根据报告，在押送La Salve营房之前，他被押至树林里长达1小时左右。约8小时之后，他被送进de Basurto公民医院，医院报告在他脸上、手上、手腕、腿部和大腿多处挫伤，肌肉组织遭到损伤。之后又查出颈部两处受伤。根据Urra先生两天后所作的证词，这些挫伤是在他被捕之后遭毒打所致。他还声称，他还被人用塑料口袋套在头上差点窒息以及被假枪决。毕尔巴鄂第8预审法官就这些酷刑的指控开始司法调查。

486. 根据这一案件，该国政府发出一份由有民防队发表的报告。根据该报告，在逮捕的时候以及从巴绍里押送到La Salve营房的途中，Urra Guride先生以暴力对抗执行拘捕的人员，拘捕人员不得不采取武力以执行拘捕。因此Urra先生所受到的伤害都是由于这一搏斗的结果。在营房里，人们发现他躺在牢房的地上，由于医生诊断他心律不齐，因此立即把他送至医院。在其妻提出申诉之后所开展的司法调查中，要求若干参加逮捕的部队成员在第8预审法官面前作证。然而并没有对任何这些人员提出任何指控。医疗报告的内容不得而知。

487. 另一方面，该政府还向特别报告员提供了一份毕尔巴鄂首席律师给第8预审法官的报告副本，其中指明了Urra先生被捕的情况。该报告还指出，1992年1月30日去Basurto医院看望Urra先生的司法当局代表发现他精神错乱，并身上有最近出现的多处伤口和挫伤。几小时后，一名被紧急召到Urra先生房间的护士发现有两名自称是民防队成员的人在他房间内，并看见被拘留者嘴里有血。之后他由法医进行检查，法医还发现多处伤痕和挫伤。当问及伤口起因时，被拘留者详细地描述了他所遭到的待遇，包括遭到毒打、窒息和死亡威胁。他还指出他在医院里继续遭到虐待。该国政府还提供了一份载有Urra先生健康状况详细内容的医疗报告的副本。

488. Manuel Muñoz García是加的斯Puerto-2监狱的囚犯，据报告，1992年8月14日，他被监狱官员绑在他的床上毒打，显然是因为他侮辱了监狱官员而对他进行惩罚。据报告由于毒打，Manuel Muñoz的鼻子破裂，嘴唇裂口，一只眼睛由于肿胀完全睁不开。据称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被绑在床上长达几小时，之后才有一名医生给他诊治。第二天他被转到Valencia监狱。他已向Valencia监狱检察官提出了关于虐待的指控。

489. 关于此案件，该国政府提供了一份由“监狱总长”发表的报告，其中指明Muinos先生袭击了若干监狱工作人员。由于这一争斗结果，四名工作人员以及囚犯

本人不得不送到监狱治疗轻伤的医务所进行治疗。

490. 据报告,Eduardo Basabe Larrinaga和Germán Cristóbal Aznar于1992年8月17日在从Cuenca的Ocana 1号监狱转至Alava的Nanclares de Oca Prison监狱途中遭到押送他们的民防队的毒打。其家人于1992年8月27日向Gasteiz法院提出申诉。

491. Pako Etxebeste Arozena是Martutene-Donostia省监狱的囚犯,据报告,1992年8月18日,他从Burgos监狱转狱时遭到严厉拷打,结果使他一只眼睛和颈部受伤,头部多处挫伤。1992年10月19日其家人向San Sebastián第二调查法院提出申诉。

492. 关于上列三个案件,该国政府提交了民防队第111岗哨所作的报告。该报告指明司法当局曾要求得到有关参加这次转狱行动的工作人员身份的材料,并已审讯了其中一些人,但是,还没有发现任何人应对所指控的酷刑负有责任,因此,没有实行纪律制裁。还据报告,他们抵达上述监狱时所发表医疗报告并没有指出有任何伤害的痕迹。

493. 据报告,Arnaldo Otegi Mondragón于1992年9月10日从Ciudad Real省监狱转至Herrera de la Mancha教养中心时遭到5名民防队员的拷打。9月15日,他被转至Alcalá-Meco教养中心,在那里他又一次成为殴打的受害者。

494. 关于该案件,该国政府发出了一份民防队111岗哨的报告,其中指明,Otegi先生在抵达Herrera de la Mancha监狱时,袭击了一名开始搜查他的工作人员。已经向Ciudad Real第1预审法官提出了申诉。1992年9月15日把他从Alcalá-Meco监狱转至Zaragoza监狱。之后,司法当局要求民防队提供关于参加从Ciudad Real省监狱转至Herrera de la Mancha教养中心以及从Alcalá-Meco监狱转至Zaragoza监狱的工作人员身份的材料。但是,没有发现任何人对所指控的酷刑负有责任,因此,没有实行任何纪律制裁。它还进一步报告,抵达马德里监狱时所发表的医疗报告指明上嘴唇上有挫伤。

495. Koldo Arrese Garate是萨拉戈萨Daroca监狱的囚犯,据报告,1992年9月12日他遭到监狱官员和民防队成员使用铁棍的毒打、狱医诊断在其手臂、肩膀、膝盖和生殖器周围多处受伤,都因毒打所致。事发一星期后,其家属在探访时还能够看到这些伤痕。1992年9月30日,他向萨拉戈萨监狱检察官提出了申诉。

496. 关于这一案件,该国政府提供了关于在Daroca监狱发生暴乱的材料,Arrese先生似乎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受伤的。但是,Arrese先生的名字并没有列在治安部队干预后受伤的囚犯的初步名单内。1992年9月18日Arrese先生向Daroca预审

法官提出了申诉。但是,司法调查仍继续进行。该国政府进一步提供的材料指明,根据医疗报告,Arrese先生身上多处受伤。

497. Imanol Txabarri被软禁在Cahors的法国镇,1993年7月10日他被转交给民防队,然后被转移到马德里的民防队总部。根据Imanol Txabarri先生7月13日在全国高级法院第二中央法庭普通法官面前所作的证词,据称,他的头部和睾丸多次遭到毒打,在整个拘留期间他被蒙住眼睛。

498. 关于该案件,该国政府的答复是,关于虐待的指控是捏造的。Txabarri先生在Figueras法庭和La Bisbal法庭受到法医的检查,法医证明没有发现任何伤痕。1993年7月11日由全国刑事法庭”的法医进行第二次医疗检查,这次检查的结果不得而知。民防队无一成员因所述指控而受到起诉。

499. 该国政府还向特别报告员提供了旨在保护被拘留者权利的《刑事诉讼法》第520条和其它条款的材料。只有在有组织犯罪的案件里,法官才能在警方的要求下延长拘留时间,最长时间为5天,并下令将被拘留者单独监禁。然而,即使是在这样的案件内,也不能剥夺对被拘留者的法律援助,被拘留者有权得到每日医疗检查。报告提及由ETA恐怖主义集团成员普遍提出的关于酷刑或虐待的申诉是破坏治安部队名誉的一个战略。此外,该国政府提供了自1980年代初期以来所举行的审判中被判以酷刑罪的30名军官的名单。

### 斯里兰卡

#### 转呈政府的资料

500. 特别报告员在1993年11月3日的信件内通知该政府,根据他所收到的报告,尽管该国政府自1992年以来为了改进该国的人权情况采取了积极措施,但被军方和警方监禁的囚犯继续遭到酷刑和虐待。这些措施包括,例如,由治安部队发布关于逮捕和拘留程序的通知,以便避免滥用职权,并建立了一个担负监督遵循被拘留者基本权利的机构--人权特别工作组。

501. 然而一些与普通刑事程序不同的特殊法律条款仍然有效,并可用于根据《紧急状态条例》或《防止恐怖主义法》(PTA)而被拘留的囚犯。因此根据PTA被关押的囚犯可以被拘留90天,在这之前不必提交给司法当局,而根据《紧急状况条例》拘留囚犯可关押长达30天,才由治安法官审查他们。此外,根据《紧急状态条例》,在助理警长一级或以上的警官面前所做的供认能够提交给法庭,这不同于一般的刑

事法,一般刑事法要求在一名治安法官前供认,以保护囚犯免遭逼供。此外,根据这些条款,囚犯不必被关押在公众知道的拘留地点,各级官员有权决定将拘留者关押在何处,而不要求他们公布拘留地点。根据这些消息来源,所有这些因素助长了酷刑的做法。

502. 还据报告,在东北部被军方、特种部队和警方监禁的囚犯继续遭到酷刑和虐待。酷刑的方式包括严刑拷打、电击、用香烟或火柴烧、往囚犯的鼻孔里灌汽油然后用塑料口袋套住他们的头部、绑住囚犯的大姆指把他们悬挂起来,然后毒打他们、用带刺铁丝鞭打囚犯、绑住囚犯的脚踝倒挂起来,并反复把他们的头浸入水中。据报道,妇女遭到士兵的强奸。还据报道,在南部被警方和军方监禁时,因《紧急状态条例》和PTA而遭拘捕的政治拘留犯以及刑事嫌疑犯遭受酷刑。还据报告,在大多数案件内,酷刑的受害者因为害怕报复而没有向政府或非政府机构提出申诉或报告他们的案件。

503. 除以上所述外,特别报告员还收到了有关下列两个案件的口供书:

- (a) Chunnakam Mylanny North的Sinnathurai Mohan 于1991年1月16日因生意方面的原因去Thirukeetheswamram。在前往Vidathiilithivu的船上,据报告,他和其他3人被斯里兰卡海军成员逮捕。据称在遭到拷打后,他被交给斯里兰卡军队,斯里兰卡军队把他带至Thallady军营,据称他在那里又遭到毒打,并绑住他的姆指把他悬挂起来。这以后的3天里,他被关在称为“肉摊”的房间内,因该房间满地是血而由此得名。1991年11月17日,他被带至Kalutara监狱,在那里他常常遭到毒打。他于1992年8月释释。
- (b) Packinyanathan Anton于1990年10月14日在海上被斯里兰卡海军成员逮捕并被带至Karainagar军营,据报告,在那里,连续几天他被倒挂在那里,并遭到铁棍和警棍的毒打。之后他被转移到Palaly监狱。据报告,在那里,人们强迫他吃皮鞋上的碎皮片和浸满柴油的棉花。据报告,一连几个月持续对他进行拷打,并蒙住他的眼睛,给他带上手铐。他于1993年7月被释放。

苏丹

转交政府的紧急呼吁和收到的答复

504. 在本报告审查期间,特别报告员代表据说已被逮捕并有可能遭到酷刑的人员向该国政府发出12份紧急呼吁。下面几段转载这些呼吁的摘要。这些呼吁的发出日期放在每段摘要之后的括号内。

505. 安沙尔宗教会领袖,前内务部长Sayed Ahmed Radel El Mahadi于1993年4月17日被冲进他家的治安部队成员逮捕。根据报告,他的儿子Mohamed也被捕,并在拘留期间遭到毒打,之后在昏迷不醒的状况下被抛弃在Omdurman他家附近。(1993年4月28号)。

506. 1993年5月3日该国政府对于该案件的答复是,Sayed Ahmed Abdel Rahman Elmahdi被主管治安的当局传去审讯。审讯之后,他于同天立即被释放。他没有被逮捕,他的住所也没有遭到治安部队成员的袭击。他的儿子既没有遭到治安当局的逮捕也没有传去审讯。

507. Ahlia大学学生Siddig Mohamed Eltom于1993年4月9日在恩图曼和平示威游行之后被捕。根据报告,因受同一事件牵连被捕的其他人在遭到严刑拷打之后于第2天被释放。但据报告,Siddig Mohamed Eltom仍然被关押在位于市政银行后面的拘留中心。(1993年5月7日)

508. 恩图曼 Wad Nubawi清真寺阿訇Mohamed al Mahdi、恩图曼 Guba清真寺阿訇Abdel Mahmue Abbo、安沙尔宗教会事务办事处宗教指导主任Abdullah Ishaq这3名安沙尔宗教会伊斯兰教派资历高深的成员据报告于1993年4月29日被捕。安沙尔宗教会阿訇的居民代表Abdel Rahman Yunis在喀土穆西南部300多英里的省镇Addamazin被捕,据报告Al Fadi Omar和另外7人也在Ad-Damazin被捕。尼亚拉安沙尔宗教会阿訇的居民代表Al-Hadi Adam据报告在该城镇被捕。据报告,Musa Abdallah al-Bashir在离喀土穆南部140英里的城镇Ed-Dueim被捕。据报告Al-Zahawi Ibrahim和Mustafa 'Abd al-Gadir' Abd al-Latif在Wad Medani被捕。

509. 这些拘捕据称是在1993年4月发生的。人们认为这与散发 Sadiq al-Mahdi 要求恢复多党制民主的演讲有关。Sadiq al-Mahdi 于3月底在恩图曼祈祷者庆祝 Eid al-Fitr 之后作了这一演讲。Abdul Rasoul al-Nur Ismael 第一次

于1993年4月5日和 Sadiq al-Mahdi 一起被捕,之后被释放。据报道,他因与所指称的推翻政府的阴谋有关再次被捕,同时被捕的有 Mirghani Abdel Rahman Suleiman 和 Fadlalla Burma Nasir,他们都是乌玛政党的高级成员。(1993年5月14日)

510. 1993年8月18日,该国政府通知特别报告员: Alzahawi Ibrahim 于5月3日被捕,受到刑事指控;Abdul Rasoul Al Nur Ismael 于7月2日被捕,受到同样的指控;Mirghani Abdelrahman Salman 于4月29日被捕,也受到刑事指控。呼吁内提到的其他人员没一人被捕。

511. 前内阁成员 Ibrahim al-Amin 博士据说于1993年4月11日左右在喀土穆被捕;Mohammed Abdel-Rahim 在 El-Obeid 被捕;Mohammed Yussuf Hassan 在 Wad Medani 被捕; Ibrahim Ali Abdelgadir Fageer、al-Sadiq Ibrahim、Shanabla 部落的 Omda Abdel Bagi Taj al-Din、教师 Osman Idris Habani、教师 Berier Mohamed al-Tom、商人 Hussein Ahmad Fadl: 据报道这些人于1993年4月或5月在离喀土穆以南140英里的小镇 Ad-Deim 被捕。

512. 民主联合党成员 Yahia Mukwar 博士和商人,民主联合党成员 Abdel-Rahim al-Hussein 据报告在 喀土穆被捕。农民 Abdel rahman al-Khair Abdelwahab 和安沙尔宗教会的成员和安沙尔宗教会阿訇的居民代表 Mamoun Yousif 据报道在苏丹东部的 Kassala 被捕。乌玛党成员 Abdel Ghani Mohamed Omar al-Amir 在离喀土穆以北170英里左右的小镇 Ad-Damer 被捕。据报道所有这些逮捕发生在1993年4月或5月。

513. 此外,特别报告员收到了关于1993年4月底或5月初在喀土穆逮捕的下列被认为参与推翻政府阴谋的人员的材料: 退役军官 al-fatih Mohamed Abdel A' al 少将、退役军官 Mustafa Ahmad al-Tai 上校、退役军官 Mohamed Hassan Osman al-Zubeir 上校、退役军官 al-Tayib Nuor al-Daim Mohamed 中尉、退役军官 Haidar al-Tigani、药剂师 Gaafar Yassin Ahmad、Osman Mohamed Ali Gumma、al-Tirifi al-Tahir Fadur、Yasir Abu Zeid Ahmad、al-Hassan Ahmad Salih Mohamed、Mubarek Mohamed Abdalla Gadeen、前部长和乌玛党成员 Fadlalla Burma Nasir、民主联合党成员 Mirghani' Abd al-Rahman Suleiman、Osman Mustapha Mahjoub。其中8人,包括 Mustapha Ahmad al-Tai 上校和 Osman Mustapha Mahjoub 曾于1993年4月26日出现在苏丹电视上。他们带着镣铐,据报道还有伤痕,表明他们遭到了毒打(1993年5月26日)。

514. 据报道,被禁止的乌玛党和富尔种族团体的下列成员于1993年4月底在达尔福尔西部地区被捕: 前议会成员 Mohamed Atim Mohamed Salam、农业项目主任

Yusif Mohamed Sharaf al-Din、教师 Nasr al-Din Tambur、前议会成员 Yacoub Khamis、前地区政府部长 Omer Haroun 达尔富尔州宗教部主任 Fiqi Salih Ibrahim、Mohamed Sowar Adam 和 al-Zubeir Mohamed Khamis。据称他们遭到治安军官的拷打、Nasr al-Din Tambur 由于虐待而重病垂危。据报道他们可能单独监禁在南达尔富尔的 Zalingei 或西达尔富尔首府 al-Fasher(1993年6月14日)。

515. 被禁止的苏丹共产党成员 Yousif Hussein、Abdel Karim Abdel Jaliel 和 Nadir Mahjoub Mohamed Salih 据报道于1993年6月11日在北喀土穆被捕,并被带至无人知晓的拘留地点。(1993年6月25日)

516. 据报道被禁止的乌玛党下列成员据称因被怀疑阴谋反对地区长官而于1993年6月16日在达尔富尔地区 El Fashir 被捕,并被带至无人知晓的拘留地点:达尔富尔地区的前议会成员 Ibrahim Mohammed Abbo、达尔富尔地区前地区部长 Abdalla Ali Masar、医生 Abdel Latif Abdel Rahim 博士、达尔富尔地区前副长官 Adam Mohammed Ahmed 博士、乌玛党在达尔富尔地区 Nyala 的代表 Abdel Rahman Ishaq、地方政府官员 Atim Mohammed Salama、达尔富尔地区农业部官员 Adam Ibrahim Khalil、助理医疗官 Abdel Rahman Yousif(1993年7月5日)。

517. 1993年7月20日,该国政府答复说,以上提到的人员从来没有被逮捕。

518. 据报道,喀土穆 Nuba 社区的下列领导成员于6月底在该城市的各个不同地方被治安军官逮捕:前旅游部长和苏丹国民党成员 Mohamed Hamad Kowa、苏丹国民党成员 Mustafa Angelo、牧师 Khamis Farajallah Kortel、教师 Angelo、教师 Idris Shameila。据称他们被单独禁闭在无人知晓的地方。(1993年7月14日)

519. 1993年8月19日,该国政府答复说,这些人从未被逮捕。前旅游部长 Mohamed Hamad Kowa 在其喀土穆的家中过着正常的生活,从来没有被治安当局拘留或传唤审讯。

520. Mamoun Elyas Mohammed Ahmed 原是一名警官,曾经在沙特阿拉伯驻喀土穆大使馆担任公共关系官员,他于1993年8月底因被怀疑进行间谍活动而在喀土穆被捕。报告指明,他在禁闭中受到酷刑。

521. 被禁止的乌玛党成员 el-Fadil Adam 于1993年8月底在喀土穆被捕,显然是因被怀疑编印和散发批评政府的传单。他被拘留的地方没人知道。(1993年9月15日)

522. 1993年9月23日,刚向特别报告员提供了有关苏丹的人权情况的材料的4名妇女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计划署)喀土穆办事处前被苏丹警方成员逮捕。特别

报告员和他的三名助手亲眼目睹这一逮捕事件,并看到其中两名妇女被野蛮地沿街拖拉,被强行推进警车。在特别报告员前往司法部长办公室几分钟后,警察当着许多见证人的面野蛮地逮捕了在开发计划署办公室前等待会见特别报告员的25名妇女。

523. 据报告,18岁的Baha'aal-Din Abul Gassim于1993年10月25日在喀土穆南部他家门口被4名武装的便衣治安军官逮捕。Baha'a Abul Gassim是Issam Abul Gassim少校的兄弟,Issam Abul Gassim是一名因未逐政变定罪而于1990年被处决的军官。据报告逮捕是在Abul Gassim参加一次反对政府的政策会议之后的第二天发生的。据称武装治安军官夺门而入冲进正在举行会议的房屋,粗暴地驱散集会,鞭打那些与会者。(1993年11月5日)

524. 被禁止的民主联合党副书记Sid Ahmad al-Husseini据报告于1993年11月17日在喀土穆他家内被治安军官逮捕。据称他的逮捕是在他在恩图曼 Ahlia 大学组织一次会议的第二天发生的,在该次会议上他谴责了现政府的政策。

525. Abdalla Barakat是安沙尔会的重要成员,并且是已被禁止的乌玛党的支持者,据报告他于11月12日在恩图曼被捕。据称他是在Wad Nubawi 清真寺的讲演之后被逮捕。在这次讲演中,他谴责了指称的喀土穆学生会的选举被人操纵。

526. 还据报告,1993年11月,反对该选举结果的学生占领了大学的大楼,与企图把他们围禁在校园内的治安警察对抗。之后发生了暴乱,据报告,约300多名学生被捕。截至11月16日,33名学生仍然被治安军官关闭在秘密的拘留中心。(1993年11月24日)。

## 意见

527. 对已转呈的一些案件,特别报告员已从该国政府收到了答复,对此表示赞赏。然而在过去两年内他所得到的材料与负责汇报苏丹人权情况的特别报告员向大会提交的临时报告内所表达的意见完全符合,在该国内发生了有组织有计划的酷刑(A/48/601,第41-50段,第98段)。

## 叙利亚

### 紧急呼吁

528. 1993年9月1日特别报告员为Hassiba 'Abd al-Rahman向该国政府发出了



一份紧急呼吁。据报告,此人因被指控怀疑与被禁止的共产主义者行动党有联系而于1993年6月8日在大马士革Kafr al-Soussa他的家里被捕。据报告自她被捕以后她被单独禁闭拘留,无法得到任何法律援助。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担心她可能遭到酷刑或虐待。

### 塔吉克斯坦

#### 紧急呼吁

529. 1993年3月29日,特别报告员为塔吉克斯坦国家电台和电视公司前主席 Mirbobo Mirrakhimov、全国电视前主任 Akhmadsho Kamilov、电视新闻记者 Khayriddin Kasymov 和 Khurshed Nazarov,向该国政府发出一份紧急呼吁。据报告,这些人在1992年12月10日政府部队开进杜尚别之后逃离塔吉克斯坦,但于1993年1月被临国的地方警察拘留(Mirbobo Mirrakhimov在土库曼斯坦Ashgabat(被拘留而 Akhmadsho Kamilov、Khayriddin Kasymov 和 Khurshed Nazarov 在吉尔吉斯斯坦 Osh, 被拘留,并被转交给塔吉克当局。据报告,他们都被指控“利用大众宣传媒介阴谋推翻政府”。根据报告,他们被关押在杜尚别内务部第一调查隔离监狱(Sledizolator 或SIZO),并在审讯中遭到毒打。据报告,结果Khayriddin Kasymov 鼻子和下巴被打裂,几颗牙齿被打掉,不允许Akhmadsho Kamilov睡觉或者让他长时间的坐着。据报告,这4个人都不得接受治疗或会见律师。

530. 1993年4月15日,特别报告员向该国政府发出的另一份有关Bozo Sobiron的紧急呼吁,他此人是一名诗人,在1992年11月之前他是反对派民主党的领导成员。他大约于1993年3月26日在杜尚别飞机场被检察官员逮捕。根据已经收到的材料,他被关押在内务部调查隔离监狱内,他不得会见其律师和家人。人们担心他可能遭到酷刑或虐待。

### 泰国

#### 紧急呼吁

531. 1993年6月25日,特别报告员为Maung Maung Than 和 Par Pa向该国政府发出紧急呼吁,他们是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难民署)承认的两名缅甸难民。据

称他们被泰国治安部队逮捕并被关押在曼谷的移民拘留中心。还据报告, Maung Maung Than于1993年5月19日在曼谷被捕并遭到毒打, 而Par Pa在这以后不久被捕。人们担心他们在拘留期间可能遭到酷刑或虐待。

532. 1993年7月8日和9月3日, 该国政府作出答复: 1990年, 泰国内阁出于人道主义的原由准予缅甸学生暂时留在泰国, 但条件是, 他们在泰国期间不得从事任何政治活动。1992年, 该国政府为缅甸学生建立了安全区, 为他们提供适当的住房、食物、医疗护理并能得到教育和培训。并向在泰国的外交界、难民署和私人组织简单介绍了对缅甸学生的人道主义政策和关于安全区的详细情况, 他们都同意, 在当前的条件下, 这为缅甸学生提供最好的保护和援助。尽管作了以上提到的种种努力, 一些缅甸学生没有申请留在安全区, 而仍然隐蔽在曼谷。一些缅甸学生团体公开表明他们在泰国时期将继续从事反对缅甸政府的政治活动。因此内务部不得不以非法入境的罪名逮捕和审讯那些不遵守有关他们可以留在泰国的条件的法律和规则的缅甸学生。据报告Maung Maung Than是缅甸全国海外学生组织的一名领袖, 该组织从事反对缅甸政府的活动, 并反对建立安全区的政策。他以非法入境的罪名被关押在移民拘留中心。1993年7月13日他自愿决定到安全区去。关于Par Pa案件, 内务部和难民署查阅了在泰国的缅甸学生的名单, 但未能查到名为Par Pa的人。另一方面, 移民官员表明, 他们并没有虐待拘留在移民拘留中心的任何人。此外, 泰国准予难民署定期探望被拘留在中心的缅甸国民。

### 多哥

#### 紧急呼吁

533. 1993年5月6日, 特别报告员代表下列人员向该国政府发出紧急呼吁: Latévi Prosper Lawson、Laté Jean Lawson、Jules Gagli、Rosali Gagli、Koffi Agbali、Sossouvi Afatchawo、Kossi amedegounou、Koudjo Atsu、Kodzo Akakpo、Kossi Assignon、Alphonse Adjeovi、Agbévé Toyo、Komi Kpetigo、Sévi Sadi、Antoine Aboudou、Kossi Fiagnon、Folly Fuegan Yao、Agbagnon、Tchassé Koumi Koffi Toyo、Ahamadou Boukari、Komi Hounkpati、Ekue Koulepató、Folly Ananou 和 Kokou Gakoto。根据所收到的材料, 这些人在1993年3月25日袭击Gnassingbe Eyadema总统官邸的若干天以后在洛美被捕。他们被捕后, 据报告, 他们被带至洛美宪兵队所在地, 据称, 他们在那儿遭到酷刑。

534. 关于此案件,该国政府通知特别报告员,现正在进行调查,以便确定在袭击“多哥陆军混成团兵营”中上述人员的责任。Latevi Prosper Lawson、Jules Gagli、Kossi Amedegounou、Kodjo Akakpo、Kossi Assignon、Antoine Aboudou、Ekué Prosper Koulepató、Folly Ananou 和 Folly Kuegan 已被释放。Rosalie Gagli 已被假释,以观后效。Alphonse Adjeoui、Agbévé Toyo、Kossi Fiagnon 和 Sossouvi Afatchauo 因偷窃罪而被逮捕。Komi Kpetigo 被指控走私毒品,警方或宪兵队不知 Jean Late 其人。

535. 该国政府的答复被转交给提供消息者,而它证实大部分被捕的公民后来被释放。但它指出,多哥当局似乎没有对被捕者遭到酷刑或虐待的指控作出任何答复,也没有对这些指控开始或进行任何调查。

536. 1993年9月3日,特别报告员为大约40名的一组人发出紧急呼吁,这组人据说因与总统选举结果公布之后发生的骚动有关而于1993年8月26日在 Agbandi 和 Diguine(多哥中部)被治安部队逮捕。据称这些人在被捕时遭到拷打,然后被送至 Blitta 宪兵队,在那儿他们被锁在一个用来关闭5名囚犯的牢房内。第二天,据报告其中15人死亡,据称后来又有4人死亡。还据报告,其中约20名被拘留者被转移至多哥北部的 Char 监狱。人们担心他们可能遭到酷刑或虐待。

537. 1993年10月7日,特别报告员为 Ketao 的一名教师 Kokou Okesson Mbooura 向该国政府发出了又一份紧急呼吁。据报告,此人于1993年8月27日在 Blitta 被捕,当时他正在寻找因8月底在 Agbandi 发生动乱受到牵连而于前一天被捕的一名家庭成员。据称他被单独禁闭在该国北部的 Kara 宪兵队,人们担心他可能遭到酷刑或虐待。

538. 1993年10月13日,该国政府通知特别报告员,一些人因破坏选举设备而于1993年8月26日在 Agbandi 被捕,并被带至 Blitta 的宪兵大队。Kokou Okesson Mbooura 是探访拘留者的人之一。8月26日同一天,其中一些人因食用了探访者带来的食品而中毒。Kokou Okesson Mbooura 因其给一名拘留者的食品中有注射器而被捕。根据一毒物学家所作的报告,注射器内含有非常危险的毒品。Sokode 的司法当局签发了拘留他的命令,他被带至 Kara 的民事监狱。他从来没有在法官面前提出关于虐待的申诉,并定期得到其妻子的探访。他还可以会见其律师。然而,他的律师并没有要求法官允许他去见其当事人。

539. 根据政府所提供的答复,消息来源指出,对警方试验室的调查结果没有发生争执,其主要关注的问题在于事实上对那些死者的尸体没有进行尸体解剖,既没有调查酷刑的指控,也没有确定死因。政府的答复未对关于拘留者死于酷刑、虐待或

他们40人挤在一个小牢房内而窒息至死的指控作出任何解答。似乎对这些严重的指控没有进行任何调查。

## 突尼斯

### 紧急呼吁

540. 在审查所涉期间,特别报告员向政府发出三份紧急呼吁,下面各段落将介绍这些呼吁。呼吁发出的日期列在相应摘要末尾的括弧内。

541. Abderrazak Hamzaoui,突尼斯大学学生,据报于1992年9月19日在突尼斯 Ben Arous区被捕,并被带至Kasserine警察局。在那里他据称遭到拷打,他的家人和律师无法前往探视。有人对他的健康状况表示担心,因为据称他幼年时曾患有骨髓炎,他的左腿骨因此而软化。(1992年12月18日)

542. 1993年1月28日,政府答复说,Abderrazak Hamzaoui因被怀疑属于一非法组织的一名激进份子而被捕,该组织主张暴力,并非法集会。检察部门同一天得知他已被捕。在随后进行的调查中,他承认自1986年起加入了AL-Nahdah运动组织。1992年11月1日,法院因其加入主张暴力的非法组织而将其判处一年徒刑,并因其举行非法会议而再将其判处三个月徒刑。法院还下令对其进行行政监督两年。Hamzaoui先生得到了辩护所需的一切法律保障。他在拘留和关押期间没有遭到拷打,更没有遭到虐待。另外,监狱和劳教部门还为他作了跟踪体检。1993年1月7日对他作了最后一次体检。医生随后签发的体检证明指出,Hamzaoui先生幼年时曾患骨髓炎,但在体检之时未患有任何疾病,身体也没有任何部位受伤。

543. 政府补充说,突尼斯拥护人权事业。突尼斯在这方面的成就是突出的。怀有敌意者提出的毫无根据的指称丝毫不会削弱这种同国际组织合作的承诺,也不会动摇这方面的这种决心。

544. Samir Moussa,留学生,据称于1993年7月25日在到达突尼斯机场时被捕。当他被扣押在机场派出所时,他的家人前往探望,探望时间很短。他在派出所被告知,这完全是一次例行检查,他很快会获释。然而,当特别报告员得知此案时,他据称仍被警方拘留着,拘留地点不详。(1993年8月23日)

545. 1993年12月6日,政府答复说, Moussa先生在被拘留48小时之后获释。他没有遭到秘密关押,也没有受到虐待。

546. Mohamed Tahar Badi据报于1993年7月28日在他住于Touzer、Deggache

的家中被捕。从那时起,他据称就被警方拘留,无法与家人取得联系。据了解到的情况,他的两个儿子和他的女儿上一年被判定犯有加入非法组织罪,所以, Tahar Badi 先生才据称多次被审问。(1993年8月23日)

547. 1993年12月6日,政府答复说,Badi先生于1993年8月25日被捕,同一天获释。他没有被长期拘留,也未遭受虐待。

548. Salaheddine Zikikout,在巴黎求学的学生,据报于1993年8月8日在到达突尼斯机场时被捕。从那时起,他据称被警方拘留,他的家人无法知道他被关押在哪里,也不知道他的健康状况如何。(1993年9月13日)

549. 关于此案,政府于1993年10月18告诉特别报告员,将 Salaheddine Ziki-kout逮捕凭的是总检察长签发的逮捕令。此人捕前据称加入了一个主张暴力的非法组织,并非法筹集资金。他被关押在突尼斯的一座非军事监狱,家人可以前去探望,他受到正常待遇,这些待遇不违反1988年的监狱条例。因此,在这方面所表示的担心是没有道理的。

## 土耳其

### 向政府转达的情况和收到的答复

550. 特别报告员1993年10月29日致函该国政府,信中说,据他了解的情况,一般刑事罪和政治罪嫌疑犯在全国各地的警察审讯中心常常遭到拷打,同时被关押,无法与外界接触。尽管法律规定被拘留者应当能够立即请律师,但实际上律师通常无法前去探望。还据称,法律规定,一般刑事罪嫌疑犯可因单项罪行被拘留24小时,因多项罪行最长拘留8天,然后须移交法院。但是,在实施紧急状态法的地区,政治罪嫌疑犯被拘留时间则长达30天之久。据有关人士称,这些情况是不断施以酷刑和虐待的一个主要因素。下面各段落提到的每个案件都通报给了政府。

551. Soner Önder,学生,17岁,在伊斯坦布尔被捕,在此之前,有人于1991年12月25日在伊斯坦布尔以非法的库尔德工人党(下称PKK)的名义搞了一次纵火袭击活动。据报他被带至伊斯坦布尔警察总部,在那里由反恐怖处对他进行审问,审问一直持续到1992年1月8日,这一天,伊斯坦布尔国家安全法院下令将其正式逮捕并送往 Bayrampasa 监狱。还据报,虽然他在称他加入了一武装组织并犯下了几项罪行的坦白书上签了名,但他是在双眼被蒙住,不知道坦白书的内容并遭受酷刑的情况下才这样做的。有人在此之前抽打他的脚底(falaka),对他进行电击,绑住他的双臂,然后

将他吊起来,并挤压他的睾丸。

552. Mehmet Gökalp, Derik人权协会代表,在参加完1992年2月25日在Derik为一名PKK成员举行的葬礼之后同其他几人一道被捕。他被带至Derik警察局,在那里据称有人将他的双臂反绑,然后将他高高吊起,对他施以电击,并用水管子朝他身上喷水。

553. Servet Sayan据报于1992年3月在伊斯坦布尔警察局总部第二刑侦处受审时遭受酷刑。有人将他的双臂绑住并把他吊起来,还用棍子打他的睾丸。1992年4月,他的家属向检察官正式提出控诉,之后,他家中有一人遭到警方的威胁。

554. Kadir Kurt于1992年4月19日在Diyarbakir附近的Bismil区的Birik村被捕,并被带至宪兵营营部受审。由于一根胸骨断裂,压迫肺部并引起内出血,他在同一天晚上死亡。他的兄弟, Davud Kurt据称也遭到酷刑,他的一只手和几根肋骨被打坏。据报他说,他的哥哥(弟弟)遭受到酷刑,有人将一根棍棒插入他的肛门。

555. Ramazan Sat于1992年3月24日在Batman被捕,因被怀疑窝藏PKK成员而受到审问,审问进行了12天。据报他遭到了酷刑,有人将他毒打,剥光他的衣服,将他双臂绑在一根铁杆上并把他升到空中;据报他的身体被人用水浇透,他的脚趾和阴茎遭到电击,有人将他的手腕反绑并把他吊起来。

556. Saadik Cilik、Nuray Erdem、Mehmet Karabulut、Nurdan Odabas、Serdar Akat、Attila Sabanci、Fatma Cicek(女)、Latif Tiftikci、Nuri Eryü-ksel、Etem Elma、Siral Demiral和Ayce Erdem,伊斯坦布尔Ortaköy文化中心的艺术家,于1992年8月24日上午9时在Zongdulak的Eregli莫名其妙地遭到逮捕,被关押在Zongdulak的政治警察局反恐怖处,不能与外界接触,一直到1992年9月2日。据报这些人在这段时间里遭受到多种酷刑,包括在手腕或手臂被绑住后被吊起来和电击等。Fatma Cicek据报遭受到falaka刑。

557. Fatma Gülten Sesen(女, Mucadele报所有人,犯人家属声援协会伊斯坦布尔分会主席)、Sultan Celik(女)、Ufuk Demirkaya、Solmaz Tartar(伊斯坦布尔Özgür-Der主席)、Gülay Tan、Yasa Güzel(Malatya Özgür-Der秘书长)和Aytem Celik,于1992年8月24日凌晨4时30分至5时之间在Adana附近的Karatas莫名其妙地遭到逮捕,被带至Adana派出所。有人称他们是Özgür-Der(权利和自由协会)或犯人家属声援协会这两个组织的成员的亲属。1992年8月30日,Adana检察部门下令将这些人释放。在此之前,这些人据报在手腕或手臂被绑住后被吊起来,遭到电击,脚底被抽打,并被迫躺在冰块上。

558. Ihsan Kurt于1992年10月11日被捕。当时他正在Adana为他的报社

(Öz-gür Gündem报) 拍摄照片, 采访一名被杀害的PKK游击队员的葬礼活动。据报他于1992年10月11日至19日被关在Adana警察总部, 不能与外界接触, 在这期间, 他受到多种拷打, 有人用警棍、木棍或枪托打他, 用脚踢他, 还用拳头打他。

559. 1993年2月20日, 保安部队在Sirnak省Güçlükönak附近的Ormanici村发起了一次行动, 在这过程中, 多数男村民被绑在一起, 蒙住眼睛, 并被命令前往几公里以外的Güçlükönak镇。有人将他们赶到该镇的一个靠近宪兵司令部的建筑工地上, 将他们看押起来, 他们在那里呆了12天。据报他们的衣服被剥得精光, 多次在零下好几度的气温下接受审问, 同时还受到各种酷刑。据称有人用冷水朝他们身上喷, 用棍棒和瓶子袭击他们; 有些人的脚趾甲和手指甲被人用钳子拔掉, 他们的食物被人掺上粪便。据称水泥地面被浇上了水, 村民们光脚站在地上很快就被冻住了, 更何况他们的脚底已经被打伤; 当他们躺下来睡觉时, 脚的两侧也被冻住了。许多人被严重冻伤, 冻伤部位随后形成坏疽。由于被冻伤Ibrahim Ekin的大脚趾只得锯掉, Resul Aslan的双脚大部分只得锯掉; 17岁的Fahrettin Özkan的全部脚趾都被锯掉; MehmetTahil Ceten的一条腿的膝盖以下部分被锯掉, 这些手术由Diyarbakir国立医院负责施行。据报Osman Ekincy遭到电击, 他的脚趾被人用钳子夹碎。Huseyin Yilairim据报被逼迫吞下人的粪便, 喝尿液和汽油, 他还被人绑住, 手脚被烧伤。

560. Hassan Kaya(医生)和 Meten Can, 律师, 人权协会Elazig分会主席, 于1993年2月21日在Elazig失踪。在此之前, Can先生接到一个自称是警察的人打来的电话, 说他的一位当事人卷入了一场车祸, 还说要他立刻向警察局报到。Kaya医生陪他一同前往警察局。1993年2月27日, 发现这两人死在Tunceli镇附近。据报两具尸体都拷打和肢体残缺的迹象, 两人的手都被反绑着, 身上有被香烟烫伤的痕迹, Kaya医生的双眼已被挖掉, Can先生显然遭到过电击。

561. Ibrahim Dicek于1993年3月20日在Mardin省的Baristepe村被捕, 10天后在一口井发现了他的尸体。据称检察官的报告说, 尸体上到处都有拷打的痕迹, 双臂上的印记表明死者曾被人用绳子绑住在地上乱拖过; 肛门区被戳破, 表明作为一种酷刑手段, 曾有硬器被插入。据称尸体解剖表明, 死亡原因是头部被钝器击伤, 致使呼吸和血液循环停止。

562. Gülan Yavuz, 安卡拉大学的女学生, 因涉嫌参加称为Devrimci Sol的非法武装组织, 于1993年4月18日在安卡拉的Ekin艺术中心同一大批人一道被捕。据称她被带至伊斯坦布尔警察总部, 在那里据称有人用加压冷水朝她身上冲, 抽打她的脚底, 将她强奸, 把她吊起来, 还对她施以电击。

563. Irfan Ortakci在与Gülan Yavuz相同的情形下被捕。据说他曾两次被双

手反绑着吊起来,还有人用冷水和发烫的水朝他身上冲。他的性器官被人拉扯、挤压和抽打。

564. Tulay Cakmak, 高中女学生, 同上述两人一道被捕。据称她被人吊起, 施以电击, 身体被人泼上冷水。另一名女学生, Eylem Kaya, 遭到毒打, 身体被水浇透, 有人对她扬言: 要使她以后无法生孩子。

565. Hasan Durna、Cafer Oral、Ayhan Uzala和Nurettin Topuz因涉嫌参加一个非法武装组织, 于1993年5月6日被捕。据报他们被关押了14天, 不能与外界接触, 在关押期间, 他们遭到多种酷刑, 遭到电击, 并且被人反绑着双手在地上乱拖。

566. Mehmet Kiran于1993年6月17日在Mardin省Mazidagi附近的Atala村被士兵逮捕, 并被带至Derik的警察局接受审问。由于受到虐待, 他的一条手臂被打断。

567. 1993年6月21日, 在Diyarbakir省Cinar附近的Orasar村, 据报士兵和特别行动队成员殴打男女村民, 命令他们脸朝地躺下, 不准乱动, 否则就把他们打死。接着, 据称这些人开始用枪托殴打村民, 用烟头烫他们, 并用连接着装甲车的电线对他们施以电击。据报这些虐待行为持续了一整天。

568. Siddik Katan于1993年6月在Batman的Kozluk附近的Gumusorgu村被捕, 在警察总部关押了14天, 据说由于在关押期间遭到拷打, 他的一只脚骨折。

### 紧急呼吁

569. 另外, 特别报告员替一些据了解到的情况可能遭受酷刑的人发出了17份紧急呼吁。这些呼吁的摘要转载如下。呼吁发出的日期列于相应摘要末尾的括弧内。

570. Kamil Mustak、Bahattin Mustak、Mehmet Mustak、Adbullah Madak (65岁)、Ahmet Baglan、Mehmet Balgan、Cafer Diri、Mehmut Diri和MehmetDiri据称于1993年2月17日在Sirnak省的Yesilyurt村被行使警察职责的士兵逮捕, 在场的还有一些便衣警察。这些人包围了村庄, 挨家搜查枪枝。(1993年3月29日)

571. 关于Kamil Mustak、Bahattin Mustak和Adbullah Madak的情况, 政府答复说, 这几个人是涉嫌与PKK恐怖组织有联系而被捕的。根据Cizre检察机关的授权书, 他们被拘留, 一直到1993年3月3日, 这一天, 他们被带见Cizre的检察官。Cizre的检察官将这几个人交给Cizre治安法院, 法院在经过盘问之后决定将他们释放。随后, Diyarbakir国家安全法院的检察机关认为, 不存在提起诉讼的根据。



572. 关于 Ahmet Baglan、Mehmet Balgan、Cafer Diri和 Mehmet Diri的情况,政府答复说,这几个人在警方在Cizre的Yesilyurt村执行了一次行动后被捕并拘留的。根据Cizre检察机关的授权书,他们一直被拘留到1993年3月31日。同一天,他们被带见Cizre的检察官,随后提交Cizre治安法院,检察官请求将他们拘押。法院在盘问后决定将这4名嫌疑犯拘留,原因是这4人被控参加PKK组织,为该组织开展活动并向其提供协助。1993年3月2日,治安法院将案卷转给Diyarbakir国家安全法院。这4名嫌疑犯于1993年4月19日获释,法院于同一天裁定他们无罪。

573. 关于Mehmet Mustak,政府说,他于1993年3月17日被带见Cizre的检察官,并于同一天提交Mardin治安法院,法院决定将他拘留,并将案卷转给Diyarbakir国家安全法院的检察机关。检察机关在经过调查后提起公诉,指控被告“参加PKK恐怖主义组织”。此案仍未了结,不过该嫌疑犯已于1993年5月4日被释放。

574. Hasan Durna、Cafer Oral、Gültekin Gölçek、Ozcan Ozgen、SaimeBölügiray(女)、Duzgün Gök、Nurettin Topuz和 Ayhan Uzala在警方于1993年4月22日在伊斯坦布尔发起的一次行动中被捕,被关押在伊斯坦布尔警察总部的反恐怖处,不能与外界接触,无法请律师。检察官据报允许警方将这几个人拘留到5月7日。(1993年5月4日)

575. Cahide Sener和Murat Sener据称于1993年6月12日在伊斯坦布尔Yildizbakal、Samfistik sok、Birlik apartman 2号被警方逮捕。据报他们被关在Terörle Mucadele Sube的Gayret Tepe监狱,据目击者说,他们遭到严刑拷打。(1993年6月15日)

576. 1993年10月29日,政府答复说,上述人员已分别于6月24日和26日获释。这些人从未提出声称他们遭到拷打的申诉。

577. Aysu Baykal(女)、Mehmet Ali Beyhan和Sevinç Sahingöz:前面两人据报于1993年6月5日在安卡拉Sincan区被警方逮捕,Sevinç Sahingöz则是被从Yozgat带至安卡拉的。据报这几个人都被关在安卡拉警察总部的反恐怖处,国家安全法院检察官同意将这几个人关押到6月18日。据称他们在关押过程中无法与外界接触,无法请律师。(1993年6月17日)

578. 政府就这几个人的情况答复说,这几个人因涉嫌与恐怖主义组织有联系而被捕的。司法机关在进行审问之后对Mehmet Ali Bayhan和Aysu Baykal签发了拘留令,同时下令释放Sevinç Sahingöz。拘留期间,这两个人从未遭受过虐待。

579. Türkan Balaban、Gülay Yücel、Meral Yucel、Zeynep Arikan、NeclaCan、IlkerAlcan、Tuncer Bagdatlioglu、Fatma Gülten Sesen、Kamil

Gülbag, Kudret Sarigul, Ethem Elma, Ali Ibrahim Soganci, Meltem Onder, Solmaz Artat, Mehmet Demir, Kemal Isik, Tarik Tolnay 和 Savas Dörtüyol 据报在警方于1993年6月21日下午在伊斯坦布尔发起的一次行动中被捕。据报检察机关同意将这些人拘留15天。Ethem Elma, Savas Dörtüyol, Methem Onder 和 Gülay Yücel 据说由于遭受酷刑身体状况极差。(1993年7月5日)

580. 1993年8月16日,政府答复说,1993年6月21日,《Devrimci Cözüm》周报#^A00报社遭到5个身份不明的武装人员的袭击。在袭击过程中,报社内的 Cafer Girit-li, Ozgür Akbulut, Nurcan Güzel, Erkan Yalçın, Gülay Kahraman 和 Onder Dursun 等人受伤。有关方面对这次事件作了调查,警方就此发起了行动。在这些行动过程中,上诉中所述的嫌疑犯被逮捕并拘留。在进行审问之后,法院将这些人释放了。现已证实,这些人在拘留期间没有遭受任何形式的虐待。

581. Ramazan Kiran, 其父 Mehmet Kiran, Vahap Celik 和 Izzetin Celik 据说于6月17日在 Mardin 有 Mazidagi 附近的 Atala 村被捕,并被带至 Derik 警察局接受审问。据说 Mehmet Kiran 由于身体状况恶化,一条手臂骨折而被转到 Diyarbakir 国立医院,据称他在此之前遭受了酷刑。(1993年7月5日)

582. 政府就这几个人的情况答复说, Mehmet Kiran, Vahap Celik 和 Izzetin Celik 没有被拘留。Ramazan Kiran 和 Abdulvahap Ceri 于1993年6月14日被 Mardin 的警方逮捕并拘留。Ramazan Kiran 在接受审问时交代说,他参与了 PKK 恐怖组织的活动,参与了一次谋杀活动,还参与了武装袭击 Atalar 乡乡长的住宅的活动。Ramazan Kiran 和 Abdulvahap Ceri 于1993年7月8日接受司法机关的审理,根据司法裁决,被关押在 Mardin 监狱。关押期间他们没有遭到任何形式的虐待或酷刑,审理是依法进行的。

583. Ramazan Malgir, Hasan Temiz, Nurettin Temiz 和 Halef Bortas 于1993年6月12日同一些村民一起被捕。在此之前,保安部队对 Diyarbakir 省 Ortasar 村进行了一次搜查。在两位村民第二天获释,回到村里,据说身体状况极差,据称他们遭到了拷打。余下的人据说被关在 Diyarbaki 警察总部,不能与外界联系,有人担心可能会对这些人搞刑讯逼供。(1993年7月5日)

584. 政府就这些人的情况答复说,这些人由于涉嫌替 PKK 开展活动和为该组织提供帮助而被拘留。国家安全法院对这些人作了审理,决定将其关押。这些人没有受到任何形式的虐待或酷刑,审理是依法进行的。所涉行动之后没有其他人被拘留。

585. Mehmet Keklik 据说于1993年5月27日在 Alçiçekköyü (他本村,靠近

El-bistan)被警方逮捕,一起被捕的还有邻村其他6人。他现被关押在Malatiya国家安全监狱(Devlet Güvenlik Mahdemesi)。据称前去探望他的一位亲属说,MehmetKeklik遭到了毒打,他的脸已经难以辨认。(1993年7月13日)

586. 《Özgür Gündem 报》的记者 Nezhahat Özmen 于1993年7月16日在Mardin 被捕。据报,在拘留期间,尽管她怀有七个月的身孕,但仍遭到虐待,结果于1993年7月19日被送往医院就医。虽然她需要持续治疗,但据称警察赶到医院,坚持要带她去法院,将其正式逮捕。后来,她被关在Mardin 监狱。(1993年8月2日)

587. 政府于1993年9月22日答复说, Nezhahat Özmen 因提出不实指控与冒犯和污辱警察行为而于1993年7月19日被警察收押,她同日写了供词,并见了政府检察官。政府检察官立即将她交由Mardin 治安法院处理。法院于1993年7月19日裁定应将其拘留。在将 Nezhahat Özmen 送往司法机关前,因听说她身体不好,对她作了两次医检。据诊断,她身上并无伤痕或被打的痕迹,她本人也没说患有任何疾病。1993年7月19日,记录了她的供词,此后,她说她已有六、七个月的身孕。得知这一情况后,她被立即带去见适当的医生。同一天,在考虑了她的情况后,对她作了审判。

588. 1993年8月18日,警方搜查了Mersin 的《Mücadele 周报》报社并据称逮捕了该家报社的记者 Ahmeh Ibili。据说当时 Ahmet Ibili 拒捕,警察按住他的头往地上撞,直到他昏死过去才住手。据报,他被带到Mersin 警察局,据目击者称,他在那里遭到严刑拷打,警察威胁要杀他,此外,还不准他喝水。(1993年9月1日)

589. 政府于1993年11月23日答复说,该人是于1993年8月17日被拘留的。司法部门在进行审问后签发了拘留证。病历表明,他在拘留期间并未遭到拷打。

590. Kelekçi 村的 Abdullah Ay 和 Semsettin Ay; Kayikli 村的 Mehmet Tekin、Ömer Ünal 和 Mecit Memic: 据报村保安队和军人于1993年7月27日在Mardin 省土叙边境附近的 Kelekçi、Güneqli 和 Kayikli 村焚毁房屋,据说这是为了报复拒绝参加村保安队的村民。村民们当时被赶走,后来他们又回到原地,试图重建家园。8月30日,邻近 Altinoluk 村的村保安队与一宪兵队(在农村地区执行警察任务的士兵)一道再次来到这些村庄,他们召集起村民,勒令他们离开,并威胁说,如果不照办的话,他们就焚毁所有的房屋,并杀掉留下来的人。他们后来带走了上述五位人士。据报 Omer Unal 被关在村保安队队长的家里,其他人则被宪兵队关在Altinoluk村的学校校园中。另外,据报他们都遭到了拷打。(1993年9月14日)

591. 据报有下述人士被秘密囚禁在伊斯坦布尔警察总局反恐怖处中:

(a) Memik Horoz 和他的太太 Sezemis 据报于1993年9月17日在伊斯坦布尔政论杂志《Partizan 》办事处中被捕。据报 Sezemis Horoz 在被

关押期间胳膊被打断。

- (b) Ismail Yilmaz、Ulku Daricioglu 和 Ethem Cilgin 据报于同日在伊斯坦布尔的家中被捕。Ahmet 和 Mehmet Polat 据报于9月20日在伊斯坦布尔的家中被捕。
- (c) Fethiye Peksen、Alisan Yalcin、Harun Kartal、Ibrahim Dogus、Özlem Bilgin、Erkan Koc、Yesim Taciroglu、Perihan Sürücü、Mehmet Emin Yildirim、Kamil Kayan、Erdoman Aktas、Bekir Yazici、Aydin Yigit、Kemal Metin Sozeri、Murat Urekrsoy、Ercan Yesil、Yusuf Büyükdag 和 Sevim Yagan。据报这18个人是在始于1993年9月17日的(伊斯坦布尔警察搜捕行动中被捕的。他们被控为非法武装组织 Devrimci Sol 的成员。(1993年9月30日)

592. 政府于1993年11月26日答复说，Fethiye Peksen 和其他16个人是警察在伊斯坦布尔对 THKP/C-dev-Sol 这一恐怖组织采取行动时被捕和被拘押的。后来，司法部门释放了3人，但决定继续关押其中的14人。既未虐待这些人，也未阻止他们与家人和律师接触。

593. 还收到了关于有九人被捕并被秘密关在土耳其东部Van警察局的材料，这九人是：Rukiye Seker、Sevda Seker、Ercan Seker、Adnan Seker、Sevket Aslan、Baris Karaagar 和 Iskender Elter。据报他们是于1993年9月14日在家中被捕的。Fuat Atalay 和 Cahit Ece 据报于1993年9月17日下工时被捕。(1993年9月30日)

594. 政府于1993年11月26日就这九人的案件答复说，这些人是因涉嫌协助PKK、为该组织执行杀人任务和试图烧掉一所学校而于1993年9月18日被捕和被拘留的。对他们进行审讯后，把他们交由司法机关处理。法院裁定应继续关押 Boris Karaagar、Sevket Aslan、Iskender Elter、Fuat Talay 和 Cahit Ece。病历表明，他们在被警察拘留期间未受虐待。

595. Behçet Ekinçi 于1993年9月21日在 Diyarbakir 的家中被 Diyarbakir 警察局反恐怖处人员逮捕。据报警察在此后的三天中一直守在他家中，拘留了所有去他家的人。第二天晚上，大约与前天晚上差不多的时间，据称警察押着遍体鳞伤的Behçet Ekinçi 回来搜家，在他家中四处搜索爆炸物，但一无所获，后来又把 Behçet Ekinçi 带回警察局。(1993年10月4日)

596. 关于居住在德国的土裔库尔德族翻译 Nilufer Koc 案：据报，她于1993

年9月25日与不来梅一信息服务处的四名同事一道去土耳其,担任前往土耳其东南各省开展研究工作的这四名同事的翻译。据报他们于9月29日在 Sirnak 省 Uludere 处被保安部队逮捕,当夜被关在村保安队一队员的家中。据报他们于第二天被军人押送到 Sirnak,先由警察关押,后由宪兵看管。有关方面当时把 Nilufer Koc 与其同事分开关押,后来这些同事都已获释。据报 Nilufer Koc 被关在 Sirnak 宪兵总部。(1993年10月8日)

597. 据报 Kerim Yilmaz、Nurettin Aslan、Önder Dilek 和 Ahmet Günes 于1993年10月2日在 Elazig 的家中被警察和“特警队”(即用于勘乱的全副武装的武警)逮捕。据说他们被关在位于 Elazig 处的 Binsekizyüz Evler 警察侦讯科。据报不准家人与该名被拘留者见面。(1993年10月14日)

598. 政府于1993年11月26日答复说,Ahmet Günes 和 Kerim Yilmaz 因被控与PKK 勾结而分别于1993年9月28日和10月2日被捕。司法机关已于1993年10月6日下令释放他们。在拘留期间,没有虐待他们,也未禁止他们与家人接触。

599. Mehmet Sirin Ogunc、Hakim Ögünc、Zeki Ögünc、Hüseyin Ugurlu、Sami Duygu 和 Hüsamettin Duygu: 据报 Gokyazi 保安处的宪兵于1993年10月2日在 Mus 省 Altinova 地区搜查据信匿藏在该地的一名负伤的PKK游击队员。交火中,该名游击队员和一名宪兵同归于尽。宪兵们后来撤出了这一地区,但又于10月3日凌晨3时许返回该地,焚毁了若干房屋。宪兵们还将男人们赶到镇外的空地上,由宪兵队一名负责的人训话,然后,他们带走了上述人士。(1993年10月14日)

600. 据报 Sanliurfa 警察局反恐怖处人员于1993年10月20日凌晨拘留了 Viransehir 民主党领导小组成员 Mehmet Caki 和他的妻子及其刚满五个月的婴儿,他们还同时拘留了前去 Viransehir 拜访该家人的 Mehmet Delen。第二天,Mehmet Delen 和 Saime Caki 获释,但他们担心 Mehmet Caki 遭拷打,因为 Saime Caki 曾听到她丈夫的呼叫声。另有两名获释者报告说,他们曾在警察局看到 Mehmet Caki,并看到他脸部明显瘀肿,手上和脸上都有伤痕,人显得疲惫不堪。(1993年10月29日)

601. Meral Bestas Danis、Mesut Bestas、Sabahattin Acar、Baki Dmirhan、Hüsniynie Olmez、Sinasi Tur 和 Arif Altinkalem 于1993年11月15日和16日被捕,被捕者都是与 Diyarbakir 的人权协会合作的律师。据报他们被警察秘密囚禁。(1993年11月19日)

602. Ömer Celik、Hüseyin Ogurlu、Cemil Ögut、Ethem Baysak 和 Abdurahman Elçi 于11月18日夜在土耳其东南部 Mus 省 Altinova 被保安部队逮

捕。另一位居民 Mahfuz Elçi 同时被捕并遭拷打,几小时后获释。(1993年11月24日)

603. 除了在1993年11月19日呼吁中提到的律师外,特别报告员还收到了关于另外两名律师 Vedat Erten 和 Tahir Elci (Cizre人)的材料。此外,据称还有一名律师 Niyazi Cem 于1993年11月23日被伊斯坦布尔国家安全法院的反恐怖警察逮捕。(1993年11月30日)

#### 政府就以前报告所提案件转交的资料

604. 据报 Celal Meral、Ziya Ulusoyl 和 Mehmet Ustundaj 于1992年11月在伊斯坦布尔被捕。1992年11月19日特别报告员就这些人以及其他人的案件发出紧急呼吁。政府于1993年1月11日通知特别报告员说,这些人以及其他19人是在1992年11月5日警方在伊斯坦布尔对 TKP/C 恐怖组织采取行动时被捕的。经审讯,于1992年11月20日囚禁了包括上述人士在内的七人,主审法院决定释放其他15人。他们在被警察拘留期间,未受任何虐待。

605. 1993年1月12日,政府就特别报告员于1992年9月16日转交的下述各段中的案件作了答复。

606. Mehmet Rauf Yildiz、Murat Günes、Ibrahim Burakmat 和 Mehmet Hanifi Eser 据报于1991年11月3日在 Diyarbakir 被捕。政府答复说,他们是在1991年11月12日被警察拘留的,原因是涉嫌参与恐怖组织 PKK 的活动。法医的医检报告证明,这些人身体很好。

607. Mithat Kutlu 据称于1992年4月18日死于 Diyarbakir 拘留地。政府称,他在1992年4月18日在 Bismil 参加非法游行示威时被人挤伤,伤势严重,后在 Diyarbakir 医院因伤势过重,不治而亡。已有验尸报告。

608. Menice Kirtay 据称于1992年6月19日在 Diyarbakir 地区 Silvan Mescit 被捕。政府称警察未拘留此人, Diyarbakir 医院也无关于此人的任何记录。

609. 据报 Sükrü Yılmaz 于1992年3月4日在 Besiri Sagosele 被捕。政府称, Besiri 的法医在1992年3月13日对他作了检查后报告说,他没有看到任何伤痕。但该名法医在1992年3月14日却报告说,他身上有伤痕。Sukru Yilmaz 从未就待遇问题提出过申诉。

610. 关于这一答复,有人告诉特别报告员说, Sükrü Yılmaz 曾于1992年3月

16日向 Batman 地方公共检察官提交了一份详尽描述受刑情况的申诉书(有影印件为证)。他可能因受到过大压力而在 Besiri 地方检察官面前被迫更改了原先的申诉。

611. Bisenk Anik (16岁)据称于1992年3月25日在警察拘留期间死于 Sirnak。政府称,她在被警察拘留期间持枪自杀。

612. 据称于1992年5月14日在 Sirnak 遭拘留的 Sekvan Aytuq 案:据政府称,他于1992年5月25日在 Sirnak 被捕,并称,经查证,此人在被警察拘留期间未遭任何虐待,其间也无人探视过他。

613. 据报 Abdullah Arisoy、Sait Arisoy、Halir Arisoy 于1992年6月30日在 Cizre 被捕。政府称,他们在警察拘留期间从未遭受任何虐待。他们散布谣言的目的是影响和欺骗法院和公共舆论。

614. Ali Komak、Erdal Cecit、Ahmet Dagli、Abdulkadir Bingöl、Abdurrahman Aksoy、Abulhamit Tanriverdi、Emin Sores、Mahmut Kirmizigül、Faruk Sakik、Abdullah Yasin、Salih Baykara、Yusuf Sen、Aziz Sen、Nimet Elki、Ihsan Ogan 于1992年7月在 Cizre 被捕。政府称,他们是因参加 PKK 这一恐怖主义组织而在 Cizre 被捕的。他们于1992年7月4日被转到 Sirnak。已对他们提起了法律诉讼。Aksoy、Dagli、Cecit 和 Bingol 于1992年7月8日在 Cizre 获释。

615. Yusufhan Zorba、Mehmet Sirin Zorba、Senar Turqut、Muhittin Aksin Sakir、Kanat、Cemal Kocak、Hüseyin Karakoyun、Sehmuş Karakoyun、Hayrettin Yacan 和 Salih Bagi 据称于1991年9月在 Van 被捕。政府称, Mardin 医院的检查报告表明,这些人在警察拘留期间未遭任何虐待或拷打。此外,他们及其近亲都未向法庭提出任何这类申诉。

616. Ibrahim Turk 据称于1991年5月6日在 Diyarbakir 地区 Bismil 处被捕。政府称,有关医检表明,他未受任何伤害。

617. 据报 Erdogan Kizilkaya 于1991年8月4日在 Kayseri 被捕。政府称,有关医检表明,他并未受到任何虐待。

618. Fahri Tirpan、Haydar Emrah、Goskun Kilickaya、Bektas Ozkan、Ali Azkan、Gazi Koksall、Ali Haydar Emre 和 Ercan Karafas 据报于1992年1月10日在安卡拉被捕。政府称,医检报告表明,他们在拘留期间未受到任何虐待。

619. Nazli Top 据报于1992年4月在伊斯坦布尔被捕。政府称,伊斯坦布尔法医学院的检查报告表明,他未受任何伤害。

620. Omer Ozaslan 据报于1992年5月1日在 Zonguldak 被捕。政府称,医检报告表明,他在拘留期间未遭任何虐待。

621. Ismail Yilmaz 据报于1992年6月27日在伊斯坦布尔被捕。政府称,由于收到申诉指称他遭到拷打,已对据说卷入此案的Yedikule警察局的三名警官提起诉讼。

622. Hüseyin Aten 和Salih Yilmaz据报于1991年1月在 Bilican(Kavsakli)被捕。政府称,酷刑指控是没有根据的。他们并未在据指称的日子被捕,Bilican村的村民也不认识他们。

623. 据报Ali Kesan(16岁)于1992年3月在被警察拘留期间死于Diyarbakir。政府称,酷刑指控是毫无根据的。Diyarbakir 封闭式(即E类)监狱未关过此人,也没有叫此姓名的人死于该监狱。

624. Kadir Kurt 据报于1992年4月19日在 Diyarbakir省Diyarbakir-Bismil地区被警察拘留期间死亡。政府称,酷刑指控是毫无根据的。该人是在政府军与PKK这一恐怖主义组织在Bismil地区Agilli村中发生武装冲突期间中弹身亡的。Diyarbakir国立医院的验尸结果表明,他是被枪打死的,身上没有遭受过拷打的痕迹。

625. 据报 Abdulrakip(Refik) Akin 于1992年1月29日在 Mus 省 Korknt地区被捕。政府称,酷刑指控是毫无根据的。他无缘无故地跌倒在地,不省人事。Mus 和 Elazig国立医院作了抢救,但他未能苏醒过来,三天后死去。Mus省检察长下令作了验尸。他死于脑震荡,身上没有曾遭拷打的痕迹。

626. Mehmet Celik 据报于1992年1月9日在 Batman 省 Batman-Kozluk 被捕。政府称,他是因据称协助和匿藏PKK恐怖主义组织成员而被捕的。他后来对这些事实供认不讳,他说他是在没有任何压力的情况下交待的,他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后悔。1992年12月13日的医检报告表明,他身上并无任何被打或被击的痕迹。

627. Hassan Güldal 据报于1992年6月死于 Artvin 省宪兵队队部。政府称,酷刑指控毫无根据。死者生前是恐怖主义组织TKP-ML-TIKKO的成员。他在被捕后开始绝食,后死于胃出血。在Artvin省检察长在场的情况下作了验尸。他身上没有任何曾遭酷刑的痕迹。

628. 据报 Tahir Seghan 于1992年4月11日死于 Mardin 省Mardin-Dargecit地区。政府称,酷刑指控是毫无根据的。经查明,他被捕的原因是,他为恐怖组织PKK设立“人民法院”并对此恐怖组织提供后勤协助。在被警察拘留期间,他故意跌倒,在水泥地上碰伤了头。他被送到国立医院,医生对他进行了抢救,但因抢救无效,死



于Diyarbakir国立医院。Diyarbakir国立医院的验尸结果表明，他死于头部撞击水泥地面引起的脑震荡。经查明，身上没有曾受过酷刑的痕迹。

629. 1993年1月11日，政府向特别报告员提供了关于土耳其大国民议会于1992年11月18日批准并于1992年12月1日生效的《第3842号法令》的情况。据报该项法令修订了《刑事诉讼法》和《国家安全法院的设立和审判法》的一些规定。该项法令还宣布取消了《警察职责和权力法》和《反恐怖法》的某些规定。政府称，该项法律为防止酷刑和虐待规定了有效措施，并就辩护权作了重要修改。

## 意见

630. 特别报告员对最近通过的修订案表示欢迎，认为这些修订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和和在紧急状态区以外涉嫌犯有普通罪行者遭受酷刑问题。特别报告员也意识到PKK以及其他武装反对团体的暴力行为和往往十分残酷的行动对当局造成的困难。但特别报告员及其前任多年来收到的材料也确实令人关注，禁止酷刑委员会根据《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第20条进行的调查表明，在土耳其“存在着一贯施行酷刑的做法”（A/48/44/Add.1,第58段）。他还和该委员会一道，希望土耳其政府“将采取有力的有效措施，迅速...根除酷刑做法”（同上，第59段）。为此，特别报告员赞赏该委员会调查总结中的各项建议。

## 政府根据第1993/48号决议提交的材料

631. 政府在1993年11月15日递交人权委员会各特别报告员和工作组的普通照会中送交了关于库尔德工人党恐怖主义行为的六份情况说明。根据这些情况说明，在1993年1月1日至10月15日期间，共有879名平民（其中包括107名妇女和104名儿童）丧生。此外，还有889人（其中包括129名妇女和71名儿童）在此恐怖组织袭击平民的行动中受了重伤。说明材料详细阐述了若干此类事件。

## 南斯拉夫

### 向政府转达的情况和收到的答复

632. 特别报告员于1993年11月18日提请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注意他所收到的

关于据报塞尔维亚复兴运动主席 Vuk Draskovic 及其妻子 Danica Draskovic 于 1993年6月1日在贝尔格莱德被捕后被警察打成重伤案件的材料。据报贝尔格莱德大学医学院一组教授自6月14日起对他们作了为期一周的检查,结果表明Vuk Draskovic 患头痛、失衡、失眠和听力受损等病,这都显示他大脑和颅骨受损,而且病情还有可能进一步恶化。他们的检查结果还表明。Danica Draskovic 脊椎受损。他们认为,这两人都是被人用钝物反复狠打致伤的。这对夫妇于1993年7月9日获释,但由于身体很坏,留在贝尔格莱德精神病院治疗。

633. 政府于1993年12月14日答复说,探视过这对夫妇的家人并未说他们负了重伤,也未说他们反对目前的治疗或任何其他待遇。

634. 特别报告员于1993年10月13日就 Muhamet Hamiti 一案发出紧急呼吁。Hamiti 是作家兼教授,于1993年10月12日上午11时许在科索沃 Pristina 一私宅讲完课出门时被警察逮捕。鉴于曾有报道表明,阿尔巴尼亚族师生经常遭短期拘留并在受审时遭拷打或虐待,因此担心 Hamiti 先生遭受这样的待遇。

635. 政府于1993年11月4日就此案答复说,从未对叫 Muhamet Hamiti 的人提起刑事或侵权行为诉讼,而且,自1993年10月12日起,地区监狱也未囚禁过叫此姓名的人。

#### 政府就以前报告所提案件转交的资料

636. 政府于1993年1月19日向特别报告员提供了下述各段提到的特别报告员于1992年8月21日转交的各项案件情况。

637. 律师 Marco Mikela 于1991年10月31日从 Pec 前往 Sutpe 村时被捕后死去。政府称,1991年10月31日, Pce-Stupe 路上的交通巡警命令 Marko Mikela 停车。他拒绝出示证件,还打伤了一名警察,后来他想夺其中一名警察的自动枪,被警察推倒在地。他身上有几处地方被抓破,有点伤痕。Marco Mikela 在警察局感到身体不适,因此被立即送到 Pristina 神经手术诊所,后死于该诊所。验尸的医生说, Mikela 死于自然原因。警察出于正当防卫对 Narco Mikela 和车中的另一名乘客使用了武力,但并未在警察局对他们使用武力。

638. 住在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籍难民 Ali Hadziija 被警察逮捕,并被带到 Urosevac, 后于1991年11月25日死亡。政府称,警察是持 Urosevac 市轻罪法院签发的逮捕证将其逮捕的。第二天, Hadziija 被带到 Pristina 地区监狱,后来死于狱中。Pristina 医学院法医研究所的验尸结果表明,他死于心脏病。在地区监狱拘留

期间, Ali Hadzija 没讲自己的健康状况。

639. 《Bujku》杂志社的记者 Rifati Redzep 和 Urosevac 市附近 Kamena Glava 村小学校长 Selim Djizimi 据报于1991年11月在 Urosevac 警察局被拷打。政府称他们被抓到警察局的原因是,他们在位于 Kamena Glava 的“Fazli Obradza”小学举办了庆祝阿尔巴尼亚国庆节的活动。在庆祝活动中,首先奏了阿尔巴尼亚国歌,在场的人演唱的歌曲和朗读的诗词具有敌对的民族主义色彩。Selim Djazimi 因举办这一庆祝活动被判40天的徒刑,而 Redzep Rifati 仅受到审讯。关于对他们使用武力的指控纯属无稽之谈。

640. 据称 Rustem Sefedini 于1991年10月在 Urosevac 遭警察毒打。政府称,关于虐待的指控是没有根据的。该人因组织学生、家长、教师以及阿尔巴尼亚族的其他人抗议教学计划而被带到警察局。市法院因他组织未经授权的游行、诬蔑当局和干扰公民的正常生活判处他60天徒刑。

641. 据报 Ismet Krasnici 于1992年1月29日在 Pec 警察局被打。政府称, Krasnici 先生跟着一群阿尔巴尼亚族人冲进位于 Pec 的“Dzemaal Kada”小学大厅,用塞尔维亚语喧哗吵闹,干扰了学生上课。Krasnici 先生污辱该所小学的校长,还想动手打他。Krasnici 先生并未挨打,有关方面正因他行为不轨而对他进行审判。

642. 据报 Avdimetaj Amrusen 于1991年10月在 Pec 挨了警察的打。政府称,由于他未经许可即在家里开办了阿尔巴尼亚语学校而受到审问。1992年10月3日,警察发现他家有一群学生,但并未对任何学生使用武力。

643. 据报 Enver Sinani 于1992年1月3日在 Magura 警察局被打。政府称, Sinani 先生因非法拥有武器而受警察审问。后来,他自愿交出了枪和弹药。已对他提起了诉讼。未对他用武。

644. Pec 附近 Vranovci 地区的学生 Daut Krasnici 据报于1991年10月挨了警察的打。政府称,警察在 Pec 街上拦住他,要求他出示身份证,但他态度傲慢拒绝出示身份证。他因蔑视警察被判处20天徒刑。

645. 据报 Muja Faruk (12岁)于1991年4月在 Magura 挨了警察的打。政府称,他因涉嫌犯有严重盗窃罪而于1992年2月被带到警察局。他在被捕不久后即获释放。未对他用武。

646. 据报 Mentor Kaci、Sokolj Dobruna 以及其他于1991年12月在 Pec 监狱遭到虐待。政府称,这些人是地下敌对组织“阿尔巴尼亚族抵抗和民族解放阵线”(即“阿尔巴尼亚族民族阵线”)的成员。他们受到警察审讯并被起诉,后来交

由 Pec 地区法院的法官审理。关于他们遭受虐待的指控, Pec 地区法院的医疗记录表明,他们曾因喉咙疼痛以及类似疾病而就医。

647. 据报 Zenun Djelaj 和 Ibrahim Osamni 于1992年6月20日在 Peja 附近的警察检查站被捕。政府称,他们是被在 Pec 至 Pristina 公路上执行例行交通管制警察拦住的。他们的车里藏有歌颂阿尔巴尼亚、取笑塞尔维亚领导人和主张建立“科索沃共和国”等宣传材料。警察局在审问后将其释放。未对他们使用任何武力。

648. 政府还报告说,没有关于对 Decani 附近 Restovici 地区的 Ali (Redzep) Kadrijaj、Pec 地区的 Fadil Kraljani、Pec 附近 Radovici 地区的 Jasar Salihadzaj、Pec 地区的 Mirtzaj Bajramu 和 Pristina 地区的 Avdi Ulaj 采取措施的官方记录。

## 意见

649. 在审议所涉期间,特别报告员很少收到关于前南斯拉夫境内酷刑情况的直接材料。自从 T.Mazowiecki 先生于1992年8月担任前南斯拉夫境内人权情况特别报告员以来,所收到的材料由他手下驻日内瓦和萨格勒布的工作人员处理。1993年,下述报告反映了这些材料的情况:1993年5月5日E/CN.4/1994/3号文件、1993年5月19日E/CN.4/1994/4号文件、1993年8月26日E/CN.4/1994/6号文件、1993年9月6日E/CN.4/1994/8号文件和1993年11月17日E/CN.4/1994/47号文件。这样做是为了避免重复,以便通盘对待前南斯拉夫问题,并应情况需要以最佳方式利用专家工作。另一方面,关于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由于估计该国有三分之二领土不在公认合法政府的控制之下,因此,特别报告员不能利用向有关政府转达指控情况的例行程序。

##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 政府就以前报告所提案件转交的资料

650. 特别报告员于1991年10月18日致函该国政府,通知该国政府他收到了据称 Damien Austin (17岁)在1991年5月和8月期间在贝尔法斯特 Castlereagh 拘留所遭到虐待的材料。

651. 政府于1993年2月10日答复说, Austin 先生的申诉涉及1991年5月7日至

10日和1991年8月17日至20日的拘留。他在两次获释后都曾提出正式申诉,抱怨在拘留所中所受的待遇。由于 Austin 先生不予合作,申诉警察独立委员会根据《1988年北爱尔兰皇家警察申诉规定》第17条的规定,认为不能予以调查。他于8月再度被捕时,身上有些旧伤,如耳朵受了伤,后来医生缝合了他的耳朵。但据称他被关在 Castlereagh期间再度受伤,其辩护律师在法庭上要求对 Austin 予以人身保护。在案件得到审理之前, Austin 就已获释。北爱尔兰皇家警察局在申诉警察独立委员会的监督下就此申诉进行了调查,并向北爱尔兰公共检察长提交了一份报告。公共检察长于1992年11月16日下达临时指示,指示须在 Austin 先生提起的民事诉讼结束之后审理申诉案。因此,在所有民事、刑事或惩戒程序结束之前,不宜作出进一步评论。

652. 关于保障被拘留待审者免遭虐待问题,政府告诉特别报告员说,如嫌疑犯非恐怖主义分子,适用《1989年警察和罪证法(北爱尔兰)》,该项法律规定了关于警察权力、被警察拘留者的权利、警察纪律和对警察提出申诉等保障措施,它还规定了关于搜查和没收财产、拘留、处理、审问和确认等项权力的行为守则。该项法律是一项重大的法律改革措施。

653. 与被捕的恐怖主义嫌疑犯的所有会面都受一系列的法规保护。被捕的嫌疑犯有权通知他人自己已被捕、有权知道自己被捕的原因并有权聘请律师。如长期拘留某嫌疑犯,须由与该案无关的审查人员定期审查。由身穿制服的与该案无关的监管人员通过闭路电视监督与恐怖主义嫌疑犯的所有会面。此外,政府还宣布,它将任命一名独立专员监督各拘留中心。

654. 《1987年警察法(北爱尔兰)》规定了就申诉进行调查的程序。北爱尔兰皇家警察局负责调查关于犯人受到虐待的申诉。如申诉警察独立委员会愿意,它可直接监督调查工作。

655. 一旦完成调查工作,有关人员会向申诉警察独立委员会提交一份全面报告和北爱尔兰皇家警察局副局长关于该案的意見。有了调查结果后,可将案件转交完全不受警察和政府管制的北爱尔兰公共检察长处理。如警察或申诉警察独立委员会认为有必要,可要求对有关警员进行惩处。

##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 向政府转达的情况

656. 特别报告员在1993年8月26日的信件中通知该国政府, 他已收到关于 Mahimbo Kaoneka 的报告。该人是退休公务员, 担任已获正式登记的政党 Chama Cha Demokrasi 的主席, 于1992年12月19日在达累斯萨拉姆市中心 Msimbazi 街被捕, 被捕后被带到 Msimbazi 警察局, 据称在那里遭到几名警察毒打。这些警察并未告诉他被捕的原因。他于第二天获释。Muhimbili 医务所的一名医生12月21日对他进行了检查, 检查结果表明, 有根肋骨被打断, 右眼被打伤。

### 扎伊尔

### 向政府转达的情况和收到的答复

657. 特别报告员在1993年11月3日的信件中通知该国政府, 他所收到的材料表明, 包括主要反对党民主和社会进步联盟成员在内的支持反对派的一些平民和被认为同情反对派的一些保安人员被捕并遭虐待, 有时在秘密拘留所中遭到虐待。另据报道, 约有30名士兵因占领金沙萨国家广播电台和在广播中要求政府下台而于1992年1月被捕。据报他们被秘密关在金沙萨市 Tshatshi 军营, 并据说经常被剥光衣服, 有人用鞭子和枪托打他们, 用刺刀刺他们, 用假处决吓他们, 有时还进行性骚扰。两个月后, 高等军事法院审判了其中11名被捕者。该法院不准对其中一些被告指称他们被逼供的申诉进行独立调查, 并驳回了律师关于应由医生进行检查的要求。

658. 另据报道, Jean-Claude Bahai 因在私下谈话中批评政府政策而于1992年9月13日在金沙萨被总统警卫师逮捕。他被带到 Tshatshi 营地, 在那里, 据说有人剥光他的衣服, 用高压水龙头冲他, 拿军用皮带抽打他, 用烧红的铁烫他, 并用碎玻璃片在他身上乱刮。据说他每天挨三次打。他于三天后获释。虽然据报他已向当局报告了受虐情况, 但据报并无调查或惩戒行动。

## 紧急呼吁

659. 特别报告员为下述各段提及的人士向该国政府发出四次紧急呼吁,担心他们可能遭到虐待。发出呼吁的日期列在有关简述后的括弧中。

660. Mukendi Wa Mulumba, 律师,金沙萨律师公会前会长兼总理的政治顾问; MPika 少校,总理的卫士; Nbaka, 中尉; Nyangele; Justin Mobikayi, 总理的礼宾官, Michel Kembo; Olenga Nkoy, 总理的正式代表; M·Akoy, 《Umoja》报社的记者; 和 Guillaume Ngefa Atondoko, 扎伊尔捍卫人权协会会长。据报这些人士于1992年12月13日在金沙萨机场等候一法国代表团时被捕。该代表团的成员在人权领域活动积极。据说这些人在被捕时遭到总统禁卫师士兵毒打,后被带到民警处,然后被关进宪兵队(CIRCO)的地牢。据说 Ngefa Atondoko 先生在机场挨打后被当场释放。(1993年12月23日)

661. Tshisekedi 总理的顾问和正式代表 Olenga Nkoy 于1993年4月29日被捕并被带到金沙萨军区宪兵队。据目击者说,他在该处遭到拷打。据报他被控煽动群众对抗合法当局。(1993年5月4日)鉴于据报该人在获释几天后再度被捕,特别报告员于1993年5月14日为此再次向该国政府发出紧急呼吁。

662. 政府于1993年8月9日就此案件答复说,正依法追究 Olenga Nkoy 对下列违法行为应负的责任:诬蔑国家元首;煽动群众对抗现行政府以及煽动军队不服从命令。法官依法签发了临时拘留证,政府检察署人员则要求最高法院进行司法审查。在此期间,被告仍被拘留,但可接待访客。

663. 扎伊尔政府根据该国《刑法》第1章第67条的规定,认为酷刑是一项罪行,因此,它既不容许、也不容忍酷刑行为。所以,该名被告的安全没有任何问题,绝对不会容许任何人伤害他。

664. 据报约20名Banyarwanda族人(其中包括Tabura Kabuga、Musabimana、Nzabomimana、Ndambara、Kabunga、Ndayambaje、Kasuka、Muhozi 和 Kacuku wa Ngeyo)于1993年8月13日左右在该国东部 Kivu Nord 地区 Goma 处被捕。据称他们在被捕后被立即带到金沙萨,但确切拘留地点不详。(1993年9月1日)

## 赞比亚

### 向政府转达的情况

665. 特别报告员在1993年10月29日的信中通知该国政府,他收到了关于 Chipata 的成员 Cuthbert Ngune 和在联合民族独立党主政时曾担任安全事务负责人的 Henry Kamima 这两项案件的指控材料。据报警方于1993年3月初根据1993年3月4日宣布紧急状态后正式生效的《维护公共安全条例》逮捕了这两位人士。据称 Nguni 被连续审问了39小时,在此期间,有人强迫他站在两块砖头上,并要他在原地旋转,在他头晕倒地时踢打他。据报 Kamima 先生被绑在椅子上,有人挥拳打他。



### 三、结论和建议

666. 与前些年一样,我们必须指出,令人遗憾的是,许多国家存在酷刑现象。如果系统实行酷刑,就一定存在下述一种或多种现象:

- (a) 法律制度不能提供系统保障,不能阻止执法人员和保安人员通过侵权和非法行为达到目的。尤其是,涉嫌犯罪或掌握有助于破案情况者一旦落入审讯人员的手中,就不能与外界接触,审讯程序也不受外部其他权力机构的监督。事实上,这是秘密拘留,他们不能向外界呼救,抓他们的人和审讯人员则以为不会受到外界干扰。因此,在这种意义上,第一种现象和第二种现象是相互关联的。
- (b) 用酷刑整人的人无论在法律上还是在事实上都未受制裁。免于法律制裁的情况一般是,法律规定对在某一特定情况下的违法行为免于起诉或不追究过去违法者的法律责任,大赦或赦免即属这类情况。事实上免受惩罚指的是,从事有关犯罪行为的人实际上通常不受法律制度的制约。这类免受制裁情况可能是缺乏以上(a)节所述的保障措施造成的,而有时虽有正式和适用的保障措施,但政府却听任负责维持公共秩序的人“随意执法”,或更准确地说,这些人的行为不受法律制约。法律和法治被抛在一边。实行酷刑是以维护公共秩序为名的严重犯罪行为,这极大地损害了人们对法律的尊重,长此以往,社会是不会有秩序和安宁的。

667. 联合国知道这些现象。为对付酷刑,联合国大会在其第3218(XXIX)号和第3453(XXX)号决议中要求拟订有关文书,这就是后来的《保护所有遭受任何形式或拘留或监禁的人的原则》。这项文书规定了一系列的保障措施,如执行这些措施,将会大大减少世界各国的酷刑案件。在此方面,第15、16、18、19、24、25、29、32和33条原则极为重要。特别报告员愿在此引述第15条:“被拘留人或被监禁人与外界,特别是与其家属或律师的联络,不应被剥夺数日以上”。

668. 关于免受惩处问题,在世界人权会议上,人们普遍对此表示关注。《维也纳宣言和行动方案》第二部分第91段指出:

“91. 世界人权会议关切地注意到侵犯人权的肇事者逍遥法外的问题,并支持人权委员会和防止歧视及保护少数小组委员会努力审查这一问

题的所有方面。”

此外,关于酷刑这一具体问题,第二部分第60段指出:

“60. 各国应废除关于严重侵犯人权如施加酷刑者不受惩罚的法律,对这种侵犯人权行为进行起诉,从而建立扎实的法治基础。”

669. 此外,人权委员会在任命本特别报告员的第1993/40号决议中核准了前任特别报告员的建议,认为一旦证实酷刑申诉,即应严惩肇事者,特别是应严惩发生酷刑的拘留所负责人。(E/CN.4/1992/17,第299段(i))。

670. 总而言之,要消除酷刑,就需要有政治意愿,而酷刑的继续存在正是说明缺乏政治意愿。存在酷刑即表明,人们缺乏保障,违法者却往往可以逍遥法外,这说明光是信誓旦旦地说要消除酷刑,但却没有履行承诺所需的政治意愿是不行的。

671. 有些政府就特别报告员转交的材料作了答复,特别报告员对此合作精神表示赞赏。但令特别报告员失望的是,许多答复只是托辞而已,并未涉及酷刑造成的严重情况,有的断然否认,有的提到调查,但语焉不详,有的则侈谈法律程序,而这些法律程序已大受破坏,不能提供应有的调查、信息或补救。可向锐意消除酷刑的政府提供的建议已有很多,前任特别报告员就已提出了许多建议,委员会已核准了这些建议。特别报告员认为这些建议是很有价值的,希望各国政府根据这些建议认真采取行动。

XX XX XX XX XX